◎ 世界史精览 ◎

东方的诱惑

——涌动在东方的十字军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东方的诱惑

——涌动在东方的十字军

陈文海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东方的诱惑

陈文海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插页：4 字数：158 000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2.50元　（全32册）35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曈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看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人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30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寻找那块碑石 …………………………… (1)

第二章　巨魔腹中的浊浪潜流………………………… (8)

领主们欲壑难填，私战四起；剑胆琴心的骑士更不愿做无地、无产的“光蛋”。“神圣”的天主教会与之一拍即合：东方是个好去处！ … (12)

易子而食岂止是古代中国的惨剧？贫穷无靠的农民只得向上帝求援，奋然投入将功赎罪的“圣战”。苦行精神在支配着众多的迷途羔羊…… ………………………… (16)

普渡众生的“光环”同样也能聚敛众生的财富。作为西欧社会中流砥柱的罗马教廷对社会的动荡不安岂能坐视？无可奈何之时也是灵感顿生之际。 ……………………… (23)

罗马教会的目标是：消灭希腊正
教，建立“世界国家”。但是，对
手哪愿束手就擒？教皇许下了连
自己也不敢当真的动听的誓言：
愿为海外的希腊兄弟牺牲生命 ……（30）
巴尔干遭难，小亚细亚被围，拜
占庭帝国岌岌可危，历史为罗马
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格氏教皇心
中窃喜：“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
你见鬼去吧！整个希腊都属于
我！” ……………………………………（34）
“永恒之城”发出真假难辨的浩
叹：“可恶的异教徒在蹂躏我们的
主陵：在迫害我们的希腊兄弟！”
可是，梧桐树引来的不是金凤凰，
而是一群贪食的乌鸦 ………………（39）
第三章　伸向近东的方阵 ……………………（44）
人们正在纳闷：兴师动众的国际
大会为何这般无味，缺乏刺激？教
皇出其不意地振臂一呼，欧洲为
之动容：“在上帝的引导下，奋勇
地踏上征途吧！” ………………………（45）

彼得双眼冒火，游说大获成功；农民包打头阵，大都客死异地。面对农民远征队，拜占庭方面大惊失色而又无可奈何：“这等不知羞耻的流浪汉！” ……………………………… (55)
虽是假戏一场，但却颇见成效。在使者的狂呼下，骑士、领主纷纷宣誓效忠，甘为主赴汤蹈火。主角开始打点行装，粉墨登场 ……………… (69)
尼西亚之战，拜占庭皇帝戏耍十字军；中途分道，鲍尔温定都伊德萨。与一位“名人”之女结婚之后，鲍尔温乐不思蜀，解放“圣地”的计划被抛到了脑后 ……………………… (87)
昨日的围攻者，今日成为被围者，十字军人好不狼狈！普布蒙德反败为胜，乾坤定于安条克，但不久却从自己的军中传出咒语：“让愿意留在安条克的人见鬼去吧！” …… (95)
普通基督战士得到的只是“圣光”，而哥德夫利却占据了整个“圣城”。一位意大利人感慨地说：

“难得有一个不患财迷病的朝圣者。” ………………………………… (110)
“圣地”之王控制不住法外游民，亦僧亦俗的骑士团横闯耶路撒冷。上帝要他们恪守清贫，可利欲熏心的他们哪能做到安贫乐道？ ……………………………………… (120)
第四章　泥塑王冠不生辉 ………………………… (127)
“主陵”再次告急！罗马教皇尤金三世连夜赶制“赎罪符”，并正告基督徒：“只要你们能够低首下心、痛切忏悔，你们的全部罪孽都可得到赦宥，而且将从赏善罚恶之主那里得到永恒的报酬。” …… (129)
伯纳奋力高吟“新军颂”，引得法德君王决意冲锋陷阵，献身“圣战”。伯纳喜不自胜：“我创造了奇迹中的奇迹！” ……………………… (138)
两队骡马赴“圣地”，德皇率军先行。上帝的勇士被踏在异教徒骑兵的脚下，德皇抱头咆哮：“朕非报此仇不可！” ……………………… (145)

枝蔓横生，罗塞尔大闹拜占庭；权衡利害，路易七世拒绝“不仁不义”之举，君士坦丁堡幸免于难。……………………………… (151)
法王继续东进，一旁是荷矛持剑的骑士军，另一旁是花林粉阵的艳妇队，是出师表，还是行乐图？怎奈王后在“圣地”大冒爱情之险，与安条克公爵交往越格，法王有如喝了满腹凉水 …………………… (157)
多才而有骑士气概的萨拉丁千军横扫，耶路撒冷成为铁掌中的羔羊，基督教的“圣地”魂归“异教”，西方世界警钟长鸣！ ……… (164)
教皇发出号召：勒紧腰带，节衣缩食。准备“圣战”，为的是保全已经坍塌了的天主教权威；法王、英王、德皇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准备出击“异教徒”，但他们的举动决不是出于爱基督教的上帝，也决不是出于恨穆斯林的真主。…… (169)
红彤彤的太阳沉入了海底。事出

不料，红胡子腓特烈溺死在“异教徒”的河里，喝基督教“圣水”长大的德皇纵饮山溪塞利夫 ………… (185)
“他的一生恰似一场检阅，结束之后只留下一片旷野。”——温斯顿·丘吉尔对英国狮心王理查的评价。 ……………………………… (195)
正当狮心王理查与“异教徒”苦战之时，法王腓力二世却悄然而溜，在背后给了理查重重的一击 ……… (202)
“一头狮子”价值十五万金马克，这相当于英国王室两年的收入。然而，德皇的巨额勒索居然获得了成功。 ……………………………… (210)
第五章　没有月亮的拜占庭 ………………… (218)
教皇英诺森三世吹响的鼓动“圣战”的军号，比他的任何一位前辈都更为响亮有力，更为坚持不懈。 ……………………………… (222)
贵族们悲叹英国狮心王理查之死，畏惧法王腓力二世的暗算，遂加入十字军，借以逃出法王的统

治，避免与他作战 …………………… (229)
又一群蛇蝎在抖身摇尾，毒腺四
处喷射。贪财的威尼斯人抛出第
二条绳索，将十字军的脚步拉向
君士坦丁堡。 ……………………… (235)
拜占庭发生宫廷政变，血溅龙
袍。德意志皇帝“义肝侠胆”，拔
刀相助，要为岳父大人“报仇雪
耻” ……………………………… (240)
德皇颁布诏书：“只要万能的上帝
将希腊帝国赐予朕或朕的妻舅，
朕将信守诺言，使希腊正教会从
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德皇自己道
明了支持十字军东征的目的。…… (247)
“上帝的勇士们”被抛在了荒岛之
上，年已90的威尼斯总督声称：
“如不付清欠款，就休想离开此
岛，休想得到饮食……” ………… (251)
“圣地”终于被抛到九霄云外，十
字军开始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同
是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在劫
难逃。 …………………………… (257)

威尼斯总督向阿历克塞四世扬
言："十字军人可以像当初把你拖
出泥坑那样，再一脚重新把你踢
到泥坑里去！"不过，这位昔日的
皇太子进的不是泥坑，而是上了
牢狱里的绞刑架 …………………… (264)
攻城掠地尚未开始，分赃会议却
已结束。十字军和威尼斯各得其
所。但是，威尼斯又耍弄了十字军
"蠢物"。 ………………………… (274)
拉丁帝国奠基立业，新皇鲍尔温
孤芳自赏，自比大帝君士坦丁，并
恭请教皇"在方便的时候"驾临
"新罗马" ………………………… (284)
第六章　魂丧前的躁动 …………………… (295)
数万名童男童女蜂涌来到南欧港
口。出于畸形的宗教热忱，乳臭未
干的童子军竟然相信：地中海的
海水会在他们面前干涸，为他们
铺设一条通往圣地的神秘道路 …… (297)
穆斯林求和，愿将"圣地"拱手让
与十字军，基督战士傲骨嶙峋：

“不要!”自以为得势的十字军得寸进尺，无奈暴涨的尼罗河水冲跑了骑士们的一切美梦 ……………… (305)
德意志远征军的道路一波四折。正当德皇腓特烈二世雄心勃勃地准备东征之时，罗马教皇却将之赶出了教门，宣称他不是十字军人，而是海盗，是穆罕默德的奴仆。 …………………………………… (314)
英王亨利三世对教皇使节明白表示：十字军说教者三番五次欺骗他的子民，他们现在再也不肯上当了。但是，法王路易九世却自愿投进罗马教廷的罗网 ……………… (322)
法王病老突尼斯，十字军东征的“圣火”渐渐熄灭。从罗马冒出的几缕余烟，升入天际，不见踪迹 …… (331)

第一章　寻找那块碑石

这边所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
那一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
……积极参预出征行列，
以清赎自身罪愆，
永葆天国不朽的荣誉。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
在克勒芒的演讲

自然界中，混沌亿万年的飞禽走兽依然蒙昧而睡，永恒的进化规律在缓慢地侵蚀着万物的肌体。狼逐羊群，虎追百兽，雄鹰啄鸦，强者为王。不能适应自然发展的一切事物必然要被无情地抛弃。温顺的羔羊如想立足于强兽之林，就必须强壮体魄，精进智慧，否则只能成为虎狼的猎物，成为它们的一顿美餐而已。

艰难跋涉数千年的人类文明也不能逃离大自然的魔掌。在这短暂的几千年中，人类一步一步地向文明靠近，但是，要想完全摆脱与生俱来的野性，则非一朝一夕之功。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人类还有漫长的征途。

公元5世纪，在蛮族铁蹄的横扫下，已经奄奄一息的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末代皇帝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奴隶制度在西欧亦随之渐趋消亡。

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的新兴"蛮族国家"开始了欧洲历史的新纪元，人类文明在这里出现一个转折，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取代了奴隶制度。但是，封建制度下的西欧并不是天堂，生活于这片热土上的"基督教子民"并不甘于寂寞，东方"牛奶遍地，香料盈野"的神话触动了他们的渴望神经，牛奶和香料诱惑着他们冒死东进。刚刚换上文明面孔的西欧人重又开始发出野蛮的呐喊。

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近200年的时间里，在基督十字的旗帜下，如痴如呆的欧洲军队在罗马教廷和各国君主的鼓动下，蜂涌在欧亚大陆上，先后对近东国家和拜占庭帝国发动

了八次大规模的军事远征。

这八次远征即是通常意义上的“十字军东征”，此为历史学家们所约定。除此而外，自13世纪以后，仍有多次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它们循着亡灵的足迹，重蹈着败者的旧辙。这一次又一次的武力厮杀都披上了“为主而战”的神圣面纱，战争策划者和操纵者的真实意图被一种巧妙的、蛊惑人心的色彩所蒙住。

1305年，教皇克力门五世举行圣礼，召集十字军，征伐由多里奇诺领导的意大利北部农民起义；

1420～1431年，教皇马丁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孟德联合组织十字军，成立德意志骑士讨伐队，五次远征捷克，镇压要求国家独立的起义者——胡斯派教徒；

1440年，教皇尤金四世再操战戈，宣布十字军东征，与威胁东南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比高低。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正处日中，势力极盛，摇荡数千里的十字大军无功而返；

1463～1464年，教皇庇护二世不忘祖业，又纠集十字军，对奥斯曼土耳其二度征讨；

1514年，教皇利奥十世打着“十字军东

征”的旗帜，再次号召讨伐基督教世界的心腹之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这次东征却导致了匈牙利十字军农民反抗本国封建贵族的起义。教皇的脚被自己搬起的石头砸得既青又肿。

人类文明步伐尽管缓慢，但从来没有停止。中世纪的神圣光环消失之后，人类又迈进了一个新的门槛，资本主义文明在小小寰球上勃然兴起。

但是，“十字军东征”的口号和观念并没有随中世纪的消亡而成为历史，它作为中世纪消极遗产的一部分传到了近代甚至现代。

1917 年，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炮声传到了脚下的美利坚，在那儿引起一阵骚动。1919 年，美国司法部长巴麦采取恐怖行动，成立“反赤十字军”，阻止共产主义烈火在美国大地燎原。

俄罗斯苏维埃国家成立之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各支基督教文明与之对抗。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对此表示全力支持。1918～1920 年，罗马教皇本笃十四世高举“保卫宗教”的大旗，为武装干涉俄罗斯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喝彩加油。

1930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宣布成立“反苏十字军”，得到了欧洲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本世纪30年代，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也没有忘记“十字军东征”这一口号。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东征”，消灭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洪水猛兽。怎奈共产主义这块堡垒在当时坚不可摧，苏联安然无恙，希特勒却引火自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平成为世界文明的主题。然而，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处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地球上，怎能不时常发生一些摩擦和斗殴？只不过敌对方式由热战转向了冷战。在相互敌视、相互窥探的几十年中，“十字军东征”的观念也如风中之烛，忽明忽暗。

1946年，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参加“法提玛圣处女玛丽”圣像圆光典礼，向朝圣者发表广播讲话，宣扬必须像十字军人那样行动，“使俄罗斯人改信天主教”。

1947年，庇护十二世在红衣主教会议上慷慨陈词，号召十字军东征，梵蒂冈驻美国的首席代表、红衣主教斯培尔曼在转述教皇的号召时宣称，凡是信仰“美国和上帝”的人，都应该加

入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

美国传教士皮尔·格莱汉在1952年号召成立十字军，反对共党人的苏联、中国以及其他有“赤化”危险的人民民主国家。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披上了一件新的和平外衣。西方社会开始逐渐抛弃“武力十字军”的观念，代之以“文化十字军”和“经济十字军”，即用文化战和经济战来达到用军事行动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事实证明，更换了形式的“十字军东征”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量，前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纷纷成为“十字军”的俘虏。在铁棒和巨炮面前，它们能够奋力抵抗。而当西方打开闸门，用经济文化的洪水围浸它们之时，昔日的汤池便轰然坍塌了。“十字军”的旗帜堂而皇之地飘扬在曾经为“异教徒”所占领的土地上，“十字军”首领们领略了兵不血刃的风情。

当通向世界的大门再次打开之时，世界文明已经进入了另一幢高塔之中。发展进化的规律不可阻挡，山不穷，水不尽，通向未来的路也永远不会终止。世界最终将会摆脱独自为战的零散格局，向一个有机整体的方向发展。但是，

这一进程决不会像11世纪末的十字军东征那样，用刀剑和铁蹄强行开启敌者的大门，而是采取更为文明的方式使对方束手。不过，十字军东征时期所产生的种种观念虽改头换面，却沿袭不衰。

现在，就让我们循着历史的回音，沿着当年十字军所走的道路，去寻找那块已经风化残缺但仍坚挺不驯的碑石。

第二章　巨魔腹中的浊浪潜流

起来英勇作战，
取得胜过你们一切期望的天国光荣。
你们有了费力无多而能获得
永恒幸福的良机。

——1074 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对信徒的训勉词

从 1096 年至 1270 年，在近 2 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批欧洲人响应天主教会的号召，抛下妻儿老小，向近东出发，征服“异教徒”和拜占庭帝国。这就是几百年来人们谈论不休的十字军东征。

是哪个指头拨动了“十字军东征”这根琴弦？是什么魔力将“上帝子民”吸引到东方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人们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思考由

来已久。

19世纪初期，西方史学家维尔克和迈克尔等人认为，十字军是中世纪西方人民深厚朴素的宗教精神的体现，是上帝意旨的外露。之所以出现轰轰烈烈的十字军东征，是因为西欧人民激于宗教热情，誓死要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有着所谓“圣陵”的耶路撒冷，以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其他“圣地”。

按照《圣经》以及早期基督教作家们的记载，“圣地”是耶稣基督的出生地，是基督教信仰的发源地，人类的拯救者耶稣就在这块土壤上度过了自己的世俗生活。维尔克等人的解释完全是从宗教角度出发的。宗教因素当然不可忽视，但是，如果将其视为唯一的动力，那就不妥了。

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和新史料的发现，人们开始摆脱神话传说般的中世纪历史文献的束缚。

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的学者们注意到，西欧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刺激了十字军东征的兴起。民众的处境困苦，无法在本乡本土继续生活，只好到东方寻求一条活路；意大利北部

各城市为了发展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参加了基督十字军。

还有人指出，促使罗马教廷组织十字军东征的动机不仅是宗教，而更主要的是政治。它力图在与德皇的斗争中提高威信，希望拜占庭的东正教会与罗马的天主教会破镜重圆，并且要在复合后的基督教会中执住牛耳。要达到这些目的，十字军东征即是其可以利用的一件法宝。

现代西方史学家也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判断。法国的甘塞夫认为，支配11世纪西欧的是“宗教热忱”，它来自教会自身的改革。在这种宗教气氛中，人们开始广泛接受“圣战”观念。

勒·菲弗勒同执一辞，他认为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基督教的胜利而战；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只有一个，即世界是基督教的还是伊斯兰教的，是由《圣经》还是由《古兰经》来规定世界的风俗制度。

美国历史学家阿提亚于1951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作了几次演讲，认为十字军东征是“观念和理想之战”，中世纪西欧民众的东征是“为宗教而战”。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沃伦·霍莱斯特也

认为，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盛期西方基督教发展中最著名最自发的事件”。但他的思想已经进步了许多，认识到十字军东征是虔诚、好战和贪婪三种动力融合的结果。

纵观所有西方史家对十字军东征原因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大都未能抛弃或未能完全抛弃那种天真幼稚的“纯宗教观念”。他们认为，十字军东征是世界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即“十字对弯月”的斗争。

为什么从11世纪末西欧农民和封建主（后来还有市民）向东方进军，去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为什么宗教旗帜仅在十字军东征初期分外耀眼，而后来却暗淡失色？为什么初期的十字军只向地中海东岸进军，而不向别处出击？为什么后来的进军方向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

如果我们能细心体味一下当时欧亚大陆的风风雨雨，视野就会变得开阔起来。

领主们欲壑难填，私战四起；剑胆琴心的骑士更不愿做无地、无产的“光蛋”。“神圣”的天主教会与之一拍即合：东方是个好去处！

人类文明的初始有如大海边缘的第一缕微波。在风力的推动下，这缕微波一步一步地向大海中心迈进，其势力变得越来越猛，最终成为惊涛骇浪。人类文明在波涛式的行程中，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变革。在一次又一次变革的基础上，人类走向了更高层次的文明。但是，与变革相伴随的，并不总是花香，它更多的是给人们以希望，在来日分享痛苦之后的喜悦。

在西欧，11 世纪正是经济上发生大变革的开端。除了农业、畜牧业上的成就以外，羊毛、金属加工、建筑等也有所进步，手工业和农业逐渐分离。

同是在这个时期，西欧的城市获得了新发展。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开始有了相当定期的商业关系，商品交换成为经常性的商业活动。国际间的商业往来逐步扩大，越出了西欧这片狭小

的土地。与拜占庭以及东方国家的贸易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以前无足轻重的东方贸易，吸引了众多城市的参加。

经济变革自然要影响到上层阶级的政治社会生活。一方面，国内、国际贸易的发展引起领主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又满足不了其难填的欲壑。农民已经无力贡献更多的金钱和实物，他们忍受不了领主们的暴虐，不断出现“骚乱”行为。

在中世纪最初几个世纪里，大小封建贵族之间内讧不断，史书称之为“私战”。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成为领主向对方开战的借口。进行私战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即夺取新的土地和农奴。

要进行武斗和战争，就必有充足的兵源。领主为了能够进行战争，就得供养许多陪臣，就得赏给他们土地，作为其服兵役的报酬。

经过几个世纪的争夺和分封，到 11 世纪时，西欧各国已经很难找到无主的土地，现有的土地都已分给陪臣。然而，没有土地，就很难吸引和拢络一批好战的骑士。

必须有新的土地，领主的私战才能进行下

去。到哪里去夺取土地？从哪里获得作战经费？天主教会将自己的心思公之于众以后，封建领主们与之一拍即合：东方是个好去处！

与中国古代的遗产继承方式不同，中世纪西欧的封建领地继承制度的核心是长子继承权。封建主死后，其领地并不分与诸子，而全部由长子继承。除长子而外，其余的儿子便成了“无产阶级”。他们空有骑士头衔，而无实际家业。人们给予他们的绰号是“无地、无产的光蛋”。

大封建主们尚且不能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光蛋”骑士们就更是入不敷出了。但是，剑胆琴心的骑士怎能甘心做无地、无产的“光蛋”？他们放纵、游荡，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恢复其高贵的生活，卷入纷争，拦路抢劫，进攻寺院，劫掠商旅，无所不为。

在骑士心目中，解决困难的最方便的捷径是抢劫掠夺。他们有的单枪匹马，有的成群结队，横行于法国、意大利、德意志、洛林、弗兰德尔等地，袭击乡村，掠走农民可怜的家当，如粮食、衣服，甚至于耕犁、锄头等农具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中世纪编年史书把这些骑士称为

农民的“灾星”。

教会和修道院的富庶领地也是“光蛋”骑士们的垂涎之处。以笃信虔诚著称的骑士们再也看不到修道院上空那股神圣的光环。闪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有修士们的钱财。

他们的信条绝对不是“苦行”！享尽富华之后再去信仰上帝，风光体面之后被上帝罚入地狱也死而无悔！

据11世纪中叶的文书记载，虔诚的骑士似乎已经忘记了上帝的存在，竟然“袭击手无寸铁的神父、修士或修女”，使“赤手空拳的神父、修士和修女的土地、财物受到损失”。教会领地上的马、牛、羊、驴全都成为他们的猎物。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口念圣经祈祷词的骑士们也是“物质第一，信仰第二”！

罗马教皇利奥九世深深领略了这帮“上帝子民”的业绩，他曾写道：“我知道这种蛮横的人，凶悍达于极点，背信弃教甚于异教徒，到处破坏上帝的教会，追击基督徒，有时候以酷刑置他们于死地，他们对儿童、老人、妇女都不知怜惜。”

11世纪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在西欧造成

一种人心惶惶的“乱世”状态。荒年不断，饥馑接踵而至，瘟疫流行，农民骚乱逃亡，骑士拦路抢劫，领主之间冲突迭起。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稿中，到处都回响着人们对社会生活动荡不宁的浩叹和焦急之音。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宗教会议上慷慨陈词，最后痛心地指出："盗匪使人日夜不得安宁……"

上层社会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必须打开局面，寻求解决危机的良策，以满足领主们愈来愈甚的对土地、农奴、货币等一切财富的需求，同时改变统治阶级所面临的困境。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封建主要满足自己的贪欲，就容易走上依靠武力的道路。天主教会打出了指路明灯之后，大小封建主便急乎乎披盔戴甲，直奔“希望之乡”。

易子而食岂止是古代中国的惨剧！贫穷无靠的农民只得向上帝求援，奋然投入将功赎罪的“圣战”。苦行精神在支配着众多的迷途羔羊……

公元5世纪的西欧经历了一场历史的阵

痛，封建文明砰然坠地。这是西方文明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它结束了数个世纪的奴隶制度，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由此而起。

但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封建制度并未给他们带来峰回路转，他们所拥有的依旧是贫困。新兴的封建社会赐给他们的并不是带露的朝阳，而是无穷无尽的赋税、劳役和永无休止的战乱。

纵观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史，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共性，农民是整个人口的主体，他们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封建社会的等级金字塔正是以他们为基石而垒起来的，没有农民的白骨，便没有金字塔顶峰的威严。

11世纪时，西欧几个大国的农民几乎完全沦为农奴。只有少数地方的农民还保全着人身自由，其人数极为有限，而且这种自由也只是表面上的自由，因为他们为了使用耕地，必须向主人缴纳各种租税，其地位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佃农相差无几。

农奴们既卖身于领主，就要服从领主的支配。他们必须负担沉重的徭役，一般来说，每周有三天以上为领主卖命。此外，苛捐杂税多如牛

毛，他们要用实物（农产品）向封建主缴纳地租、人头税、森林费、草地费、诉讼费、桥梁费、市场费，领主出征时的养兵费也要由他们负担。

既然有农奴身份，就得尽农奴的义务。按照“死手法”，农民死后，财产应交还领主，如果死者的后代想保有这份财产，必须贿赂主人，献给他最强壮的牲畜和最好的衣服。领主家中遇有喜庆之事，如结婚、长子成年等等，农民也得进贡朝拜。同时，农民还必须向教会缴纳大小“什一税”，而实际上常常要超过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

11世纪，西欧城市逐渐复苏，商品交换日趋繁荣。如今的领主们不再满足于农民供奉的鸡鱼肉蛋，他们要购买城里的物品如甲胄、武器、衣服和鞋帽等，因为它们的质地比乡下匠人制作的精良得多。他们对来自意大利的海外物品也醉心不已，绫罗绸缎当然比亚麻布更有吸引力，辗转而来的东方饰品玲珑小巧，令刚开眼界的西欧领主爱不释手。

面对各种奇巧，封建主怎能不心花怒放？这时他们感到了金钱的重要。11世纪时，西欧封建主开始征收货币地租，用搜掠到的金钱来购

买庄园无法生产的奢侈品。

11世纪洛林的迈克尔修道院有文件记载，有一位雷诺尔德伯爵向该修道院的农民征取货币捐税，如有反抗和拖欠，则将其投入牢狱，“以拷打勒索财物”。

捐税是吸血鬼，无止无尽的混战便是恶魔。11世纪前数个世纪，军事争斗是西欧政治史的主体。各国四分五裂，割据政权你争我夺。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英国莫不如此。

各国的兵斗只能给天空增加一些血色，而绝不会导致土地的肥沃和民众生活的安宁。

深受封建战争之害的首先是农民，农田被践踏，薄产被劫光，房屋被焚毁。编年史家奥德利克·维泰里斯对11世纪末叶诺曼贵族之间的武斗深有感触：“他们的穷兵黩武，骚扰得农民与和平的市民无法安居。”

从保留下来的修道院文书中可以得知，封建主内讧常常造成田园荒芜，十室九空。1050年的一件文书记述了图朗地区的情形，由于时常发生战争，该地“变成了荒野，差不多有八年之久人烟绝迹。”1062年的文书又记载，安茹地区“土地荒废，无人耕种”。

中世纪初期，西欧各国的农业生产相当落后，技术改进并非易事，农作物的产量根本不可能达到很高水准。另外，频繁发生的天灾，如干旱、冰雹、雨水等，也使农民生活遭殃。

沉重的捐税、不休的混战、落后的生产技术、频仍的自然灾害，各种因素相互交叠，导致了西欧社会的大饥馑。

饥馑程度如何？人吃人？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无稽杜撰。中国古代曾有易子而食的惨剧，11 世纪的西欧也未能幸免这场惨剧的公演。1032 年，法国许多地区饥荒不断，饿殍遍野，人吃人的事情并不鲜见。

拉杜尔夫·格拉伯在其编年史中写道："强有力者谋害过路人，把他们切成块，用火烧烤后狼吞虎咽。在许多地方，地里掘出来的尸体也用来充饥。吃人肉已经像家常便饭，甚至有人拿人肉煮熟了在图尔纽斯的市场上当牛肉卖。这个人被逮捕了，他并不抵赖自己的罪行；于是把他绑起来用柴堆烧死。把死尸埋在地下，但夜里又有人把它掘出来吃了。"

格拉伯虔诚地信奉上帝，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认为，之所以发生饥馑，是因为人类罪

孽深重，上帝龙颜大怒而致，是公正的上帝对“不孝子民”的惩罚。

11世纪末，饥荒更加成为西欧农村的常客。从1087年至1095年，西欧各国都难逃厄运，大量农民空腹待哺，此即所谓的“七载荒年”。

饥荒可怕，由饥荒带来的瘟疫更加残酷，它可以使得一个地区人烟灭绝。城乡中因饥饿而身体虚弱的人根本抵抗不住传染病的侵袭，纷纷倒毙。1094年，法国发生鼠疫，“许多村落中不见一个种田人”。另有记载，在仅仅三个月当中，累根斯堡居民死于鼠疫的达到8500人。

是骡子，就得重负。但身上的担子太重，骡子也有其反抗的方法，它可以坐地不起。面对封建剥削的加重，不堪重负的西欧农民也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种形式就是揭竿起义，当时的史书称之为“造反”。11世纪时，布列塔尼、弗兰德尔、英国、法国等地都曾发生此类的暴力行动，但都被镇压下去。

更为普遍的是以消极的方式对社会提出抗议。十字军东征前夕，西欧乡村曾出现集体自杀的悲剧。人们对生活完全绝望，认为即使是地狱的最底层也比人世间的苦难遭遇要强。

有些人则希望逃避悲惨的现实，即使是精神上的逃避也行。于是，在民众间兴起了各种不同于正统基督教的宗教派别，要求改变社会秩序，主张社会平等。教会视之为“异端邪说”，当然不能容忍。

在“七载荒年”期间，人们更倾心于修道院，向往遁世逃俗的生活。而且还出现了其他形式的禁欲主义，以求灭情绝欲，脱离人间苦海。

据史书记载，1091年，德意志有许多农家少女拒不结婚，希望独身终老。有些地方则出现放弃财产的事件，因为人们认为，“财产使心灵受苦”。苦行精神在支配着众多的迷途羔羊……

在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环境下，无知的农民对于落在自己身上的苦难只能用宗教的人生观加以理解和忍受。在他们看来，荒年、饥饿、瘟疫、儿女夭折等等，均是上帝震怒的结果和表现，是对人类罪孽的天谴。他们认为，只有向勃然大怒的上帝求恕，才能摆脱生活的悲苦，只有将功赎罪，法力无边的上帝才能转怒为喜。

逃离领主魔掌和摆脱贫困的愿望，导致了行宗教功德的倾向。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在宗教上得到了体现。他们要通过完成某种特殊的、非

常的英勇功德来证明自己信奉上帝，要为信仰而“受难”。

十字军东征的号角鸣响之后，农民们便积极向前，为“主”的事业赴汤蹈火。但是必须明确，民众宗教情绪的高涨是有其一定的物质背景的，没有上述的种种困苦，农民就很难出现这种炽热的宗教热情。

普渡众生的“光环”同样也能聚敛众生的财富。作为西欧社会中流砥柱的罗马教廷对社会的动荡不安岂能坐视？无可奈何之时，也是灵感顿生之际。

西欧的历史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会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教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取得了万流归宗的优势地位。

在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是最大的封建土地占有者，拥有西欧土地的1/3以上。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以及修道院院长等通过各种途径，攫取土地，教会的地产越来越多。

他们到处宣传说教，使人们相信，凭借捐献

土地和对上帝的功德，便可赎“罪孽”。当王公骑士们慷慨捐赠时，教会则欣然接受，其回报是：以祈祷为捐献者“拯救灵魂”。但究竟救出多少“罪民”，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不过，在当时的西欧世界，还几乎没有人能够对上帝的神圣性提出半点怀疑。

为了保护已有的地位和财富，教会就必然要维护使自己获得这一切的社会制度。罗马教廷声称，人间制度系由上帝制定，绝对不容更改，目前的社会制度是万古不变的定制。教会对自己的政治角色毫不歉让，自命为“现有封建制度最共同的裁定者”。

11世纪中叶，基督教会大分裂，东部称希腊正教，西部则称为天主教。此后，天主教会的势力在西方仍呈上升趋势。

天主教会保卫封建制度，一方面是自身的实际利益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西欧社会形势所求。11世纪时，西欧各国的中央政府仍然软弱无力，各国都处于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天主教会便利用遍及各地的教阶制度，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建立起一种松散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宗教组织。它不仅协助领主稳定治内的社会秩序，

强化对农奴的管理，而且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其他企图也给予全力支持。在这一特殊时期，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暂时充当起西欧社会的政治领袖。

作为政治领袖，天主教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必须寻求一种能够兼顾小骑士利益和僧俗巨头利益的办法，以确保统治阶级的内部稳定。一方面要给大土地所有者提供保证，以防止“光蛋”骑士们的横行和抢劫；另一方面又必须给瘦骨嶙峋的“光蛋”骑士们施些小恩小惠，劝之不要过分霸道。同时，下层民众也是个潜在的危险，民众“暴乱”时时刻刻威胁着教会和其他领主。

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只是经过了几十年之后，才逐步形成一条在教会看来是比较可行的道路。

教会认为，必须利用社会的全部力量实现既定的目标，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企图和利益如百川归海那样汇合于统治阶级的更大利益；另外，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还必须考虑到国内国际的双重因素。

促使以天主教会为首的西欧统治阶级发动

各阶层进行十字军东征的，首先来自西欧自身的历史状况。11世纪的西欧有这种客观条件，可以使各个阶层暂时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

首先是下层贵族——骑士。从11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的自由骑士开始了侵略他国的军事远征，因为在本土已无厚利可图。

自11世纪起，法国骑士就投身于西班牙的所谓“收复失地运动”，企图占领被阿拉伯人掌握的西班牙领土，并掠夺富庶的阿拉伯城市。

最先奔赴比利牛斯半岛的是诺曼底和法国南部省份的自由骑士和封建领主的队伍；

1063～1064年，阿奎丹公爵威廉八世率军进入厄波罗河流域；

1073年，香槟男爵埃倍尔·德·拉西远征，但遭到失败；

自1075年起，勃艮第诸领主率骑士远征西班牙；1085年，卡斯提国王阿尔方索六世取得了攻取托利多城战役的胜利，其参加去者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骑士；

1087年，法国再次组织强大的封建民军，其首领是勃艮第公爵埃德和日后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

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参加者不仅有骑士和显贵，还有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愈来愈大。

比法国骑士出窝更早的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诺曼人。从1016年起，他们纷纷出动，征略南部意大利的肥田沃土。在这里，他们打败了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军队，建立起数个封建公国。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带领亲兵，远征英吉利，史称“诺曼底公爵的征服”。1071年，诺曼人占领西西里。

在11世纪中，骑士邦团远征掠夺之事数不胜数，当时所知世界的各个角落都留有他们的踪迹。

俄国史家扎波罗夫称：“只靠刀剑为生的骑士，乐于在有利可图的地方，为有利可图的事物，跟有利可图的人打仗。”

对于骑士们的远征，天主教会大加喝彩。为1063年～1064年远征祈祷的教皇亚力山大二世宣告，凡是为“十字架事业”丧生的人都可以免除罪孽。

格里高利七世当选教皇(1073年4月底)不到一个星期，即鼓动法国人远征西班牙，他宣

布，法国人可以占有得自“不信者”的土地，条件是承认罗马教廷对于所征服土地拥有最高统治权。在给出征西班牙的各公爵信中，他指出，“西班牙王国虽为异教徒盘踞，但仍只属于教廷”，他再次宣布，因与“不信者”作战而死的人可免罪孽。

可以说，法国骑士和部分农民远赴西班牙与阿拉伯人作战，实质上就是“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十字军远征”，是十字军东征的前奏。

诺曼人远征南部意大利，也得到了罗马教廷的支持，并被教廷利用于自身的政治目的。诺曼人征服拜占庭统治下的意大利之前，教皇尼科莱为其祈祷。罗伯特·歧斯卡尔成为亚浦利亚和喀拉布里亚公爵后，于1059年承认罗马教皇为自己的主君，保证向教皇缴纳年贡，并愿为教皇提供军事援助。

其次是农民。天主教会竭力利用农民为求改善境遇而进行的消极斗争。农民的反抗方式一般来说是逃亡和宗教苦行。罗马教廷设法使之具有更强的“组织性”，然后把他们驱往各地，进行军事远征。因而，农民的反抗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变成了对教会有利的因素。

另外，西欧社会各阶层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运动”也给罗马教廷提供了有利时机。自11世纪后期开始，朝圣规模愈来愈大。到耶路撒冷朝圣，无疑是给十字军东征准备了一个前提条件，并且使天主教会发现，利用宗教这块法宝，可以满足各级封建主的需要，并使不同社会等级和集团的对立意图统一起来。

人们到耶路撒冷朝圣，并不完全出自宗教上的虔诚。除了向上帝表白自己的耿耿忠心外，参加者还抱有各自不同的目的。

奔赴“圣地”耶路撒冷的有英、法、意、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封建主。他们之所以出行，宗教原因当然不可忽视，但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刺激着他们，这就是：追求财富，贪图东方的奢侈品，而耶路撒冷正是东西方的贸易中心。

穷困潦倒的骑士的东行目标更为明确，他们就是到东方寻求富足，翻身起家，摘掉头上那顶“光蛋”帽子，同时以自己对罗马教廷的忠诚，用武功向上帝祈祷，以求饶恕他们在家乡所犯的大小罪过。

参加朝圣的还有不少农奴和城镇的下层人物。在他们看来，朝圣是一种宗教功德，是一种

赎罪手段，通过苦行可以获得肉体和精神上的自由。

对天主教会来说，朝圣是提高教会在人民心目中地位的有效途径，而当时教会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提高教会的威望，消除教会内部的腐败行为。因而，天主教会的僧侣积极参加各次朝圣。在11世纪后半期，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典和英国的许多主教都曾跋山涉水，领略了东行路上的风风雨雨。

可以看出，在十字军正式开始东征的前数十年中，作为西欧封建制度的中流砥柱，天主教会一直在探索一条可行的办法，以解决摆在西欧社会面前的棘手问题。

罗马教会的目标是：消灭希腊正教，建立“世界国家”。但是，对手哪愿束手就擒？教皇许下了连自己也不敢当真的动听的誓言：愿为海外的希腊兄弟牺牲生命……

在中世纪的西欧，教会炙手可热，风风火火了数个世纪。宗教的魔力钝化了民众的神经，掠走了民众对自然社会的朴素认识，整个世界变

成了由上帝主宰的大家庭。

在这里，恶与善并存，罪孽与德行并存，异教徒与虔诚者并存。西欧社会政局混乱之时，正是罗马教会在各地安营扎寨的好时机。在不知不觉中，罗马教皇们便施尽全力，扮演起西欧世界“大家长”这一角色了。教会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地产，它还要扩充权势，建立神权君主政体的“世界国家”。这一目标也是使它走上鼓动十字军东进道路的一个因素。

1073年，宗教改革家、克吕尼派高级教士希尔德布兰当选为教皇，称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从这时起，罗马教廷的威信日隆，权势日重。教皇们当然喜不自胜，开始盘算起筹建“基督教世界王国”来。

格里高利并不属无能之辈，他拟定了一套罗马教皇“世界”统治权的纲领。他认为，罗马教廷不仅对基督教会有最高主权，而且有权统治世俗的君主。国王和大公是罗马的属臣，是分封出去的诸侯。教皇不仅有权任免主教，而且有权任免大公、国王乃至皇帝。没有教皇的首肯，任何世俗政权都不具备合法性。

1076年，格里高利七世写信给美兹大主教

泽尔曼，声称“上帝赋予圣彼得以天上人间的生杀予夺之权”。

格里高利七世不是在说空话，他要将自己的神学理论现实化，要把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他自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向英国国王征服者威廉发出命令，使之俯首称臣：“你要继承天国，就必须忠贞不贰地向我臣服！”

法王腓力一世也畏之三分。格里高利七世告诫他：“教会的事务请你少插手，法国主教的任命权在于罗马教廷。如果阁下拒不遵命，那请恕我直言，你的法国臣民将举兵反抗，你的结局只能是众叛亲离！”

不知从何时起，匈牙利和罗马教廷发生了纠缠不清的瓜葛。格氏教皇曾向匈牙利国王盖萨一世宣称：“匈牙利王国属于教廷！”

波兰国王普列斯拉夫二世不甘做罗马教皇的走卒，格氏教皇拿出尚方宝剑，实行“破门律”，将之逐出教会。对于没有教徒身份的国王，全国民众有权反抗他。

在格氏教皇的心目中，西班牙更值得亲近，它是圣彼得的领地，他有理所当然的继承权。

遥远的俄罗斯也是块宝地，格氏教皇想利用基辅大公们的冲突，将罗马的“上帝代办”统治权扩及俄罗斯。1075年，他授予被逐出基辅罗斯的伊兹亚斯拉夫公爵以统治基辅罗斯之权，公爵则承认自己是教皇的诸侯。不过，这只是一纸空文，并未成为现实。

要想建立基督教“世界王国”，还有一大难题有待解决，这就是消灭希腊东正教会，实现教会一体化。

基督教会的正式分裂发生于1054年，这是由东西方不同的社会政治命运引起的，希腊社会的政治和宗教传统要求有自己的教会。在教义和仪式上，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政治地位上，两者的差异比较明显，东正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治，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基于消灭东正教会这一企图，罗马教廷才萌发了十字军东征的初步设想，首先提出这一设想的便是格里高利七世。

格氏教皇的目标是：首先置东正教会于罗马教廷控制之下，实现“教会复合”，然后再谋求对拜占庭帝国政权的控制，这将使拜占庭的财物滚滚流向罗马，大大扩充罗马的财力物力，

使教皇更有力量实现建立“世界国家”的目的。

为了能使希腊教会回到罗马教廷的“怀抱”，格里高利七世许下了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动听的誓言：“愿为海外的希腊兄弟牺牲生命……”

然而，后来希腊“兄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始作俑者正是这位“慈善”的格里高利七世。

巴尔干遭难，小亚细亚被围，拜占庭帝国岌岌可危，历史为罗马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格氏教皇心中窃喜：“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你见鬼去吧！整个希腊都属于我！”

十字军东征之所以能够逆潮流而起，正是利用了国际形势所赋予的“契机”，这就是：11世纪70年代末起，拜占庭帝国左右不能逢源。雄心勃勃的罗马教皇看准了这股东风，促使万事俱备的十字军顺风而东向，狂奔“黄金遍地香料盈野、奶流成河”的东方。

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自公元四世纪东西分治以后，东部帝国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西部“同胞”遭到蛮族洗劫并被摧毁之后，东部

帝国却继续存在下来。但是，当阿拉伯帝国崛起后，拜占庭的日子日益窘迫，辽阔的国土接连拱手于他人，如今只有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尚存。不过，就连这片日趋萎缩的领土也是朝不保夕。拜占庭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帝国各城市在地中海地区贸易上的地位令人垂涎，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它是当时国际贸易中心之一。

是肥肉，就必然有觊觎之主，如果是孱弱且肥的羔羊，则更易惹来杀身之祸。从11世纪中叶起，拜占庭帝国开始受到当时已经占据东南欧大草原的突厥游牧部落佩彻涅格人的骚扰，继之而来的还有落托尔基——奥古兹人和波洛伏齐人。

更令拜占庭帝国汗不敢出的却是来自东方的另一支游牧部落——塞尔柱突厥人。塞尔柱人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中国南宋末年蒙古人的出现，一经形成，便东征西伐，展开凌厉的攻势。

11世纪40年代，塞尔柱人占领里海南岸的广阔土地，伊朗的中部和西部悉归其手；1055年，大兵再举，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占领了曾经昌盛一时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

格达；从 60 年代始，塞尔柱人接连入侵亚美尼亚、小亚细亚的卡巴多西亚和夫利基亚诸省，而这些地区都是拜占庭的家当。

面对动乱，帝国政局动荡不宁，政权随之易手，小亚细亚王朝——军事派破土而出，军事长官罗曼努斯四世戴奥哲尼斯匆匆登场，成为新皇。新皇帝尚有雄心，力图阻止塞尔柱人的入侵。但就在这时，却祸出萧墙之内，宫廷中有人密谋反叛，同时捏造出一些于军事行动不利的消息，军心怎能大振？1071 年，罗曼努斯四世率军与塞尔柱人在亚美尼亚境内、凡湖之北的曼齐克特决分雌雄，结果惨败，自己也成为塞尔柱人的阶下之囚。

罗曼努斯四世身陷囹圄之后，迈克尔七世杜卡且惊且喜地荣登宝座，但他拒绝付款赎回被俘的皇帝。后来，罗曼努斯四世立下言质，获得释放，刚归故里，即遭新君的“礼遇”，按拜占庭惯例，被弄瞎双眼，进了牢狱。

曼齐克特之战的失败给拜占庭带来无穷的后患。金瓯残缺，如今的拜占庭只落下半壁江山，而且吵嚷不宁。当时有位编年史作者对帝国版图的骤缩深感痛心，他形容道：“现在从君士

坦丁堡皇宫的窗户可以望见不再属于帝国版图的东方山脉。”

拜占庭帝国所发生的一切，尽收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眼底，也正中他的下怀。外敌围困、内部纷争，国力每况愈下，这正是罗马教皇达到目的的大好时机。格氏教皇心中窃喜：“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你见鬼去吧！整个希腊都属于我！”

格里高利七世采用先礼后兵之策。如果良言相劝可得之，何必还要动用武力？

1073 年，他开始与迈克尔七世交涉。该年夏天，他致信拜占庭皇帝，希望“恢复由上帝制定的昔日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教会之间的一致”。但事与愿违，格氏教皇吃了闭门羹。既然你不识抬举，请休怪我无礼！教皇便打算以武力征服拜占庭，不过他的借口还是“合情合理”的：保卫 基督教，援助希腊兄弟抵抗异教徒穆斯林——塞尔柱人。

1074 年，格氏教皇频繁下谕，号召“圣彼得的所有信徒”参加他所策划的东征战争。他呼吁救援灾难之中的希腊兄弟，挽救东正教会，同时他还对积极响应与“不信者”作战的信徒许下

重愿："必将得到天国的酬报。"

格氏教皇训勉信徒："起来英勇作战，取得胜过你们一切期望的天国光荣。你们服费力无多而能获得永恒幸福的良机。"就在这个时期，他的远征计划中已经有了直趋"圣城"耶路撒冷的打算。

格氏教皇多次表示愿意亲自率领西方基督徒军队前往海外，"援助同教弟兄，拯救希腊基督徒不受'不信者'的压迫"。他信心十足，在给塔斯加尼伯爵夫人马提尔达的信中，他相信"许多骑士对于我们的事业将出力协助"。

从本质上说，格利高利七世的政策是由物质利益决定的。10至11世纪，教会礼拜仪式日趋豪华，这必然引起教会的经济困难。西欧手工业发展缓慢，教会所需要的器皿、香油、香脂、艺术品等等，都需从东方获得。因此，所谓的宗教利益是从属于经济利益的。

同时，政治利益也远远高于所谓的宗教利益。格氏教皇认为，当罗马教廷的政治利益需要时，不应该斤斤计较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任何原则上的分歧。

1076年，在致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王公阿

里·纳赛尔的信中，教皇称："你我信仰一个上帝，虽然信仰的方式不同。……我们同样以他为天国的创造者，人间的主宰者，敬仰他，日日赞美他。"

然而，西方的事务使得格里高利七世无暇东顾，东征计划无法得到贯彻。但在忙碌之余，他仍念念不忙给东征拜占庭的罗伯特·歧斯卡尔祝福，允许给参加者"免罪"。

当罗伯特胜利之时，格里高利七世又及时地提醒他："没有圣彼得的庇护，你不可能获此荣耀！"言下之意是：罗伯特的成功有我格里高利教皇的一半！

"永恒之城"发出真假难辨的浩叹："可恶的异教徒在蹂躏我们的主陵，在迫害我们的希腊兄弟！"可是，梧桐树引来的不是金凤凰，而是一群贪食的乌鸦……

格里高利的"宏伟计划"未能在其有生之年变为现实，但却为后来乌尔班二世的全面进攻奠定了基础。同时，11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东地中海各国形势以及拜占庭帝国的窘境也为十字

军的最后结集铺平了道路。

1071年，塞尔柱人占领原在法提玛王朝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到70年代末，塞尔柱人在此的地位已经相当巩固。1084年，拜占庭的贸易和战略要地安条克也落入塞尔柱人之手。在塞尔柱骑兵的铁蹄下，拜占庭帝国成了不敢出头的乌龟。

塞尔柱人成了罗马教廷实施自己计划的靶子。为了使西方相信与伊斯兰教进行“圣战”的必要性，罗马运用了漫天夸大和无中生有的宣传手段。教会宣扬说，塞尔柱人异教徒在东方残酷迫害各国基督徒，他们粗鲁地亵渎圣物，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西方人受尽迫害，圣地耶路撒冷处于危危之中！

谎言骗不了自己，却能迷惑大批的无知民众。实质上，塞尔柱人的所作所为，并非如此令人怵目。遍地战乱给民众生活、交通等带来诸多困难，这理当承认。但是，罗马教廷对此作了极度夸张。不然，怎能会有那么多的“义士”甘愿舍身为其效劳？

据后世研究，塞尔柱人在宗教事务上并不严重迫害基督徒，塞尔柱人统治下的叙利亚、巴

勒斯坦的基督教居民的宗教地位并没有变得比以前更坏。与阿拉伯人一样，塞尔柱人也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不强迫“异教徒”改宗伊斯兰教。安条克仍然是希腊正教大主教的驻节地，耶路撒冷也有数量不少的基督教教长。

塞尔柱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西方朝圣者仍与从前一样，可以来此拜谒“主陵”，并未受到塞尔柱人的凌辱。但朝圣者必须向塞尔柱人交纳一定的朝圣费。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此前朝圣者来耶路撒冷也必须向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政权交纳大量费用。

被基督徒称为“圣陵”的那块空地保全得完整无损，塞尔柱人也无意要将其铲平。

可以看出，罗马教廷是要借“异教徒”威胁“圣地”和“圣物”的谎言，促使西方大军东侵。到了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之时，拜占庭帝国腹背受敌，教廷的计划开始箭离弓弦。

拜占庭是棵令人垂涎的梧桐树，但引来的不是金凤凰，而是一群贪食的乌鸦。80年代初，罗伯特·歧斯卡尔统率诺曼人军队继续远征拜占庭帝国的欧洲省份。拜占庭新君阿历克塞一

世（1081～1118年在位）在德皇亨利四世和威尼斯人的协助下，基本肃清了罗伯特的势力，但也留下了隐患。威尼斯人在拜占庭获得极大的特权，在帝国的一切城市免税经商，不受海关人员管辖，有权在帝国领海自由航行，威尼斯总督的俸给由帝国拨款。而且，帝国还划给威尼斯人三个特区，区内居民不受拜占庭法律管束。

是祸往往不单行，帝国的东方和北方也不得安宁。1088年，佩彻涅格人直逼首都君士坦丁堡。同时，塞尔柱人也几乎是兵临城下。不久，佩彻涅格人和塞尔柱人联起手来，拟定了共同计划，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

在教皇乌尔班二世看来，拜占庭的形势妙不可言。他学习格里高利七世的作法，先对拜占庭展开外交战。1088年初，他派使节至君士坦丁堡，指责皇帝阿历克塞一世强迫拉丁人天主教徒按照希腊正教仪式礼拜。

强敌当前，阿历克塞一世不愿再惹麻烦。他表面同意向罗马让步，并决定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宗教会议，以调整东西方教会在教义和仪式上的分歧，恢复东西教会的统一。

这是阿历克塞一世的拖延战略，现在他可

以腾出手来，专门对付入侵之敌。拜占庭方面以武力、阴谋或收买的方式终于在1091年4月底打败了佩彻涅格人和塞尔柱人。

困境一旦解除，阿历克塞一世便不再与罗马教廷穷费口舌，取消了预定的宗教会议，东西方教会的复合化为泡影。乌尔班二世心怀不满，岂能善罢甘休？

前文有言，西方的大领主和穷困潦倒的骑士一直在寻找适当的猎物，农民也在寻求摆脱苦难之路。但是，如果没有“权威性的代表人”天主教会的干预，他们很难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乌尔班二世对此深谙不爽。

当外交手段已经无望之后，乌尔班二世便完全复活了格里高利七世的武力行动计划：援助拜占庭弟兄，抵抗“异教徒”，保卫“圣地”耶路撒冷。

在乌尔班二世的奔走呼号下，血腥的“圣战”——十字军东征拉开了序幕。

第三章　伸向近东的方阵

这一可怖的序幕既然已经揭开，
基督教世界便开始长征。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四部第二篇
第二章“十字军东征”

大事记：

▲1095 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克勒芒演说；

▲1096 年，农民十字军东征；

▲1096～1099 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中世纪的最初几个世纪，欧洲在野蛮和洪荒中挣扎，未见世面的芸芸大众除了饱腹之外，别无所知。

精明的教会人士抓住了世人蓬垢的长发，用既温厚又粗暴的双手，把他们揽进了基督教

会的铁栏之中。

生亦苦，老亦苦，病亦苦，死亦苦。为从无穷无尽的苦痛中解脱出来，下层民众把渴望的目光投向了万能的上帝。贵族显宦们为了地增财长，也将贪婪的双眼盯向“上帝代办”——罗马教会。

11 世纪末的西欧上空，已经迷漫着“圣战”的硝烟。

人们正在纳闷：兴师动众的国际大会为何这般无味，缺乏刺激？教皇出其不意地振臂一呼，欧洲为之动容：“在上帝的引导下，奋勇地踏上征途吧！”

公元 1095 年 9 月，法国南部城市克勒芒。

在阿汾尔涅伯爵的府邸，上自伯爵老爷，下到奴仆侍从，人人脸上都带有且惊且喜的表情。他们似乎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多了一层神圣的光晕，有几圈夺目的光环在头顶上盘旋。全府平添了几分昔日难有的庄重气氛。

知情的过路人不时地侧目偷探，他们想一睹为快，满足自己的好奇，同时也给自己的脸面

镀上一层“圣光”。

是什么引得整个克勒芒城沸沸扬扬、街谈巷议？是何人使得伯爵府邸成了“三尺禁地”？——只因为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光临克勒芒并下榻于伯爵府邸？

在虔诚的基督徒心目中，教皇至高至尚，法力无边，他就是“神人合一”的主，就是活着的耶稣！

乌尔班二世从“圣城”罗马来到法国南部小城克勒芒已经一周有余，明天就是他所精心组织的宗教会议开幕之日。在过去的几天中，教皇并不轻松，他时时刻刻都在考虑：如何把自己的重大计划公之于众！如何能取得广大子民——领主、骑士、商人、农民的全力支持？天主教会的成败在此一举！如果游说成功，罗马的声誉将由此而日隆，否则，便不堪设想。

尽管有着种种忧虑，教皇心中还是有一定把握的。经过数十年的政治生涯和宗教活动，他已不是一个头脑简单虔诚的教徒。他深深了解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形势，了解各色人等的心理状态。大领主的想法，骑士们的渴望，下层农民的要求，商人们的贪婪，这一切都不能

逃脱这位已经登上教皇宝座达七年之久的乌尔班二世的眼睛。

因此，他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人能否听从他的号召，而是如何将一群散兵游勇组织成一个坚强的整体，以达到自己的政治和宗教目的。这正是教皇在伯爵府邸几天来一直苦思冥想的一个问题。

几个月以前，教皇的谕令和信札交驰于西欧各地，宣布将于1095年9月在克勒芒小城召开宗教会议，而且教皇本人将亲自出席并主持这次盛会。函令中一再强调教皇的出席以及集会的重要性，并劝告“所有忠心于主”的各界人士届时光临。

虽然教皇没有把自己的最终意图写在谕令上，但欧洲上下已经从信使的言谈举止中估测到，这次宗教大会不同一般，教皇必定抱有重大目的而去克勒芒。就连广大农民也预感到将有大计待决。

会议开幕前几天，西欧各国领主、骑士、商贾以及下层农民蜂涌而来，数目不下数万。教皇约请的宗教界人士也都如期而至，其中有14位大主教，200多位主教，还有400多位修道院院

长。

小小的克勒芒哪能容纳如此众多的来客？除了有地位、有身份的领主和宗教官员住在城里，大多数的骑士和农民便在城外的旷野安营扎寨。

宗教会议依预定的日期拉开帷幕。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教皇、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来自各地的大领主端坐广场中央。按照日程，会议就教义的内容、教规的施行、神的和平、禁止私战等常规问题展开辩论和讨论，为期六天。

一天又一天的玄论和清谈，各位主教当然兴致颇浓，但中小骑士和农民却越来越忍耐不住了。对他们来说，知道上帝的万能和可敬就够了，那些搬来弄去的深义奥理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可言。他们感到纳闷：兴师动众的国际大会为何这般无味，缺乏刺激？

9 月 26 日是宗教会议结束之日，正当人们百无聊赖、感到失望之时，乌尔班二世引爆了一枚“炸弹”。

在露天广场上，面对着无数的听众，教皇作了慷慨激昂、庄重无比的演说。他号召信徒们拿

起武器，征讨“波斯的土耳其部族”，对危害“主陵”及“圣地”的穆斯林“异教徒”进行十字军东征。教皇的演说词是：

“上帝的众子们啊！你们既然已经应许天主要较以前更热忱地在彼此之间保持和平，要更忠实地遵守教会的法律，那么现在，在你们得到上帝的矫正，重新振作以后，这里便另有一个任务等待你们了！这是一件你们自己和天主同样关心的事情。你们应当在这个任务上表现坚定不移的力量。这就是你们必须去援救那些住在东方的兄弟们，因为他们正迫切地期望你们的援助，而且也时刻在祈求你们的援助。正如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突厥人（波斯人的一支）已向他们发动进攻，侵入了罗马尼亚境内，一直到达了号称‘圣乔治的臂膀’的地中海边境，而且还在继续前进，占领着更多的基督教的土地。他们已经打了七次胜仗，屠杀和俘虏了很多人，毁坏了许多教堂，正在上帝的国度中大肆蹂躏。如果你们容许他们这样继续下去而不加以干涉和遏止，那他们会更猖獗地伸展魔掌，加在更多的上帝的忠仆身上。”

“由于这个原故，我现在恳求你们；不，不

是我，乃是主在恳求，主在勖勉；我只是作为基督的使者向你们勖勉，督促一切等级的人，骑士、步兵、富人、穷人，都必须迅速起来，及时地给予基督教徒以援救，将这个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应当知道，虽然是我在这里向你们这些与会的人呼吁，也向那些缺席的人号召，但下令的却是基督。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旅途中，——陆上或海上——或者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丧失了性命，他们的罪愆即将在那一顷间获得赦免。上帝授权给我，让我把这个赎罪的权利赐给一切参加的人。”

“啊！假如这样一个卑贱的、退化的、给魔鬼作奴隶的种族，竟然能把因信仰万能的上帝而坚强、因依靠基督而显耀的人们征服了，那将是怎样的奇耻大辱啊！假如你们竟然拒绝援助那些与你们同样信仰基督的人们，天主将要以何等的谴责加在你们的身上啊！让那些从前经常凶狠地和有信仰的人们因私事而斗争的人，现在去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战斗吧！愿你们把这场早应该进行的战斗胜利地进行到底吧！那些从前做强盗的人，现在去作基督的战士吧！那些从前与自己的兄弟和亲朋争斗不休的人，现

在去向蛮族进行正义的战争吧！那些从前接受微薄的工资被雇佣的人们，现在去获取永恒的酬劳吧！那些拼命劳动而身心交瘁的人们，现在去求取劳动的双倍报酬吧！让仇恨从你们中间消逝，让争吵终了，让战争停歇，让一切争辩和倾轧休业，登上赴圣墓的征途吧！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吧！那个地方，如同《圣经》上所说，是上帝曾经赐予以色列的后嗣的，遍地流奶与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这座城，由于人类的救主之诞生而驰名世界，由于他在此地居住而变成美丽，由于他的受难而成为圣洁，由于他的死而获得救赎，由于他安葬于此而获得光荣。"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这边所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一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在这边你们是主的仇敌，到那边你们就成了他的朋友。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再拖延了，先回去料理自己的事务，筹集些金钱作为路费，冬末春初的时候，在上帝的引导下，奋勇地踏上征途吧。"

这是教皇演说词的一部分。他的游说不能不说是成功的，其诱惑力令在旁就坐的大主教、

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从心底产生敬佩之感，他们和广大听众一样，深受感染，立誓要走上“主的道路”。

进行东征的借口找得恰到好处：讨伐“异教徒”，援助拜占庭，拯救同胞兄弟！

发动东征的时机不早也不晚：这是一个容易将各阶层人们联合起来的大好时期，因为人们现在有一个表面上的共同目标，即寻求“宗教功德”，摆脱手头的拮据。

教皇对全体信徒的训勉则更具威力：它集威胁与诱惑于一体，把一切民众（不论在场与否）都引向激动的顶峰，不成功，便成仁！他要把那些威胁西欧各国统治阶级利益的不安定因素打发到东方，去争取主的欢心！

对于穷困的骑士，乌尔班二世不必大谈什么宗教功德，他们渴求的是土地和财富。教皇对骑士们说：“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生活有什么意思？你们住着的这片土地不值得你们留恋，在这片土地上你们人愈来愈多，而土地的财富却不生长增加。不必犹豫，到东方去占领敌人的土地！”

至于农民，教皇的东征号召正合心意，完全

符合他们的苦行情绪。教皇深知他们此时的心情，因而十分爽快地答应，参加远征之人——“为信仰而受苦难者”——得免罪孽，永葆天国的荣耀。

只要是肉体之躯，就必然有衣食住行之需。教皇自然也会考虑到：仅仅给予信徒们以天国的荣耀是远远不够的，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上帝的青睐和天国的安闲，人们更需要现世的快乐。因此，教皇向信徒们保证，前往“圣地”之人不仅可以得到来世的荣华，只要他们战胜了异教徒，还可以得到人世间的实惠，“东方到处是蜜，遍地是奶，不去此处，则会遗憾终身，主的信徒们！”

11世纪的西欧，大多数人并无确切的地理概念，能够知道“东方”离自己家园究竟有多远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教皇为了动员尽量多的信徒参加“圣战”，利用了民众的无知。他告诉群情激昂的信徒们：“东方并不遥远，耶路撒冷就在眼前，而且地势平坦。即使遇有高山和海洋，也是如旅平川，因为有仁慈的上帝伴随你们！”

乌尔班二世的演说在人群中得到热烈的响

应，他们一改刚才那种懒散情绪，人人击掌狂呼，教皇的演说也由此而数次中断。

“神意如此”的呼声飘动在克勒芒上空，霎时间传遍了法国。

不久，整个西欧的天空都回响着教皇那近乎嘶哑的高声劝谕，伴随着芸芸大众的赞美声，西欧沸腾起来。

天主教会曾向信徒们宣布，当耶稣诞辰一千周年之际，亦即公元1000年，世界将有奇迹出现，所有人都将接受“末日审判”，善者进天堂，恶者入地狱。

但是，公元1000年已经过去将近100年了，奇迹仍未到来。不过，那些虔诚的信徒们仍在企盼着“奇迹”的出现，对“奇迹”的信心并未动摇。

教皇的鼓动使等待“奇迹”的信徒们看到了希望。他们认定，“奇迹”将在公元1100年正式出现！1100年到来之前的这几年正是他们寻求功德的最后时机。

天主教会抓住了历史的契机，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将要进行的“十字军东征”完全出于宗教热情。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详述。

在克勒芒宗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正式作出决定：1096年8月15日，十字军正式出征“圣地”耶路撒冷！

彼得双眼冒火，游说大获成功；农民包打头阵，大都客死异地。面对农民远征队，拜占庭方面大惊失色而又无可奈何："这等不知羞耻的流浪汉！"

从历史上看，举凡大规模的讨伐、征战或起义，都少不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声势浩大的“圣战”，也离不开农民。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厥词大放以后，关于即将远征耶路撒冷的消息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遍西欧各地，就连远离大陆的海上诸岛也大闻风声，当然也就要闻风而动了。

教皇的号召出于法国的克勒芒，因而最先募集远征军的也是法国。

不论内因有何差别，背景有何不同，教皇使得各个阶层之人春心萌动，为“主”赴汤蹈火的宗教情绪变得炽热。法国的空气顿时充满了“神

意和圣光”，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说教者的讲坛，农民的棚舍成了修道士的布道所。

在激扬的宗教氛围里，法国上下一片痴情，要把利剑指向“圣地”，与主的敌人决一死战。

这只是表面上的忠诚，各人自有算盘。为名、为钱、为基督、为开心，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十字军东征要成为全民运动，就少不了奔走东西、客串南北的宣传员和鼓动家。在法国的平民百姓中，最有名的说教者是隐修士彼得。因其出生地是亚眠，也有人称他为“亚眠的彼得”。

隐修士彼得极具辩才，口若悬河。从1095年到1096年初，他的足迹遍布柏利、彼卡提、奥尔良、法兰西岛等地，在他的劝谕下，不仅仅是下层平民，而且有不少骑士甚至小领主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成为矢志不渝的“追客”。

彼得位处下层，为何却能担此大任，干起为教皇呐喊助阵的角色？有这样一则传说：

在克勒芒宗教会议前不久，隐修士彼得曾动身前往耶路撒冷，想去一睹“主陵”的尊容，以满足自己对宗教功德的渴望。

据所掌握的史料看，他并未到达目的地，不

知出于何种原因，他中途返回。

然而，无稽之谈由此敷衍下去。据善于编造谎言和奇迹的中世纪编年史家称：隐修士彼得历经千山万水，终于到达日思夜想的“圣地”耶路撒冷，激动数番之后，栖身于一座宽敞的庙宇中。

一日夜晚，彼得进入梦境，只见灵光万道，一位天使自空而降，命他去见“圣城”大主教，因为大主教有要事相告。

天明以后，彼得依照天旨，去往大主教驻节地。到那儿之后，果见大主教早已端坐堂上，静候彼得的到来。

大主教交给彼得一封信，告诉他：“这是上帝亲自发给我的，上帝号召西方基督教徒采取猛烈行动，从异教徒手中把耶路撒冷夺回来。现我选你作为使者，回去谒见教皇陛下，将上帝的旨意与他道明。”

彼得回到罗马后立即与乌尔班二世多次长谈。领受了上帝的旨意之后，教皇便在克勒芒召开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宗教会议。

关于隐修士彼得积极为天主教组织十字军而奔走呼号，我们不必持那种过于极端的观点，

认为“隐修士彼得与罗马教皇之间”有“某种勾结”，是“受教廷之托行事的人物之一”。

应当从西欧当时的实际历史氛围来考察之。宗教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餐，在精神生活中，除了宗教神学，人们一无所知，他们的绝大多数活动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彼得亦是社会的一员，他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并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他之所以如此卖力，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要求摆脱贫困的潜在动机。他的做法正好符合罗马教廷的宣传，因而在不知不觉中为罗马效了大力。

隐修士彼得奉行“纯正”的禁欲苦行，身无分文，囊无余赀，但他却靠自己的才能到处寻求捐赠，用以周济穷人。再加上他那动人心魄的演说，更是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敬畏，至有“神人”之誉。

上个世纪的西方史家库格勒曾将彼得描述了一番：“一双冒火似的眼睛，因生活清苦而面黄肌瘦，被南方的太阳晒得皮肤黧黑，他在法国中部和北部对农民演说，在他们的激动了的心灵上产生如此强烈的铭感，至于使他们成群结队追随在他后面，像追随主的预言者一样。”

驱使农民迅速组织起来准备远征的，彼得等人炽热的演说是一方面，但比之更有影响力的是连年歉收而导致的贫困。1095 年至 1096 年，法国多处都出现以草根充饥的现象。

尽管农民们极端信仰教皇的一言一行，他们还是可以预感到，“圣地”并非近在咫尺，东征途上也不会一帆风顺，同样也会遭受饥饿和病痛的袭击。但是，“圣地”有着诱人的世俗利益，在那里可以完成自己的宗教功德，“圣地”可以带来美好的未来，灿烂的明天就在脚下这条曲折的道路上。而如果呆在西欧家园，那只有忍饥挨饿，死路一条。他们深深感到自身处境的恶劣，就“好像被关在一种可怖的牢狱中似的，必须赶快逃出来。”

农民们开始廉价变卖仅有的家产，筹集资金，准备远征。

吉伯尔·诺戎（1035～1124 年）在其名著《法兰克人的神圣事业》中有记载：

“在那个时候，穷人的勇敢烈火，已烧到这样的白热程度，其中谁也不再注意到收入的缺少，谁也不再关心所出售的住所、葡萄园和田园的价格如何，而是，他宁愿以极低的价格，来拍

卖他最好部分的财产，好像他已被绑架，关在黑牢里，因而迫不及待地需要现款来赎身一样。”

“在那个时候，由于粮食的普遍缺少，一般人，连富人也在内，过着很困苦的生活……穷苦群众寻找野草根以果腹，……我在上文已说过，尽管这是一个饥馑的时期，使大家不得不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可是刚在基督感动了这无数的群众自愿踏上征途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显露出他们的财富了。在出征未开始时所有昂贵的东西，当大家踏上征途的时候，就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了。”

“因为有着很多人要抢先结束他们的事业，所以，那使人惊异的现象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可作为一个突然的、出乎意料的跌价例子：可以五个便士，买得八头绵羊。上面所提的食粮缺乏，现已变为丰富了。每个人想尽方法，要凑一些现款，因而他们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不管价值如何，听任买主出价多少，就出售了，为的是要踏上‘主的道路’，不落后于他人。这样，那时就发生了一种怪现象：大家以高价购进，而以低价出售，就是说，那些路上需用的东西，他们愿以高价购进，同时愿以廉价出售别种东西，以求弥

补开支。早些以前，既不能用监禁，也不能用拷问从他们手中逼出来的东西，现在他们全数以极低的价格让出了。”

“同样可笑的是，有很多人，今天还毫无出发的意愿，就高声嘲笑那些把东西出售的人们，并肯定说，他们将走一条悲惨的道路，而回来时，还要悲惨；不料第二天，他们忽然灵机一动，也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换取了一些钱后，跟着他们所嘲笑的人们一起出发了。”

离规定的出征之日（1096 年 8 月 15 日）尚有半载，急于征发的西欧农民已经坐待不住。

1096 年初春，几支农民远征队已经结集完毕，总人数有几万，约分为六大支。“光蛋”骑士华脱率领的法国北部农民队伍约有 1. 5 万人，隐修士彼得的队伍约 1. 4 万人，奥尔良骑士乎舍尔的队伍有 6000 人，牧师哥特沙尔克指挥的莱茵区农民军也约 6000。此外，英国和洛林的两批农民军约有 1. 2 万人。

春花初放法国北部和中部、弗兰德尔、洛林的首批农民十字军从下莱茵河出发，东进“圣地”。与此前后，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北欧的农民军也踏上征途。

农民们实心实意地要去“解放主陵”，但他们差不多都没有象样的武器。棍棒、镰刀、斧头、铁耙就是他们的“刀枪剑戟”，而且就连这种原始的武器也不是人人尽有。这批农民“基督战士”要赤手空拳求功德！

没有武器，缺少粮食；有的徒步跋涉，有的坐着牛车。一时间，沿莱茵河和多瑙河到君士坦丁堡这条“朝圣之道”上，蜿蜒着几段长长的大车队，声势绝不亚于数个世纪以后的美国“西进运动”。

在农民队伍中，所谓的“士兵”不只是身强力壮的年轻男子。吉伯尔·诺戎曾叹道：“谁还谈及好些出征去的儿童和老人呢？谁能列举那些出发的处女队呢？……”

不明真情的人绝对看不出这是去战斗，这简直是移民逃荒！

东征先锋队虽然是农民军，但其首领却是大大小小的领主和骑士。他们有着较好的武器，甲胄齐备，军事经验比较丰富，而且都是骑兵，这就使得农民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必然落入其手。指挥官主要有：法国的“光蛋”骑士华脱及其叔父奥尔良的孚尔舍尔、威·沙班提埃、克勒

芒伯爵兰柏特；特国的福克马尔、来宁根伯爵爱弥科、杜平根的休格，等。

尽管有这几位“大人”奔走前后，整个农民十字军仍是“无头而行”，对远征的目的地在何方也是茫然无知。随父母东去的孩子们在“路上碰到某一个堡垒或城市的时候，总是问道，这是不是他们所要到的耶路撒冷了？”

对于农民军的“反封建性质”，我们无意去否认，但也没有必要作过分的渲染。他们身处11世纪的西欧，当时的社会条件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场所。他们的种种行动，充其量只能是潜意识反封建行为而已。而且，在随后的征途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是绝对光彩的，尽管他们是“饥饿所迫”。除了要摆脱压迫以外，他们还要打家劫舍！

在有些农民心目中，十字军东征的意义在于为他们提供了抢劫掠夺的手段，在家乡办不到的事情要在东方办成。至于“上帝”的份量有多大，能否真正到达“圣地”，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当然，如能到达“圣地”那更好。

三六九等的农民在领主、骑士们的鼓噪下，开始沿途抢劫屠杀。他们的行为，一方面是饥饿

所迫，出征时他并没有多少粮食可带；另一方面也是宗教情绪使然，天主教会的宣传使得他们对犹太人充满了仇恨。

在路过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拜占庭人的领土时，农民军多次以暴力夺取当地居民的粮食。

1096 年 6 月初，华脱带领的农民队伍到达贝尔格莱德城郊，农民们疯狂地抢夺当地居民的牛马羊，圈栏为之一空。

1096 年 6 月底，孚尔舍尔的农民军占领匈牙利的那特拉城，接着又洗劫了匈牙利与拜占庭交界处的塞姆林城，屠杀当地居民 4000 人左右。

还是在出发不久的时候，农民十字军就在科隆、斯拜尔、佛姆斯、布拉格、美兹、累根斯堡等地大杀犹太人，所剩的犹太人大多逃奔他国。

来宁根的爱弥科、威廉·沙班提埃等纠合的农民军在一路上也没有少做这类行劫之事。

可见，基督徒们自身亦不是一个整体，他们照样可以自相残杀只要情况需要，什么上帝、《圣经》，什么功德、苦行，统统都是说给别人听

的谎言。

农民军肆行抢劫，广开杀戒，当地的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以及拜占庭人当然也不示弱，你不仁我亦不义，同是上帝的子民又有何妨？面对被称为“假基督徒”和“匪贼”的农民十字军，匈、保、拜等国并不过分担心。他们衣衫褴褛，几乎手无寸铁，哪堪正规军队之一击？几次战斗之后，农民十字军损失惨重。哥特沙尔克、福克马尔和来宁根伯爵爱弥科的队伍在匈牙利的维泽尔堡附近全部被歼，其余的则继续向东面的拜占庭窜逃。

据德国历史学家估计，农民军至此已经死亡3万人，而目前尚在欧洲境内，连君士坦丁堡还未到达。

一路上的惨象，给当年的编年史家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或许是因为心有余悸、惊魂未定，洛林编年史家的记载似有夸张：“十字军死伤甚重，血染多瑙河，河水为之变红；尸体顺河而下，密布河面，河水为之不流。”

边走边抢、边走边打了三四个月以后，从1096年7月开始，所剩的农民军陆续抵达君士坦丁堡。首先抵达的是华脱的队伍；8月初，隐

修士彼得率领的农民也疲惫而至。他们忘不了自己的任务：揣饱私囊。

在穷乡僻壤呆久了的农民何曾见过如此繁华的都市？目眩神迷之余，便动手抢劫。拿不动、搬不走的就付之一炬，颇似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他们不仅烧抢商市、宫殿，就连寺院也不能幸免。

到1091年时，拜占庭帝国已经开始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渐趋缓和，它已不需再从西方进口雇佣兵，而且更不需要1096年夏天到达国都的这批农民"援兵"。他们的到来，并没有给拜占庭带来福利，而且抢走了帝国刚刚恢复的相对宁静。在经济上，几万饥饿的农民军也给帝国造成巨大的压力，国家必须低价售给他们粮食。即便这样，农民仍是无钱购买，唯一的猎食办法就是抢劫，动武逞凶乃是常事。

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1081～1118年在位）对这批不速之客无可奈何："这帮不知羞耻的流浪汉！"皇帝决定尽快将他们打发出去。

1096年8月中旬，华脱、隐修士彼得等人将农民十字军移驻博斯普鲁斯对岸，集中驻扎于距尼西亚西北35公里的锡维托特城。

农民军得到消息，这里就是塞尔柱人的地盘，他们所要寻找的“异教徒”就在这里！

9月底，十字军占领尼西亚附近的克塞里戈登城堡。正在得意之时，他们却已被塞尔柱人包围。“异教徒”采用断水、断粮的办法，最终迫使苦守城堡的农民投降，而投降的农民军“战士”旋即被塞尔柱人当作奴隶卖掉。

隐修士彼得似乎是个聪明人，他发现，农民军不受任何约束，而且在战斗中毫无经验，绝无战斗力。看来已是大势去矣，何必再搭上自己这条宝命？彼得离开营地，回到君士坦丁堡避难去了。后来，他又随骑士贵族十字军再度东向，但当十字军被困于安条克之时，他又逃之夭夭。

彼得走后不久，尼西亚苏丹派人散布消息，说尼西亚已被另一队西欧来的十字军占领，意在诱使华脱的十字军上当。

消息传至锡维托特，整个大营变得沸沸扬扬，所有农民军立即赶赴尼西亚，或为分享一份财富，或为达到东征的目的——铲除“异教徒”。

在去尼西亚途中，农民军遇到了早已埋伏好的塞尔柱人的袭击。1096年10月21日，两军对垒，几乎手无寸铁的农民哪能抵挡得住塞

尔柱人骑兵的横扫？一战之后，2．5万名十字军人进入天国，“与上帝同在”去了。华脱以及其他一些首领也随军阵亡。

拜占庭的公主安娜·科姆尼娜写道：“死于伊斯迈尔剑下的高卢人和诺曼人，为数之多至于积尸不是如丘陵高地，而是如崇山峻岭。”

农民军只剩3000人左右，已经无法再向东进，于是乘船退回君士坦丁堡。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有些人立即踏上回归家园的路途，有些人则在此等候着十字军主力的到来。

这就是急于来东方获取“人间利益”的农民十字军的结局。他们未能在东方得到土地和自由，他们得到的只是自身的灭亡。

西欧的领主们并不把农民十字军的失败看成是件悲哀之事。农民葬身异地，没有什么坏处，这样领主的庄园就少了“叛乱者”和“煽动者”的威胁。

虽是假戏一场，但却颇见成效。在使者的狂呼下，骑士、领主纷纷宣誓效忠，甘为主赴汤蹈火。主角开始打点行装，粉墨登场……

农民十字军在东方化作白骨之时，西欧十字军的主力——贵族领主和骑士们尚未出发。农民惨败的消息至西欧，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悲观情绪，在他们的眼中，农民只不过是一群莽撞无知的穷汉而已，失败在所难免。

十字军出征的规定日期是1096年8月15日。1096年秋，不下十支的骑士贵族军队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地结集完毕。

在出征之前，十字军就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他们各自为政，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各支队伍的组成人员时常发生变动，队员们今天投在东家，明天就有可能迁至西家，只要有利可图，何怕朝三暮四！

各支十字军并没有按照规定的日期一同启程，“8月15日”只是教皇乌尔班二世的理想日期。

首先出发的是下洛林公爵哥德夫利四世所率的大队民兵。哥德夫利当时名声显赫。日后更被誉为十字军东征的“大英雄”。他是加洛林帝国查理大帝的后裔，拥有安特卫普公国和下洛林，因其常住在阿登的布里翁城堡，人们便常称之为“布里翁哥德夫利”。

1096 年秋，哥德夫利挥戈东进。与他同行的有其弟鲍尔温。鲍尔温原在教堂任职，充当执事这一卑微小官。由于西欧当时实行长子继承制，鲍尔温没有分享半点先父的领地。兄长带兵东征以求大财横发，鲍尔温也难免为之心动；失之西方，取之东方。“圣战”不仅有利于上帝，而且有利于无地的骑士。宗教和经济双重诱惑驱使着鲍尔温紧随兄长其后，踏上“主的道路”。

加入布里翁哥德夫利东征军的还有他的下洛林陪臣和莱茵河东岸的德国骑士。在哥德夫利的率领下，大军浩浩乎沿着不久前农民十字军所走过的道路向前迈进，顺着莱茵河、多瑙河，经过匈牙利，到达保加利亚，然后再伸向拜占庭。

继哥德夫利之后，1096 年 10 月，南部意大利大兰多公爵普布蒙德的诺曼骑士军在巴黎乘

船，穿过亚得里亚海，直抵巴尔干半岛西岸，在伊庇鲁斯的阿夫罗那港登陆，再经马其顿、色雷斯，奔向君士坦丁堡。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所有首领中，普希蒙德当数最有才智之人，军事才能、外交手腕、组织能力均属非凡。

将门出虎子，盗匪的儿子当然也不逊色。普希蒙德乃是前文所述的罗伯特·歧斯卡尔之子。早在80年代初，普希蒙德就随其父远征拜占庭，希求在巴尔干半岛猎取土地和财富，但却败在希腊军队手中。

不过，普希蒙德并未放弃自己的宿愿。他深感所继承的大兰多公国过于狭小，方寸之地，弹丸之国，怎能容下我普希蒙德这样的人物？大兰多公国地理位置优越，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商人巨贾时常由此中转，巴利和阿马尔非的商客不时地给他带来信息：东方乃是宝地，富庶无比；东方各国不宁，互相倾轧。普希蒙德由此萌发宏愿，在拜占庭得不到的东西为何不能在更远的东方获得？东方吵嚷不宁，正是渔利的大好时机。他要在东方建立一个独立的大公国。

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号召，正合普希蒙德的

下怀。从此，他开始深思熟虑且有条不紊地布署并实施自己的蓝图。

普希蒙德选择了自己的侄子坦克累德作为副手。坦克累德是位无地的骑士，精明且好战，善于冒险，但又不免贪婪。

随着普希蒙德同行的还有他的堂兄弟以及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许多小领主。他们相信，跟着圣明的普希蒙德大干一场，必定收获不小。

与普希蒙德几乎同时出发的是法国南部土鲁斯伯爵兼普罗旺斯子爵雷门四世，因其主要城堡是圣计尔，故人们常称之为“圣计尔的雷门”。

雷门四世已年近六旬，但并未因年龄的上升而减弱他对“宗教功德”和土地的欲望。80年代，他曾进军西班牙，结果一败涂地。如今十字军“圣战”的号角四起，他又坐待不住。自己身处南法，居于西地中海，而地中海的贸易日趋高涨，如能掌握从西地中海到东地中海的贸易航路，近东城市的黄金、白银不就自然而然地流到土鲁斯了吗？不过，雷门四世比较老成，他并未锋芒毕露地把东征目标放在追求财富上。

雷门四世是响应教皇东征号召的第一人。

关于他的决计出征，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密史。

雷门四世并未亲自参加1095年9月的克勒芒宗教会议，他派出一名亲信作为自己的代表。当乌尔班二世演讲完毕，雷门四世的使者立即奔到前台，大声宣布："我谨奉我的主人——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之命，向教皇陛下宣誓，我的主人以及他的所有臣民坚决响应上帝之旨，愿为上帝的事业远征异教徒！"

使者出场呼应，本是定好之计。乌尔班二世在前往克勒芒的途中，曾特意走访了西南欧最有势力的贵族——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教皇要劝说他带头参加十字军，给其他领主和骑士树立一面样板。雷门四世与之一拍即合，既可以讨好教皇大人，又可在东方获利，何乐而不为？于是便出现以上的一幕。

虽是假戏一场，但却颇见成效。在使者的狂呼下，许多领主、骑士纷纷宣誓效忠，甘为主赴汤蹈火。主角开始打点行装，粉墨登场……

雷门四世响应最早，但出征并未领先。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和招兵买马，1096年10月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沿着亚得里亚海岸，经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然后循着普希蒙德所走的路

线前进，中转站也是拜占庭。

土鲁斯伯爵雄心不小，大有义无反顾之气概。他要在东方定夺乾坤，因而携带着妻子卡斯提的爱尔维拉和年幼的“储君”——未来的伯爵同行。

投在雷门四世旗帜下的，有许多南法中小领主。另外还有几名主教，其中之一是“国使”、教皇在十字军中的代表彪伊主教蒙泰尔的阿台马尔，教皇命他在所经之处保卫罗马教会的利益。

比雷门四世稍早出发的是法国中北部骑士军，首领是法王的幼弟蒙达的休格。休格虽家世显赫，但只拥有一个不大的公国，因而“圣战”也给他带来无数的美梦。但是，好梦难圆，未等见到“异教徒”的模样，他的队伍便宣告瓦解，因此人称“倒楣的冒险家”。1096年8月，他率领自己的陪臣翻山进入意大利，准备从巴利渡海进军拜占庭。当船舶行至亚得里亚海东部时突遇风暴，舟船倾翻，陪臣大都毙命鱼腹。休格尚保一命，昏昏沉沉之际被水流带至都拉索附近海岸上，垂头丧气地挪到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庭皇帝行乞求生。

此外，还有一批来自诺曼底、弗兰德尔、布尔瓦和英格兰的骑士十字军，其指挥分别是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布尔瓦伯爵斯蒂凡和弗兰德尔伯爵罗伯特二世。

值得多言几句的是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他是征服者威廉的长子，1066 年威廉入主英国后，罗伯特承袭公爵职位，后与兄弟"红发"威廉二世争夺王位，结果失败，连诺曼底这块看家的领地也差点落入其兄弟之手。正在苦恼无望之际，十字军东征的号召给他一线拨云见日的希望："何苦在家中斗殴生闷气？美妙的前程在东方！只要我能在东方获得一席之地，绝不再踏上这片只会带来烦恼的土地，全送给你威廉二世陛下吧，我的贤弟！"情激之下，罗伯特便带领自己在法国的陪臣，连同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贵族骑士，到东方寻宝去了。

这批英法骑士军越过阿尔卑斯山，于 1096 年 11 月到达意大利。此时已是寒冬，不宜长途跋涉，他们便在这里逗留长达数月，直至第二年春天，他们从布林的西渡海到都拉索，再沿着古罗马旧道——埃格纳息亚大道，到达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

以上几支十字军的出征，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真正开始，其主力是贵族和骑士。但尾随其后的还有不少农民，赶着牛车紧追骑士们的快马。他们仍然希望能到异国他乡交些好运，用千里长征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并与高高在上的领主们共同去完成教皇所命的“敬神大业”。

与惨遭失败的农民十字军相比，在物资、武器装备以及组织上，这批十字军要好得多。他们虽然觊觎东方的财富，憎恨“残害忠良”的“异教徒”，但并不急于求成，他们要等一切准备妥善之后再作进军一说。这正是其高于农民军之所在。

兵马未至，粮草先行。贵族骑士们觉得，必须预先备好路上所需的一切物资。其筹集资金粮饷的途径主要有二：

其一，把土地及其他财产出售或抵押他人。参加十字军的人急需现款，地价自然下跌。教会及其他领主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大量增殖自己的财富。布里翁哥德夫利与列日和凡尔登的主教们签订契约，出卖大量土地，并将祖传的布里翁城堡抵押给列日主教，共得现款3000银马克。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全部

抵押给英王威廉二世，获得现款1万马克。大人们如此，臣子们也群起效之，他们把大大小小的审判权、狩猎权等全部卖掉，并将土地房屋抵押出去。如有一个姓阿沙的骑士，他把自己的封地抵押给克吕尼修道院，共得100里昂苏和4匹骡子。

其二，掠夺农民。首先是掠夺自己领地里的农民，据当年的编年史书记载，当这批“基督战士”掠完之后扬长而去时，村里只留下哭声一片。其次是掠夺近邻的农民。弗兰德尔伯爵罗伯特二世感到囊资不足，便与邻近的甘布莱主教作战，直抢得主教领地“野无农夫，不留一头公牛、母牛或其他牲畜，男女老幼竞奔邻邑，乞求救济。”

骑士军的武器装备、组织管理也非农民军所能相比，这就保证了骑士们在东征初期活动比较顺利，并能取得一些暂时的成果。

不过，骑士军有一点与农民军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沿途打家劫舍。

布里翁哥德夫利的洛林骑士军，不辞旅途辛劳，抢遍整个下色雷斯；

大兰多公爵普希蒙德的军队不甘落后，到

巴尔干半岛之后，打村劫店，杀人放火，伊庇鲁斯、马其顿、色雷斯等地的居民闻之丧胆；

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的队伍也毫不逊色。军队经过达尔马提亚时，当地居民拒绝“卖”给他们任何东西，拒绝为他们做向导，并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宰杀牲畜，运走粮食，然后逃离村庄。土鲁斯伯爵哪能容忍他们对“基督战士”有此等的不敬？有一次，这位“最杰出的十字军领袖”下令，将捉来的一位“蛊惑闹事者”先是剜目，再砍去手足，最后斩首示众。真乃恨小非君子，在一旁的随军牧师对伯爵的行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其后来所著的编年史中，当叙述到这壮举时，仍没有忘记为主人得意扬扬一番。

这只是十字军东征的序曲，是尚未完全显露真谛的前奏。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还在等待着他们去开恳，去拓荒……

1096 年底到 1097 年初，英、法、德、意以及西班牙等国的十字军陆续抵达君士坦丁堡，他们要从这里取得其所需的物资，然后再东进去征服被“异教徒”占据的“圣地”。

十字军的到来，使得拜占庭政府大为震惊。皇帝阿历克塞一世指着“基督战士”的鼻子道：

“朕不需援兵！朕何曾请你们来救驾?!”

皇帝心中明白，“拯救拜占庭于危难之中”的西方“援兵”根本不是来援助基督教弟兄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渔翁之意不在鱼，他们称要“光复基督教的威严”，只不过是摆设的门面罢了。

皇帝更清楚，十字军人数众多，如果都挤到京都来，则不下十万人。这班混乱如麻、漫无纪律的神兵天将如在君士坦丁堡驻而不走，那就太危险了。食品难保，金银难保，马匹难保，民众的性命难保，就连君士坦丁堡本身也将面临被宰割的局势。

但令阿历克塞一世迷惑的是，数年前拜占庭曾经鞠躬在罗马教皇那双高贵的脚前，诚惶诚恐地吻了几遍，请求“仁慈的兄长”派兵援救落难的凤凰，但教皇并未爽快地应承“罗老二”的请求。而今日，拜占庭并没有卑躬屈膝地去求告罗马教皇，甚至还昂首挺腹地俯视教皇那张且傲且卑的大脸。尽管拜占庭前些年战事不断，小亚细亚、叙利亚以及其他在东方的土地皆被东方各族夺走，但是拜占庭尚能偏安于东南欧之一隅，目前的局势还算相对平稳。此时的拜占

庭不需这批抱着特殊目的而来的“援兵”。然而，他们终究来了。

既来之，就得安之。阿历克塞一世不是一个专事声色犬马的昏君，他尚属有见地、有头脑的精明之人。对待这样一批虾兵海将，不能采取极端的措施。如想把他们绝对打倒，根本不可能，因为拜占庭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如果一味哄着他们，也容易酿成后患，摘了星星之后还会要月亮，坐在肩膀上还想爬到头顶上蹲着，这样下去，拜占庭岂不葬送在这帮基督战士之手？

阿历克塞一世谋划已定：对十字军采取两手政策，既拉又打。一方面要让他们知道拜占庭不是温顺的绵羊，宰屠任便；拜占庭有力量制服他们（当然这是大话，权当宣传品之用）。同时也要让他们意识到，拜占庭皇帝是一代圣贤的明君，“只要你十字军奉律守法，听顺于朕的调遣，朕也是大仁大义的。”

首先必须让十字军尝一尝拜占庭的铁拳。当然，如果实在没有“国产”的铁拳，从国外引进一些可靠耐用的也行，反正拜占庭的国库还算充实，每年靠君士坦丁堡这座“黄金桥梁”可以获得还算过得去的中转贸易利润。

当十字军刚刚踏上拜占庭的领土之时，阿历克塞一世就已买好佩彻涅格人，命他们随时打击在巴尔干半岛横行无忌的西欧十字军，与游牧民族佩彻涅格人为敌，十字军吃力不小。佩彻涅格人长期生活于东南欧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箭法、马技、体力都远非来自西欧的“多情的骑士”所能比拟。但是，有一种因素在客观上帮助了十字军人。佩彻涅格人袭击十字军的次数以及卖力大小，要依拜占庭方面提供的报酬多少而定，数额丰厚时就大干，否则就敷衍或干脆不干。要让拜占庭长期高薪聘请这帮“草原高手”也不容易，拜占庭的收入毕竟有限。

布里翁哥德夫利、大兰多的普希蒙德、雷门四世等人多多少少地领略了佩彻涅格人的铁拳。哥德夫利曾大声慨叹“虎落平原”，一时竟担心“命不将保”。

拜占庭自己的军队也被启用，不时地出击东一支、西一队的十字军。其中最显雄威的一战是在罗多斯托附近对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的攻伐，“基督战士”抛武器，扔辎重，落荒而逃。

阿历克塞一世的另一手就是利用这批不速之客，以达到靠拜占庭自身力量所达不到的目

约：恢复拜占庭帝国昔日的大国形象，把这几百年失去的领土夺回来，要把从拜占庭皇宫窗户里所看到的高山平原收归国有。

金瓯残缺，半壁江山，阿历克塞一世的心情并不平静。贪求奢逸，偏安一时，岂是“孤家”拜占庭皇帝的心愿？

阿历克塞决计，劝诱十字军首领向他宣誓效忠，让罗马教皇的子民变为拜占庭皇帝的臣属。当然，作为君臣之礼，拜占庭皇帝也应有所恩赐：将来他们所攻掠的土地一律作为帝国给予他们的封地，他们就是一方之主，拜占庭方面不再另派官员。

如能顺利地建立藩臣关系，阿历克塞一世的方案则不失为良策。尽管将来夺取的土地仍归十字军首领所有，但它毕竟挂上了“拜占庭”的牌子，将来再等待时机，尚有逐步收回的希望。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十字军首领们不愚不笨，阿历克塞能想到的，哥德夫利、雷门四世、普希蒙德同样也能想到。各人自有心腹事。他们都在盘算着与拜占庭皇帝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才是上策。

既然作出选择，就得坚定地走下去。要么先礼后兵，要么先兵后礼。阿历克塞一世主意已经拿定。

1096年底至1097年初，布里翁伯爵哥德夫利率领的法、德十字军开抵君士坦丁堡。阿历克塞一世立即展开外交攻势，派使臣传达自己的旨意：敦请伯爵宣誓称臣。

无奈哥德夫利无意向拜占庭皇帝俯首，他告诉使臣："一仆不事二主，我乃天主教的子民，我唯一的主人是罗马教皇陛下！"

十字军与拜占庭出现严重的对抗。阿历克塞一世随即放下外交手段，准备采用军事威胁的方法达到目的。佩彻涅格人骑兵再次被召到皇宫殿前，皇帝命他们立即出动，围攻不听摆布的布里翁伯爵的营寨。佩彻涅格人的骑兵冲破了伯爵的防线，十字军人十分狼狈。

歌德夫利意识到，在人矮檐下，就得毕恭毕敬地低头，先痛快地答应他，至于将来的事情留待以后再论。

于是，歌德夫利表示愿意向拜占庭皇帝称臣。一仆事二主有何不可，只要形势需要，只要有利可图！

不论诚意多大，既然做了他人的臣子，就得服从调遣，况且还在皇帝的眼皮之下。

歌德夫利称臣不久，就奉阿历克塞一世之命，东渡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小亚细亚。拜占庭皇帝的意图是，不能让所有十字军都留在君士坦丁堡，来一支就送出一支，免得集结在首都破坏他的战略计划。歌德夫利并不留恋君士坦丁堡，他的目标是小亚细亚，是圣地耶路撒冷，他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王国。

1097 年 4 月初，大兰多公爵普希蒙德的军队到达君士坦丁堡。闻听普希蒙德到来，阿历克塞一世吃惊非小。大兰多公国是拜占庭的世仇，十多年前普希蒙德之父罗伯特·歧斯卡尔曾苦战希腊大地，败北西归后，两国再无交往。如今普希蒙德的到来，会给拜占庭带来什么？莫非要父债子还？看来免不了要大动干戈。阿历克塞一世心惊之余，立即做好军事准备。

完全出乎拜占庭皇帝意料之外，昔日的仇敌今朝变成了朋友。

普希蒙德稍加斟酌，便同意奉阿历克塞一世为主，成为拜占庭皇帝的藩臣。普希蒙德谋虑过人，对眼前的事情看得极远，俯首称臣，虽言

不由衷，却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来日方长，何必吝啬于多说几句动听的谎言？

惊诧之后，阿历克塞一世也悟出了对方的用意，于是对普希蒙德发出了一些连自己也绝不当真的诺言。

普希蒙德的军队并未滞留太久，4月底，便和和气气地撤出君士坦丁堡，规规矩矩地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冲向小亚细亚。脱缰以后的野马，再也无拘无束了。

正当普希蒙德的军队离开君士坦丁堡之时，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又率队而至。两位首领匆匆会面之后，随即分手。

临行前，普希蒙德对雷门四世说道："伯爵阁下一定要见机行事，如果拜占庭皇帝要您称臣，依我之见，您不妨先答应下来。"

雷门四世哪有普希蒙德的心计？他坚决拒绝了普希蒙德的"良言相劝"："我为基督而来。我参加基督十字军，不是为了称王称霸，也不是为了替他人卖命。我之所以舍弃了故国的土地和财富，只是为了万能的上帝！"的确，雷门四世并没有完全醉心于掠得土地，这在其后的安条克公国归属上，可以看出来。

拜占庭皇帝见雷门四世态度强硬，便又动用军队，袭击雷门手下的骑士军队，并围攻雷门的大营。但雷门四世打败了拜占庭军队。

土鲁斯伯爵仍然坚信："我的目标是圣地耶路撒冷。我已六旬老人，出口之言岂是儿戏?"

既然如此，实力不济的阿历克塞一世对之也奈何不得。

从总体效果看，拜占庭的外交战在表面上获利不小。几乎所有的十字军首领都按西方礼节宣誓，成为阿历克塞一世的封疆藩臣，他们答应在战胜"异教徒之后所夺得的领土归属拜占庭，但治理权在于十字军首领。"

1097 年春，后到的十字军队伍也陆续从君士坦丁堡启程，开往小亚细亚，开始了两年多的耶路撒冷远征。

跋涉千里所要寻歼的"异教徒"就在眼前……

尼西亚之战，拜占庭皇帝戏耍十字军；中途分道，鲍尔温定都伊德萨。与一位“名人”之女结婚之后，鲍尔温乐不思蜀，解放“圣地”的计划被抛到了脑后……

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便是小亚细亚，十字军进入了塞尔柱人的汪洋大海之中。

各支十字军开始联合起来。不过，这种联合极其松散，仍无统一指挥，只是乌合而已，根本保证不了行动的协调。

“基督战士”与塞尔柱人的首战发生在尼西亚，它是苏丹基利什·阿斯兰统治的尼西亚帝国的首都。

1097 年 5 月初，各路十字军陆续开抵尼西亚近郊。会师之后，大小首领和普通士兵情绪高昂，远望着城内的异教徒，恨不得飞身进去斩杀一空。

休整布署完毕，大队人马开始围攻尼西亚。6 月，十字军发动总攻。令十字军首领们稍有感激的是，拜占庭皇帝派来舰队和士兵，协同十字军一起攻城。

十字军首领岂知其中有诈？阿历克塞一世了解“基督战士”的心理，对他们此前所作的诺言不敢深信。拜占庭军队名为助战，实为督阵。

就在十字军将攻未攻之时，尼西亚苏丹基利什·阿斯兰已经出城而去，准备另整旗鼓，来日再斗十字军。城内守备空虚。

攻城计划进展顺利。“基督战士”开始攀登尼西城墙，十字军成功在即。

然而，形势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十字军人没有注意到，在他们奋力爬墙时，拜占庭的军队却向某一个城门靠近。突然，城门大开，拜占庭军队迅即移师入城。

十字军人尚在惊愕迷茫之中，城门已被关闭，尼西亚的城堡上飘扬起拜占庭帝国的旗帜！

尼西亚易帜，是阿历克塞一世又一次成功的外交战。原来，他担心尼西亚城落入十字军之手，便派人与守城将领密谈，以重金贿赂成功，尼西亚随成为拜占庭的囊中之物。在拜占庭方面，阿历克塞一世英明果断；而在十字军看来，这简直是背信弃义。

阿历克塞一世也明白，这样的交易并不光彩，而且还有可能把十字军完全推向自己的敌

对方面。十字军攻城，杀“异教徒”是小事，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得城里的财富，并永久占领这座城市。大失所望的十字军必然要与拜占庭帝国树敌。

阿历克塞一世为安抚十字军的人心，发放钱财，以补偿其人员伤亡和其他损失。

沮丧、怨恨、恼火之后，十字军也就毫不客气地接过补偿金，怀着伺机报复的心理，挥师向东南进发。

山路崎岖，缺水少食，这时又正处闷热的夏季，炎炎烈日使得人困马乏。更令十字军人不宁的是，塞尔柱人时常伏击他们，而且在许多地方坚壁清野，十字军士兵不得不忍饥挨渴。

1097 年 7 月，十字军到达多利勒伊城附近(在尼西亚东南数百公里)。尼西亚苏丹基利什·阿斯兰正屯兵于此，准备与“基督战士”决一雌雄。多利勒伊大战一触即发。

大兰多公爵普希蒙德深谙军理。尼西亚苏丹以逸待劳，而十字军孤军深入，给养不足，气候不适，人疲马顿，如何能抵敌手？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士兵们稍事休息，然后充分激励其作战的勇气。勇兵必胜，哀兵必败！

用什么来鼓舞士气？普希蒙德自然了解手下人的出征目的。他向士兵发出号召："对基督教一心一德！天国的荣耀属于勇往直前的勇士，上帝的眼睛在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但这只是未来的恩典，口惠而实不至的荣誉。普希蒙德同时宣称："只要上帝保佑我们今日战胜异教徒，你们都将成为富有之人。多利勒伊城里的黄金白银，都是仁慈的上帝发给你们的酬金，勇敢地去战斗，勇猛地去夺取！灿烂的黄金，耀眼的白银就在前方的多利勒伊城里！"

黄金和白银迷住了"基督战士"的心窍。与即将到手的财富相比，使人困马乏的炎炎烈日算得了什么？如能在上帝的指引下把异教徒打得落花流水，多牺牲一点血汗又算得了什么？为财富而战，为上帝而战。心中不可没有上帝，但是财富位列第一。

1097 年 7 月，十字军进攻多利勒伊。远离家园的十字军背水而战，颇具悲壮的气氛，但又不乏急切的心情，普希蒙德的临阵演说使十字军人仿佛见到了城里遍地的宝藏。

十几天的鏖战，基利什·阿斯兰的兵力损

失惨重，这位立志报前仇的尼西亚苏丹只得再度逃奔异地，另谋宏图。但多利勒伊大战基本决定了小亚细亚的战局，尼西亚的军队在短时期里还没有能力恢复过来。

十字军人的精神为之一变，胜利的热流直冲脑际，脚步也变得轻松起来，十余万人直趋东南。

1097 年 8 月末，军队已经跨越千里，来到赫拉克利亚。十字军主力转向东北的开塞利，继而抵达马拉斯。另有一部分则离开主力，急转南下，侵入亚美尼亚的西里西亚。这部分十字军的首领是哥德夫利之弟鲍尔温和普希蒙德之侄坦克累德。

鲍尔温等人的分离，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史上颇为重要，它预示着第一个十字军国家——伊德萨伯国即将出现在地中海的东北岸，它将是几个十字军国家中建立最早、面积最大、到手最为容易的一个。

在亚美尼亚的西里西亚，鲍尔温与坦克累德本想同舟共济，一同杀进滨临地中海的塔苏斯城，“谁能多抢就多抢，谁能多夺就多夺”。然而利益不能均分，两支军队内部火并，大闹塔苏

斯，鲍尔温戏耍了坦克累德。从此两人分道扬镳，鲍尔温继续东进，准备与此时已经抵达西里西亚东境要塞马拉斯的十字军主力会合。

到达马拉斯仅仅两天，鲍尔温再次离开主力，东进伊德萨。鲍尔温颇具心计：孤军出征有危险，遇到强敌很可能全军覆没；但如果出师顺利，所得一切必将全归于他一人。成功成仁，听由天命。

1098 年初，鲍尔温进军富庶的亚美尼亚城市伊德萨。伊德萨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处美索不达米亚至叙利亚的要冲，手工业发达，是南来北往商队的聚散之地。伊德萨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一直引起周围部族的垂涎。11 年前（即 1087 年），塞尔柱人占领了伊德萨，“异教徒”霸占了这座富饶的城市。

尽管塞尔柱人在名义上是伊德萨的统治者，但他们并未将城内的基督教徒赶走，亚美尼亚人托罗斯仍然统治着这座城市。塞尔柱人的内讧使得托罗斯有机会周旋于塞尔柱人与拜占庭帝国之间。虽然托罗斯已经拥有相当的自主权，但他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将塞尔柱人的势力完全排挤出去。

鲍尔温到达伊德萨之后，立即得到托罗斯的赏识。1098年2月，托罗斯宣布，鲍尔温成为自己的继承人，日后将统治伊德萨。

然而，伊德萨的局势十分复杂，阴谋与托罗斯敌对的贵族不在少数。鲍尔温了解内情后，行事十分谨慎，既与托罗斯搞好表面上的关系，获得他的绝对信任，同时又暗中与阴谋反对托罗斯的贵族集团接近，争取他们的支持。鲍尔温在伊德萨的地位得到了来自双方的保险。

时隔不久，伊德萨爆发起义，城市居民和一部分贵族公开反对托罗斯的统治。兵慌马乱之中，托罗斯被杀。

作为托罗斯继承人的鲍尔温却安然无恙，一则因为他与政变的贵族久已有所接触，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贵族们有自己的目的，希望把这位十字军首领变成驯服的工具，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政权转到了鲍尔温之手，伊德萨名正言顺地成为他的领地。

如今的鲍尔温已经乐不思蜀，并与当地一位“名人”之女结了婚。有了伊德萨，还管什么耶路撒冷？这里有的是权力、金钱、美女，去

“圣地”难道还能得到更多么？

奉鲍尔温之召，随同来此的其他领主们也渐渐淡忘了他们原先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夺取伊德萨居民的财富已经让他们没有更多的闲暇去想什么“异教徒”了。

亚美尼亚人信仰基督教，然而十字军的到来却使他们受到比从前更为严厉的“礼遇”。鲍尔温“日日忙于收受人们奉赠的许多金贝桑、泰连（货币名）、金币和白银器皿。”

伊德萨的亚美尼亚编年史家马太有这样的描述：十字军人们“为财物做了简直是屈指难数、闻所未闻的恶事，国家受掠夺，人民遭浩劫。他们只想作恶，喜欢走邪路。”——这是马太的亡国之痛。

“亚美尼亚教友”恍悟：十字军并不是自己的弟兄，昨日的盟友今日成了税民狂。

1098年12月，伊德萨城乡民众起义，并邀请“异教徒”塞尔柱人予以协助。但起义遭到彻底的镇压，起义领袖被捕后，鲍尔温下令将之处决，其财产全部没收，归法兰克骑士所有。更多的起义者则是被捕入狱，让其永远不得见天日。

在东方的第一个十字军国家伊德萨伯国由

此逐步确立并暂时巩固下来。

昨日的围攻者，今日成为被围者，十字军人好不狼狈！普希蒙德反败为胜，乾坤定于安条克，但不久却从自己的军中传出咒语："让愿意留在安条克的人见鬼去吧！"

鲍尔温从马拉斯东进伊德萨以后，十字军主力也从西里西亚的这个边塞出发，向南推进。

1097 年 10 月 21 日，十字军到达地中海东岸大城——安条克附近。途经一地，收复一地，要让被"异教徒"占领的土地全部回到主的怀抱，这是十字军人的目标。这样，既可以给上帝增光，求得上帝的青睐，同时更有益于自己的腰囊。多种因素的糅合激发了"基督战士"的斗志。

安条克当然也免不了被"光复"的荣耀。它是地中海东岸最大的城市之一，人烟稠密，商旅继踵，曾长期处于阿拉伯帝国统治之下。从 10 世纪 60 年代起，随着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衰微，安条克转入拜占庭帝国之手。三十年河东转河西，拜占庭的国力也每况愈下，1084～1085

年，东面的塞尔柱人占领安条克。从1087年起，塞尔柱人总督巴歧·塞扬成为安条克的一城之长。塞尔柱人的执政，并未给安条克的商业贸易地位造成太大的损害，商贾云集照常，车水马龙依旧。

安条克的营建历经数百年，城址的选择相当考究，其西南部位于崇山峻岭之上，当年城市营建的规划者必然考虑到了“易守难攻”的准则。据当代人记载，安条克城墙极厚，四马并行毫无阻碍，城墙四周共设有450座谯楼，城防安全自然极其可靠。

大兰多公爵普希蒙德一来到这座被“异教徒”侵占的城市之郊，心中便油然而起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和统治欲。放眼远望行行青砖密砌的安条克，公爵却又望而生畏：金城汤池，破之不易！但是，安条克巨大的诱惑力终于战胜了他临阵的胆怯。

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想的没有普希蒙德那么多，冲动的宗教热忱使得他忘乎所以：“何必畏惧眼前这点小小的困难？这是贤明万能的上帝在考验我等的勇气和虔诚。全体基督徒弟兄们，拿出信心和勇气，遵循上帝的感召，别再犹

豫了！”

1097年10月下旬，十字军开始围攻安条克，时近一年零两个月的“安条克之战”由此开幕。

十字军在城下忙忙碌碌，东走西跑。而城内的塞尔柱守军却显得比较沉稳，城墙坚不可破，粮食储备充足，短时期内不会出现危局。

十字军面对东方类型的高大城墙，显得有些笨拙而行不得法。西欧社会几个世纪的熏陶，使得“基督战士”们习惯于单枪匹马地独战，一对一的沙场决斗方显英雄本色，为贵夫人而单刀赴会亦再所不惜。然而，到了东方就得适应东方的作战方式，为石榴裙而剑来枪往的“骑士式作风”至此已经显得荒唐可笑。

十字军人是“基督战士”，但围城却不是他们的专业。从攻城之日起，一直到第二年年中，半年多时间过去，十字军屡战屡败，一筹莫展，堵东墙则西墙漏，堵北墙则南墙漏。被困在城里的塞尔柱士兵不时地从南城突击出来，搅乱十字军的阵营，打乱他们的粮食运输计划，然后流星般地撤回城内。

骑士剑胆琴心，深得香闺绣阁的欣赏和钦

佩，但却封不住、攻不下东方的安条克！

开始围攻安条克之时，当地已是秋风落叶。时间的推进等不了十字军的“捷报”，阴雨连绵的冬天照常而至，及至围城第三个月，备用物资消耗殆尽，身在异域，补给相当困难。

多情的骑士们尝到了老天的无情。忍饥挨饿自不必说，攻城的前景更令这帮“海外赤子”沮丧。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西方援兵自海而至，英吉利、弗兰德尔、热那亚等地派出数十艘船只，由几千人组成的商业性军队沿大西洋和地中海来到安条克。

面对铜墙铁壁，“援兵”也是叹而观止。他们的到来与杯水车薪无异，只能望着城墙上的塞尔柱人旗帜而无可奈何。

“异教徒”们当然也不甘心在城内坐以待毙，被困城里的塞尔柱人总督巴歧·塞扬派人向其他塞尔柱人首领求救。不久，三支塞尔柱人大军先后向安条克驶来。

短兵相战，十字军又显示出自身的优势来。

十字军首先迎战来自南方的大马士革总督杜夸格派来的军队。普希蒙德和弗兰德尔伯爵

罗伯特两军联合，苦战“异教徒”。遭受巨大损失后的杜夸格军队被迫南撤，十字军一战告捷。

波平波起，击溃杜夸格军队之后，居于安条克东方的阿雷波总督雷德凡又遣大军相助。普希蒙德再战再捷，雷德凡的军队又成为十字军马蹄下的败兵。

强弩难抵车轮战，十字军的处境越发艰难。正当十字军喘息小憩之时，第三支援助安条克的塞尔柱人士兵从东方开向安条克，人数约有四、五万，首领是以军事才能而著称的摩苏尔总督克波加。

闻听克波加将至，十字军人大惊失色，甚有黔驴之慨。病急之下，哪论良药假药，十字军抛开宗教信仰上的分歧，求助于埃及的法提玛王朝，表达与之结盟共抗塞尔柱人的迫切心愿。

法提玛王朝权臣阿里·阿夫达尔提出条件：共享胜利成果，瓜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且耶路撒冷归埃及所有。

前一条件尚可协商，但将耶路撒冷拱手法提玛，十字军岂能接受？十字军的联盟计划无果而终。

普希蒙德不乏心计，他要效仿当初围攻尼

西亚时的拜占庭。经过精心策划，普希蒙德以重金买通了一位安条克守城军官，这位军官负责保卫西部谯楼，他答应献城，让普希蒙德的军队从他管辖的城市进入安条克。

普希蒙德心中大喜，他要以此换得十字军其他首领的支持。这位大兰多公爵明白，诸位首领皆有心腹事，必须软硬兼施，方能达到目的。

1098 年 5 月末的一个夜晚，普希蒙德召集各家垂头丧气的首领，向他们发布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诸位兄弟，不必心惊肉跳，更不必无精打彩。诸位打起精神，安条克指日可以攻克！"

首领们以为普希蒙德在说笑话以解闷消愁，全都瞪着眼睛在看这位公爵在云山雾罩。普希蒙德见众人不信，便将实情叙述一番。

普希蒙德的营帐顿时活跃起来，几个月以来的颓丧情绪即刻冲洗净尽。十字军首领们正要恭维并感谢普希蒙德的"首功一件"之时，普希蒙德摆出了久蓄心怀的条件："成功之后，安条克归我统治，别人无权过问！"

大兰多公爵的条件恰恰正是许多十字军首领们一直追求的目标，他们当即拒绝了公爵的

无理要求（何谓有理，何谓无理，他们内部自有公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公正无私的基督战士”，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便为其一。

雷门四世并不要求独吞安条克，他声色严厉地指责普希蒙德背信于拜占庭：“阁下曾在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前立誓，愿为拜占庭的臣属，所得之地一并归属拜占庭。如今阁下何能出尔反尔？本人虽未向拜占庭称臣，但对于阁下的行径，实属不可容忍！本人不图占有安条克，但也绝不赞同由阁下掌握此地。我们的目标在耶路撒冷！”

首领们的抵制并未动摇普希蒙德的初衷，但他十分精明，当场表示收回自己的“无理要求”。同时他又声明，他将放弃与那位答应献城的塞尔柱人军官进行接触。

普希蒙德反手将了首领们一军，他似乎要与全体十字军将士同归于尽！

令十字军惊惶失措的消息接踵而至：克波加的大军日益逼近安条克！

如果克波加的军队真的到来，那么忍饥挨饿、士气低落的十字军绝对不是对手。到那时，就只能在“主陵”附近另开一墓，与耶稣基督共

享“圣地”的荣耀了。但他们不甘心过早地去享受天堂的快乐。世俗生活的吸引力可以嘴上不说，但心里不可以不想。

在克波加军队的压力下，十字军首领们被迫对普希蒙德作出让步，接受了此前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条件。只要能逃出似乎已是死路一条的绝境，也就顾不上要争夺什么安条克了。

1098 年 6 月 3 日深夜，普希蒙德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守城的那位塞尔柱人军官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打开西城门，普希蒙德的军队迅速进入安条克城内。

同时，其他各支十字军在安条克城的南、北、东面发起猛攻，以转移守城军队的注意力。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安全，十字军将士竟然团结合作得相当出色。

塞尔柱人被从天而降的“基督战士”弄得措手不及，总督巴歧·塞扬及时逃走，安条克落入十字军之手。

七个月的攻城守城，双方都已精疲力竭，饥饿的困苦更使十字军人火气大长。他们恨透了坚守城池的塞尔柱人“异教徒”：“如果早日攻克

这个安条克，我等哪至于落得这般瘦骨嶙峋?”

进城之后，“基督战士”将城内仅剩不多的食品全都挖了出来，几天之后便被狂饮滥嚼得空盘净碟。

有了精神之后，十字军开始报复让他们受尽苦难的“异教徒”，一经发现，就将之置于死地。

攻城的胜利使十字军忘掉了近在咫尺的危险。疯狂的热情消减一些后，他们环顾城外，不由得再次惊恐万状。克波加的数万大军包围了安条克！十字军如处瓮中，插翅难飞。

昨日还是围攻者，今日却处于被围者的地位。几天来的狂热情绪一扫而光。

克波加的军队安扎在安条克四周，并不急于攻城，而是牢牢地将之困住，其计划是要让安条克城不攻自破。克波加对城内的粮食储备有个粗略估计：即使还有，也是所剩无几，因为几个月以来，城内与外界几乎断绝了一切往来，根本没有机会补充城内的供给。

克波加的估算没有错，十字军此时确已断粮，生活极端困苦，草根树皮被用作充饥之物，甚至连死人肉也用来填充辘辘饥肠。士兵们回

想着几天前的狂食暴饮，垂涎落地，后悔当初不曾留一些以备后日之需。

被困的十字军不再有当初从家刚出发时的那一腔热血，到东方发财的美梦就此打住。现在手中有多少就算多少，如想再图增殖似乎完全无望，如果坐在城里等待塞尔柱人的刀枪临头，那就更是一切皆空了。

尚未到达"圣地"，"基督战士"便不再为上帝卖命，一部分十字军骑士和领主开始逃离安条克。在圣地、上帝和性命、钱财之间，勇士们还是勇敢而坚定地选择了后两者。他们大多在夜深人静之时用绳索坠下城墙，奔向海边，搭船返回欧洲。

逃兵中有一批腰肥囊满的抢劫富翁，他们担心手中的钱财得而复失，同时也是为了保命便放弃了继续留在东方的念头。他们撇下"上帝"而直趋老家。

有一个典型，这就是法国大领主布尔瓦伯爵司蒂凡。在法国时，他就是权倾一时、财横一世的巨富。参加十字军东征不仅没有给他造成经济损失，反而更加增强了他的经济实力。司蒂凡曾从安条克写信给其夫人，信中得意非凡地

称：“亲爱的，请相信我现在所有的金银，已经比与你分别时多了一倍。”

司蒂凡不愿为“上帝”而丧失手中的财物，便卷起行囊，暗暗逃离安条克，从海路回归法国。

还有一些人，他们之所以偷逃，则完全是为了保住“上帝”所给予的生命，前文所述的隐修士彼得便为其一。

当然，逃亡人数并不十分巨大，因为城外克波加军队使得他们找不到更多的脱逃机会。

许多十字军士兵对前途已经绝望，陷入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宗教狂热，日夜祈祷着“奇迹”的出现。尽管他们认为，上帝过于虐待甘愿为他而牺牲的子民，但他们仍然相信，上帝终究会公正无私的。之所以险象环生，说不准又是上帝在磨练他们的意志并考验他们的虔诚呢。

十字军士兵日夜祈祷的“奇迹”果真出现不少，其中最为有名的要算所谓“圣矛”的发现。

法国普罗旺斯的一位农民彼得·巴托罗美，有一天来到其首领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的营帐，告诉主人他在梦中看到使徒安德烈“显圣”，使徒告诉他“圣矛”（当年罗马士兵刺死耶

稣时所用的矛)的所在地。它埋藏在安条克的圣彼得教堂之内,如果十字军能够找到,那么十字军将会豁免一切灾难,转危为安。雷门四世下令按图索骥,果然在圣彼得教堂发现了使徒安德烈所指示的"圣矛"。

十字军似乎有救了。中世纪的许多编年史作者相信,后来十字军的胜利完全归功于这一"奇迹"的出现。

但是,在十字军中,并不是人人都相信这个由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及其亲信所创造的"奇迹"。教皇代表阿台马尔认为,"奇迹"太奇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大兰多公爵普希蒙德更是一眼望穿,嘲笑雷门是在故弄玄虚。

雷门四世也感到"圣矛"的出现太人为化了。为了保住自己的尊严和威信,他让手下的牧师对做梦的彼得·巴托罗美进行"火的考验"。据说,如果"奇迹"是真的,巴托罗美便遇火而无恙,否则会葬身火海。巴托罗美当时没有被烫死(只因手下稍稍留情之故),多少保全了雷门四世的面子。但事后不久,巴托罗美却因火伤而密秘地死去。

在当时的环境中,宗教宣传确实可以起到

一定的刺激作用，能够鼓舞士兵进行“圣战”的斗志，提高挨饿忍饥之军的士气。但是，要把战争的胜负完全归于所谓宗教“异象”和“奇迹”上，那则绝对是中世纪式的荒唐。

十字军面临的极端困苦使得众首领又想到了普希蒙德：“当初是他带我们攻进城的，如今必须让他带我们杀出去！”他们自知，在军事才能上，自己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普希蒙德。

1098年末，他们决定，将统管十字军的大权交给普希蒙德，时间为两个星期。

普希蒙德看准了塞尔柱人的情势，便当仁不让地接受了首领们的“封官”。他已经了解到，此时克波加的军队与别处军队产生敌意，塞尔柱人内部发生内讧，安条克城外的军队并不稳定。

1098年年底，普希蒙德集中城内一切守军，打开城门，出击围困安条克的数万克波加部队。十字军在普希蒙德的指挥下取得第三次拒敌的胜利，克波加的兵营被洗劫一空。

奇迹般的胜利又使十字军将士陶醉得发了疯，几个月来的饥饿又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史书记载：十字军人“吃牛肉时，只吃股肉肩肉，很

少吃胸肉；至于面包和酒，就更不必说来得多么容易了。”

“安条克攻守战”之后，近东地区出现了第二个十字军国家——安条克公国，普希蒙德成为公国的最高领袖。与伊德萨伯国的鲍尔温一样，普希蒙德不再准备继续远征“圣地”耶路撒冷。在这里已经完全可以享尽天华，何必还要到“圣地”去捞什么天国的荣耀?!

其他各路十字军也没有立即向耶路撒冷进发，他们在安条克公国逗留了半年之久，名为避暑，实为掠夺城市村舍，争权夺利。实利几乎全为大领主所得，一般骑士获利甚少，至于追随骑士领主而来的农民战士，则更不需多言了。

下层十字军士兵的目标在实质上与领主们并不一致，他们基本上是贫苦农民以及几乎一无所有的穷困骑士，其行为更具有虔诚的宗教色彩。他们要通过“宗教功德”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就是要坚决彻底地从“异教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在上帝的“约许之地”过上美好的人世生活，这也是当初教皇乌尔班二世所许下的诺言。因而，他们只有一个最为迫切的心愿：尽早开赴“圣地”耶路撒冷！

然而，十字军首领们在安条克迟滞不前，他们在此地的争权夺利激怒了终日等待进军“圣地”的下层十字军人。

当时的编年史作者曾写道：“谁需要就让谁占有皇帝的黄金和安条克的财物，我们只愿在主的指引下前进。……让愿意留在安条克的人见鬼去吧！如果为安条克的争执还不停止，我们将毁掉这个城市。……那时，首领们总可以相安无事了吧！”“首领们阻挠我们向耶路撒冷前进。让我们来推举勇敢之士，由他在上帝呵护之下，率领我们前往圣陵。”

下层士兵与穷困骑士的怨愤使雷门四世等人认识到，如果继续呆在安条克，他们必将从十字军主力中分离出去，独自为战。这就会削弱十字军的声势和实力，甚至对自己构成新的威胁。

雷门四世下令，所剩的十字军（鲍尔温和普希蒙德的两支已经定居不动）向安条克东南方的马拉进发。不久，雷门四世占领了这个叙利亚要塞。

普希蒙德不甘心马拉落入雷门之手，便尾随其后，来到了马拉。1098年底至1099年初，两位首领在此发生新的冲突。

下层十字军人再次发出慨叹，希望立即奔赴“圣地”耶路撒冷：“为争夺安条克而争执，为争夺马拉而争执，为争夺上帝赐予我们的每一座城市而争执，首领们乐此不疲。冲突何时才能平息？我们何时才能踏上去主陵的道路？”

他们开始行动起来，拆毁了马拉的堡垒、城墙和谯楼，免得两位大领主在此争夺不休。

迫于形势，雷门四世放弃马拉，将之让给普希蒙德。他要率领十字军继续前进，奔向十字军的最终目的地——“圣地”耶路撒冷。

1099 年 2 月中旬，十字军队伍离开马拉，向南进发。贫民士兵们情绪激昂，车队、马队、人队，荡荡乎直奔耶路撒冷。

他们坚信，宗教功德即将完成，人间乐土就在前方，幸福的世俗生活指日可待……

普通基督战士得到的只是“圣光”，而哥德夫利却占据了整个“圣城”。一位意大利人感慨地说：“难得有一个不意财迷痴的朝圣者。”

当十字军还在围攻安条克之时，“圣城”耶

路撒冷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98年，埃及法提玛王朝与塞尔柱人展开长时间的猛烈斗争，年底将塞尔柱人赶出耶路撒冷。"圣城"易主，转归埃及。

十字军得到圣城被埃及占领的消息后，并没有停止南下的计划。

雷门四世说："尽管塞尔柱人被驱逐了，但如今占有圣地的埃及人仍是可恶的异教徒。他们信仰的是什么伊斯兰教，与我们信仰的不是同一个上帝。"

率领十字军作最后远征的首领有五位：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布里翁公爵哥德夫利、普希蒙德之侄坦克累德、诺曼底伯爵罗伯特和弗兰德尔伯爵罗伯特。

1099年4月，十字军抵达日思夜想的"圣地"耶路撒冷的城郊，随后立即组织攻城。

十字军遇到了类似攻取安条克时的困难。耶路撒冷城墙高大宽厚，城内的埃及人坚守不渝，而且埃及方面早已有所准备，食品、兵器供应十分充足。十字军攻城的进程再次受阻，同时他们又面临着食品短缺的危险。

恶人亦有天相。正当雷门四世等人山重水

复、一筹莫展之时，热那亚人漂越地中海，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军营雅法（在耶路撒冷西面），他们运来了大量的粮食和酒，用以补给十字军，并激励十字军的士气。

亦令十字军欣喜的是，热那亚人运来大量木材，建议十字军用之建造攻城塔。雷门四世等人当初也曾考虑到使用这种攻城器械，怎奈“圣城”附近却不产合适的木材，仅有的一些小树木只能做成简陋的“云梯”。

关于十字军围攻耶路撒冷的情况，沙特尔的福尔舍在其名著《耶路撒冷史》中有精彩的描写。当然，福尔舍是完全站在十字军的立场上来记述当时史事的，十字军士兵都是“勇气十足的骑士”，而守城的“异教徒”全是“可鄙的敌人”。当描述十字军大开杀戒之时，福尔舍显露出胜利者那种津津有味的情绪。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了解一些关于攻城的真实情况。福尔舍写道：

“在法兰克人见到难于围攻耶路撒冷以后，我们的首领决定建造木梯，便可沿梯升到城头上，借着上帝佑助，以便用决定性的进攻来占领城市。木梯做成以后，在最显贵的首领鼓励之

下，清晨喇叭声起，十字军队伍从四面八方猛攻城市。当天虽然继续进攻到下午五点多钟，但由于木梯不够，还未能冲入城内，是时，遗憾地停止了进攻。后来，会议上决定委托木匠建造攻城机，便可钻破城垣，得以实现希望。于是，就这样做了。”

“其时，围攻者虽然没有感受食粮与肉品的缺乏，但是，由于地方干燥，河流缺水，人畜两方均很需要饮水。所以到远处寻找水源，并很艰苦地用革袋装水，携到围攻的地方。一方面准备机械，即破城槌；另一方面自己也准备进攻。这些机械里，有用短木造成的攻城塔，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建筑用的树木。夜间把攻城塔拆散，搬运到城垣一隅的突出部分。在这样准备好柱子以后，在城垣近旁很快地把攻城塔拼成。用兽皮遮盖了安装好的攻城塔，慢慢地推动，走进城垣。在那里人数虽少但勇气十足的骑士，一鼓作气，跃上了攻城塔。虽然如此，萨拉森人为了自卫，进行反抗，用沸热油脂浇洒，用火炬烧烫这个攻城塔和塔内的骑士。这样，双方战士大批被死迅速地、过早地抓去了。”

“在土鲁斯伯爵雷门及其队伍那方面，即在

郇山方面，借助攻城机，进行了猛烈攻击。在布里翁的哥德夫利、诺曼底伯爵罗伯特与弗兰德尔伯爵罗伯特那方面，还进行了更激烈的攻城战。这一天就这样进去了。”

“同样，第二天用刺叭发出信号，他们还更奋勇地开始那种同样的工作，用攻城槌向一个地方进攻，他们突破了城垣。当时，由于我们机匠所投掷的燃木，在石头城垣里一座塔起火焚烧了。木料着火，愈烧愈炽，浓烟和火焰也愈扩大，因此守城兵士没有人能再留在那里。”

1099 年 7 月 15 日，“圣城”耶路撒冷最终被十字军攻克。随后，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异教徒“事业”宣告开始。福尔舍继续写道：

“法兰克人马上耀武扬威地进入城里，在周五中午，即在基督为全世界赎罪的那一天，号角吹起来了：大家激动起来，英勇地战斗着，高喊：‘上帝佑助!’，在城垣上升起了旗帜。异教徒完全被吓倒，变傲慢为奔逃了……”

“伯爵雷门与其部属正在奋勇进攻，直到看见萨拉森人跳跃城垣，才注意到这一情况。看到以后，他们鼓足勇气奔向城市，并和其他人一起，不停地追杀可鄙的敌人。”

“那时，其他人，阿拉伯人与埃塞俄比亚人，奔入大卫塔里，而有些人隐匿在主宰与所罗门庙里。在这些神庙的前庭里，也很猛烈地进攻他们，没有一块地方萨拉森人可逃避刽子手的屠杀。其中很多人被射死在所罗门庙的屋顶上，他们在逃亡时把庙放火焚烧；又有很多人从屋顶上滚下。在这庙里，屠杀了将近万人。”

“如果你站在那里的话，你的脚直至大腿上，会染着死人的鲜血，还有什么可说？他们中谁也不能保住生命。妇女与幼孩，均不得幸免。”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骑士的侍从和比较穷的步兵，由于知道萨拉森人的狡猾，怎样剖开了死人的肚皮，要取出他们生时所吞下的金币。为了这个，他们若干天里把尸体堆积起来，然后烧为灰烬，以便更容易地找到这黄金。……”

“在这样大流血之后，十字军士兵撤到市民的住宅中去，占夺住宅中的一切东西。当时，形成了一种惯例：任何人，不管是富人或穷人，首先进入一个住宅的，可收取、获得、并领有那住宅或宫殿以及其中一切东西，作为自己的财产，不受别人的侵犯。”

被克后的耶路撒冷并没有平静下来。与“异

教徒”的斗争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十字军内部僧俗首领之间的争斗。

耶稣基督殉难的“圣地”变成了“基督子民”争权夺利的竞技场。基督若是天庭有知，也该哀叹三日！

首先要求享有“圣地”统治权的是罗马教廷，它坚持耶路撒冷必须成为教会国家，由教皇派遣的总主教统治。

在占领耶路撒冷之前，教皇乌尔班二世已经去世，新任罗马教皇为巴斯卡尔二世。耶路撒冷城破不久，新教皇的国使、意大利的比萨大主教戴姆柏特便奉命到来，他捎来新教皇的口信：“十字军东征是由天主教会发起的，天主教会理所应当获得相应的报酬。”教皇要让戴姆柏特掌握统治“圣地”的大权。

而十字军的公爵、伯爵们却要求耶路撒冷由他们之中的一人治理。他们认为，忍饥挨饿的是十字军，流血送命的也是十字军，没有理由把耶路撒冷交由戴姆柏特来管理。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然而，宗教的威力不可逆忤，它是中世纪民众的护身符。一个人如被教会革出教门，取消教徒资格，则不论其原先

的地位如何，将会寸步难行，因为他已失去了“法律”的保护。

僧俗之间达成妥协。教皇国使戴姆柏特成为耶路撒冷名义上的首脑，布里翁公爵哥德夫利被推举为总主教戴姆柏特的陪臣，握有统治“圣城”的实权，其头衔是“主陵保卫者”。又一个十字国家——耶路撒冷王国由此出现。

在所建立的十字军国家中，最重要的有四个，沿地中海东岸，由北向南分别是：伊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和耶路撒冷王国，其主人都是十字军中势力最为强大的首领。

占有伊德萨的是哥德夫利之弟鲍尔温，他建立了第一个十字军国家；

安条克落在大兰多公爵普希蒙德之手。占据安条克后，普希蒙德继续与周边小国作战，扩张领土。1101 年，他被塞尔柱人所俘，后付重金获释。1107 年，他回到欧洲，在教皇巴斯卡尔的支持下，率军东征，与仍企图收复安条克的拜占庭帝国交锋，但被希腊人打败，后死于意大利。安条克则由普希蒙德的后人治理；

的黎波里伯国由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的后代掌握，而雷门本人在 1105 年围攻的黎波里时

受伤而死；

耶路撒冷王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哥德夫利在获得“主陵保卫者”称号后不久去世，其弟鲍尔温南下承袭统治权，称耶路撒冷王鲍尔温一世（1100～1118 年在位），而将伊德萨伯国交由其继承人统治。鲍尔温二世（1118～1131 年在位）登上耶路撒冷王位后，将女儿嫁给法国大领主安茹伯爵福尔克，后来福尔克继承王位，建立“安茹——阿登王朝”。在名义上，耶路撒冷是各个伯国、公国的宗主国，但它并不拥有实际权力，各个小国皆是独自为政。

到达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总人数不足 4 万。“圣地”被克后，约有半数之人认为已经完成使命，并已掠得一定数额的财富，于是决定返回欧洲，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和弗兰德尔伯爵罗伯特即是其中的两位。其余的大约 2 万人则继续留在“圣城”，准备再展宏图。

到 1099 年攻占耶路撒冷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已经基本结束，但尚有余波。从东方归来的十字军大谈他们在东方可以获得无数财富的故事，这使得长时期内只有耳闻的局外人受到莫大的刺激。

1100年，勃艮第、伦巴底、香槟以及德意志的下层民众纷纷向东方出发。据估计，前往东方的伦巴底人约10万，勃艮第人约1.5万，德意志的队伍中仅农民即达6万。总人数约为20万人。

对于这次“后卫十字军”，19世纪法国史学家普鲁兹有独到的见解：他们并不是反对“异教徒”的勇士，而是财富和运气的追寻者。

然而，既未找到财富，又未遇上运气，这批十字军在1101年夏天几乎全部死于小亚细亚，成为塞尔柱人奉献给真主的祭品。

“后卫十字军”的惨剧并未吓倒痴迷的欧洲基督徒，家乡的困苦境地照样迫使他们走上“主的道路”。

每年春天（复活节前）和夏末，众多的南法、意大利、德意志和弗兰德尔的“十字军朝圣者”便乘威尼斯、马赛、比萨、阿马尔菲、热那亚人的船只来到地中海东岸。

就绝大多数而言，他们到“圣地”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单单为了到“圣陵”教堂里祈祷，也不是到约旦河中沐浴，他们还抱着经济目的而来。有些人从家乡带来一些物品到东方销售，然后

再将东方的商品贩回欧洲。不过，也有一些人是空手乘船而来，希望无本而获万利。

难怪有位名叫马利诺·萨努多的意大利人感慨地说："难得有一个不患财迷病的朝圣者。"

"圣地"之王控制不住法外游民，亦僧亦俗的骑士团横闯耶路撒冷。上帝要他们恪守清贫，可俗欲熏心的他们哪能做到安贫乐道？

十字军国家的治理形式完全搬用西欧社会的模式，而且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里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贯彻。同时，西欧各国行政制度上的弱点在十字军国家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领主割据司空见惯，国家首脑的权力有限。不经陪臣的首肯，国王的一切决定都是一纸空文。

最为简单亦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耶路撒冷国王鲍尔温一世曾经颁发一道命令，要求臣民打扫"圣城"的街道。由于国王事先未与陪臣商议，命令根本无法实施。鲍尔温一世只得宣布撤回谕旨。可以说，在十字军国家中，国王的话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

尽管十字军国家目前尚能立足于地中海东岸，但是内外因素决定了它们的脆弱性，最终也必将导致它们的崩溃。

其主要不利因素有：中央政权与各领主之间关系松弛，政治上极端分散；领主相互攻战，陪臣与君主相互敌视，君主与君主相互竞争；反抗国王的“叛乱”时有发生；东面疆界长达1000公里以上，而十字军人多数住在大城市及坚固的大城堡里，且人数极少，在耶路撒冷王指挥下的西方骑士从未超过600名；民族矛盾突出，时常受到外敌的威胁和袭击，南有埃及军队的攻击，东有塞尔柱人的讨伐。但最为根本的因素是，十字军国家的建立，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违背了民族独立这一基本原则。

西欧封建社会制度最典型的表现并不在本土，而存在于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国家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封建主义“在昙花一现的耶路撒冷王国最名副其实，耶路撒冷王国在‘耶路撒冷法规’中留下封建制度最古典的表现。”当然，恩格斯所指的“最古典”，主要是就西欧封建制度而言，并不完全适用于东方国家。

尽管十字军国家与西欧社会有着种种的类

似，我们仍可以发现其独特的东西，其中之一便是“骑士团”的出现。

在十字军国家中，起初有两大骑士团：善堂骑士团和圣堂骑士团。

就表面上的形式和性质而论，骑士团是一种僧侣帮会，其宗教方面的约束类似于修道士。骑士入团之后，必须严格执行团规团法，为“保卫基督教”而贡献一生。骑士团的成员不得娶妻生子，不得谋求财富，不可违背上级（天主教会）的意旨，决不可因迷恋世俗生活而动摇自己“献身基督教”的意志。

在服饰上，骑士团成员也类似修道士，但增加了十字架符标。圣堂骑士的服装是缀有红色十字架的白色无袖外套；善堂骑士的服装是缀有白色十字架的黑色外套，后来又改为红色外套。

骑士团成员在外表上像修士僧侣，但其实质却是军人，骑士团实际上就是在天主教会庇护下建立的军事团体。团员们脑子里装的不是《圣经》，也不是祈祷词，而是“战斗”！

他们身穿半修士式的外衣，而外衣下面仍旧穿着骑士的甲胄。他们的武器不是说教，而是

利剑和长矛。

善堂骑士团的雏型出现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尚未开始的1070年左右，即阿马尔非商人在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善堂”，善堂骑士团成员最初就是以此为中心而集合起来的。“善堂骑士团”由此得名，有时亦称为“约翰骑士团”，也有人将之译为“医院骑士团”或“医护骑士团”。

从1070年左右一直到十字军东征结束的1099年，善堂骑士团确实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如保护来“圣地”朝圣的西方基督徒，供给朝圣者的食宿，医治生病的基督徒，等等。但是，自1099年以后，善堂骑士团的宗旨发生了完全的变化，骑士团变成了纯粹的封建骑士军事团体。

圣堂骑士团出现较晚，始创于1118年前后，其团员主要是来自法国的十字军骑士。这个团的创始者最初住在毗邻救世主教堂的耶路撒冷王宫的一角，而救世主教堂的原址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一个清真寺，据传此地原是所罗门国王的神殿。“圣堂骑士团”的名称由此而来，有时也译为“神殿骑士团”或“圣殿骑士团”。

骑士团内部实行严格的集权制。每个团的

最高首领是“大团长”，归其管辖的支团首领称“支团长”，再往下还设有司仪、司令、马厩长等，支团长以下的军官组成总会，从属于大团长。而大团长则直接从属于罗马教皇，必须唯教皇之命是从。

罗马教皇给予骑士团各种特权，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不受十字军国家的僧俗统治者管辖。尽管耶路撒冷王国的总主教是教皇的国使，但他也无权支配调遣骑士团。

在名义上，骑士团必须恪守清贫，但是，团员们根本做不到安贫乐道。而是，十字军国家的僧俗封建主为了借其力量使西欧人长期占据地中海东岸，也给予骑士团以优厚的款待。因此，骑士团的生活方式极端世俗化。团员们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有：

其一，进行“募捐”和接受馈赠。西方的贵族朝圣者请骑士团在十字军国家代购宫殿、房屋和土地，作为到达“圣地”后的住所，朝圣完毕则悉归骑士团。1168年，善堂骑士团收到匈牙利统治者的一万贝桑，其中的六千用来在阿克购买一座宫殿和四所房屋，以备匈牙利统治者到来后享用，后来这些房产全都落入骑士团

手中。在12世纪，善堂骑士团还与法国、捷克的王公显贵签订过类似的协议。圣堂骑士团也是如此。英王亨利二世临终前曾赠给它4.2万银马克和500金马克，作为活动经费。

其二，经营商业。圣堂骑士团拥有自己的船队，参加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收取高额费用运送朝圣者东来西去。同时，骑士团还经营高利贷和银行业务。

其三，抢劫。这类行为对于骑士团来说是屡干不鲜。例如，1153年，十字军国家与埃及人交战，攻克阿斯卡隆之后，圣堂骑士首先冲进城内，在城墙缺口处派40名士兵把守，不让其他骑士进入，而团员们则在城内挨门逐户地搜索金银。

骑士团的"世俗事业"大获成功，几十年之后，骑士团的领地不仅东方有，而且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匈牙利、捷克、西西里、英国等地也为数不少。

同时，骑士团在十字军国家中的地位也变得越发重要，拥有许多要塞和城堡。到12世纪末，僧侣骑士团成为东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团员人数也大大增加，因为许多一般

骑士看到，在十字架的庇护下，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12世纪末期，仅圣堂骑士团已经用有1.5万名团员。

后来，随着十字军国家的衰落与崩溃，骑士团在东方无法立足，但它们并没有解散，而是身着修服、披盔戴甲地回到欧洲，继续效力于教皇，一些后起的骑士团如条顿骑士团还在欧洲建立起骑士团国家，对欧洲的政治和军事生活发挥着长时期的影响。

第四章 泥塑王冠不生辉

十字军含羞带愧，
两手空空地返回家园，
以致圣伯尔纳描述这场战争为“深不可测的深渊”，
凡参加战争而未受指责的人，
我必须说他福分不浅。

——(美)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第二篇第九章“十字军”

大事记：

▲1146年12月1日，教皇尤金颁布《给予参加十字军者之特权书》；

▲1147～1149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89～1192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直接后果是基督教十字军国家的建立。进入12世纪以后，在圣掌骑士团和善堂骑士团“漫不经心”的护卫下，十字军国家在风雨飘摇中向前游行，从12世纪中期开始，便走上了由衰落向崩溃的历程。

近东事态的急剧变化成为西方国家继续组织十字军进行东征的理由，西欧上下再次沸腾起来，在基督十字的旗帜下，数以万计的骑士、贵族以及下层民众浩浩荡荡，挥戈东进。

对于十字军东征的重新兴起，美国前首相、著名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曾以迷恋、怀旧和欣赏的笔调描写道：“不仅上层阶级，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上各阶层的人都表现出强烈的感情。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许多年轻的十字军战士离开亲人和家园奔赴遥远、陌生的危险世界时，心中不无离别的忧伤之情。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神秘感使那个时代和当时人们的努力充满浪漫色彩，并同战争和冒险的吸引力混为一体。”

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相比，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乃至13世纪的多次东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西欧各国的君主们对十字军东征

极感兴趣，甚而至于亲自带领军队向东进发。然而，同样显著的是，国君的介入并没有使十字军东征熠熠生辉，他们不但没能给东征带来辉煌的战果，反而加剧了东征队伍权利之争的激烈性，使一次又一次的东征无颜西归。难怪我国著名学者朱寰先生讥讽第二次东征的十字军人“灰溜溜地滚回欧洲”。

“主陵”再次告急！罗马教皇尤金三世连夜赶制“赎罪符”，并正告基督徒：“只要你们能够低首下心、痛切忏悔，你们的全部罪孽都可得到赦宥，而且将从赏善罚恶之主那里得到永恒的报酬。”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所以获得胜利，不在于“强烈的宗教观念”使得十字军与“异教徒”作战时有了既特殊又非常的力量和刚强。十字军的胜利，与其说是靠自身的实力，倒不如说是靠了“异教徒”方面的分散和无组织。当时的伊斯兰世界随着阿位伯帝国的衰落而土崩，从此小国林立，互相攻战，吵嚷不和。穆斯林的内讧给十字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尽管分散的“异教

徒”也使十字军遭受不少磨难，但是从总体来说，穆斯林根本没能给予十字军以强有力的反击。

12世纪时，十字军国家的境遇变得困难起来，几十年前攻克“圣地”时的欣喜之情已经降温，它们必须时刻准备应付来自疆土之外的“异教徒”的袭击。

西方军队在近东的横行，给忙于内战的穆斯林世界敲响了警钟，穆斯林们开始意识到联合起来抗击侵略者的必要性。尽管内讧并没有完全平息，但在对抗“基督十字军”方面，已经开始初步统一起来。

十字军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和袭击并不仅仅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异教徒”，而且还来自信仰同一宗教的拜占庭帝国。地中海东岸原本都是拜占庭的国土，十字军打败“异教徒”之后并没有履行当初“完璧归赵”的诺言，反而坐地不走，建立起四个十字军国家。其中尤其令拜占庭恼火的是占据着安条克公国的普希蒙德，当初在拜占庭皇帝面前信誓旦旦，满口甜言，如今却成了“逆子贰臣”。尽管不久普希蒙德就离安条克而去，先是被俘，后是西归，但他并未放弃与拜

占庭的军事斗争，结果败在拜占庭之手。

尽管安条克城内已经没有了普希蒙德，但是狠狠地打击安条克仍可稍稍缓解拜占庭帝国的心头之恨，于是帝国的水陆部队时常与安条克军队兵戎相见。

1137 年，拜占庭皇帝约翰·科姆尼那斯(1118～1143 年在位)亲自率领大军，进入安条克，双方激战之后，拜占庭曾一度占领了安条克。尽管不久拜占庭就退了出来，但是两者的关系却更加恶化。

1143 年，年轻气盛的纽伊尔·科姆尼那斯(1143～1180 年在位)继承拜占庭皇位，他要施展雄风，重振祖业，企盼恢复帝国昔日的尊严和国土的辽阔。即位第二年，即 1144 年，纽伊尔率领水陆大军，大举进攻帝国东南方的安条克。猛烈的进攻使得安条克城内之人恐荒不已。兵临城下，安条克公爵不得不重演半个世纪以前普希蒙德的一幕戏，向拜占庭皇帝宣誓称臣。然而，拜占庭军队一撤离，雷门便故态复萌，将“新认的主人”抛至九霄云外。拜占庭闻知，悔不当初铲平安条克。因此，虽然拜占庭与十字军国家在名义上存在某种隶属关系，但实际上，两

者之间仍然是一种枪对剑的关系，时时都有干戈大动的可能。

与此同时，居于十字军国家东面的半农半牧的塞尔柱人也对罗马教廷的“飞地”展开了强烈的攻势，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是穆斯林的摩苏尔总督伊马德·阿德·丁·基善对十字军的进攻。伊马德运用先攻弱者的原则，首先攻克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等地的几个弱小的公国。1144 年，伊马德攻下了最北面的伊德萨城，并占领了伊德萨城四周的土地。至此，最早建立的一个十字军国家也最早被“异教徒”恢复。

塞尔柱人攻城掠地，势如摧枯拉朽。伊德萨的迅速消亡给其他十字军国家骤添了万分紧张气氛，“异教徒”所发出的一声一息都牵动着十字军国家僧俗首领的喜怒哀乐。如今的三个十字军国家——安条克、的黎波里和耶路撒冷——有如浩瀚沙漠之中的几座孤城，更如茫茫海洋上的几叶扁舟，经历着“流落异乡”的悲惨遭遇。守着的虽是“圣地”、“圣城”，但是曾在此受难的基督耶稣并未将他的阴魂留在圣城的上空，至诚至信的基督徒并未感受到被主佑助的“神圣滋味”。

最感惶恐的要数安条克公国。伊德萨伯国曾与它毗邻，可以说是安条克的一道天然屏障。皮之不存，毛将无处可附。伊德萨的失陷使得安条克与塞尔柱人的接触面大大加宽，从前十字军国家的内部边界如今已变成基督徒与异教徒的直接对峙地区。同时，安条克还受到来自拜占庭帝国的种种恐吓和武力制裁。安条克公爵雷门感叹道："吾命不长，公国亦是朝不保夕。"

罗马教廷又成了基督徒的大救星。十字军国家的使臣走陆路，转海路，兼夜赶向罗马，请求教皇尤金三世迅速派遣"战无不胜的法兰克人"，让他们英勇地保卫圣地和主陵，以免再遭不测。

作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教皇尤金三世对西方以及近东的宗教事务颇为热心。但他的"热心"并不仅仅局限于《圣经》和弥撒，他还时刻关注着基督教世界的各国政治和社会。他既要统治人们的宗教信仰，也要驾驭人们的政治生活。对于这种双重角色和任务，尤金三世当仁不让，也觉得义不容辞：谁能把在政治上散沙一盘的西欧社会组织起来？非本教皇莫属！

十字军国家的求救，给尤金三世提供了一

条解决西欧社会问题的捷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使得数万贫苦农民死于异地，暂时缓和了本土的阶级矛盾。到12世纪时，旧有的矛盾又趋激烈，反抗领主专横暴虐的农民骚动时有发生。同时，西区社会从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开始，又孕育并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在意大利、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等地，新兴城市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市民们与封建领主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地位，有些地方已经发展到武装斗争的境地。

面对新问题，自封的"主人"——罗马教皇尤金三世也在考虑如何能够遏止社会的动荡。"圣地"是个好去处。有宗教作为旗帜，就很容易鼓动起基督徒特别是下层基督徒的神圣情感。另外，贵族们或耳闻，或眼见东方的富庶繁华，东征的号召必将得到贵族们的响应。

尤金三世思虑已定：答应远在海外的十字军国家的呼吁，动员军队远征"异教徒"。这是一石数鸟之策，既可以保住教廷在近东的领地，也可以将不安定因素引出西欧，同时还可以扩大罗马教廷的影响并提高罗马教廷的威信。当然，实现这些美好的设想必须有一个尚待检验

的前提：十字军东征取得成功，如果失利，一切将无从谈起。

1146年7月，尤金三世派出使臣，兵分两路前往法国和德意志的宫廷，劝说君主们响应主的号召，远征异教徒。

勇夫出自于厚赏，这与“重饵之下，必有死鱼”之说同理。尤金三世清楚对于十字军参加者，宗教感召仅是动力之一，实际利益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出征的热情。1146年12月1日，尤金三世颁布《给予参加十字军者之特权书》，如下部分颇能体现特权书的宗旨：

“我对于你们的安宁和东方教会的贫乏，像父亲一样地关怀，现本着上帝赋予我的权力，将前面所说的、我的前任教皇乌尔班所开始实行的赎罪权利，赋予那些为虔敬心所驱使，决心承担和执行这个神圣而必要的工作和任务的人，并命令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财货和产业置于我自己以及大主教、主教们和上帝的教会中其他教士们的保护之下。”

“同时，我也以使徒的权力，禁止对任何人在参加十字军时所正常保有的财产提出任何诉讼，除非关于他们的返回或死亡已经得到非常

可靠的消息。”

“此外，因为那些为主战斗的人不应当置办任何贵重的服饰和供个人排场之用的东西，也不应当携带鹰犬或其他表现耽于逸乐的东西，我本着主的意旨，规劝那些决心担负这个神圣工作的人，务必谨慎小心，不要追求这些事物，而热忱勤勉地致力于置备马匹、武器及其他在与异教徒交锋时可能使用的东西。”

“至于那些为债务所迫而怀着纯洁的心情开始这个神圣的行程的人，无需偿付过去的利息。若是他自己，或者他们的担保人，曾经为了支付利息而作过任何誓约，我也以使徒的权力予以解除。”

“此外，如果某些人在事前通告过他们的亲属们，或者他们的采地所隶属的领主们，而这些人不愿、或者不能将钱借给他们，我们也可准许他们自由地将自己的土地或其他财产向教会、教会人士或其他基督信徒抵押，任何人不得提出异议。”

“我现在按照前面所说的我的前任开始实行的规定，以上帝赋予我的全能上帝和使徒之长圣彼得的权力，向那些以虔敬之心开始、并且

完成这一神圣旅程的人，或将在旅程中逝去的人宣告，只要他们能够低首下心、痛切忏悔，他们的全部罪孽都可得到赦宥，而且将从赏善罚恶之主那里得到永恒的报酬。”

天主教会所宣扬的“十字对弯月”的宗教战争，至此已经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它的主旨。尤金三世的《特权书》并没有像50年前乌尔班二世的演说词那样，给予十字军参加者以许多虚无飘缈的天国荣耀和来世特权，而是实实在在地向基督徒们许下了非宗教的“经济特权”，宗教旗帜在此只不过是闪动的幽灵罢了。

著名的比利时史学家比连称：在12世纪中叶，“人的思想已经不像50年前那样的神秘玄虚”。因而，罗马教皇也就觉得没有必要过份地浓妆艳抹，干脆多来点明白直率的举动，反而可以取得更实际的效果。

但是，伊斯兰世界的团结统一及其力量的日益壮大，已经给尚未启程的十字军预先投上了一层阴影。

伯纳奋力高吟“新军颂”，引得法德君王决意冲锋陷阵，献身“圣战”。伯纳喜不自胜：“我创造了奇迹中的奇迹！”

教皇尤金三世发出了十字军东征的号召，但要使东征迅速变为现实，还需要干练之人去鼓动，去组织，去说教。

教皇选择了西妥教团团长、勃艮第的明朗谷修道院院长伯纳。他是当时欧洲著名的宗教社会活动家，言辞极具煽动性，后世被罗马教会列为“圣徒”之一。

伯纳对十字军东征的关心已非一日，20年之前他就密切注意着近东十字军国家的成败兴衰，“圣地”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野之中。1118年前后在耶路撒冷出现的圣堂骑士团就曾倾注了伯纳的一份心血，规范团员们日常行为准则的《圣堂骑士团团章》即出自其手。

除此而外，伯纳还专门写了一篇《圣堂骑士新军颂》，用以激发骑士团倍加英勇地与“异教徒”作战。他笔下的骑士团成员的光辉形象是：“身躯上穿着钢铁的铠甲，精神上披着信仰的胄

衣。”有着这种坚不可破的双层甲胄，圣堂骑士们在与“异教徒”的斗争中必将战无不胜。

伯纳以激人心怀的笔触号召圣堂骑士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将“异教徒”置于死地，尽量夺取“异教徒”的土地，使那些一直被邪门左道所占据的地方重现主的光明，让罗马天主教会把上帝的恩泽洒向受尽“异教徒”折磨的芸芸众生。

在《圣堂骑士新军颂》中，伯纳为骑士团提出了对待“异教徒”的基本原则：“如果尚有其他方法可以制止异教徒对基督徒过份敌视和迫害，那么可以不杀他们；否则，则以斩尽杀绝为上策。”伯纳当然知道，骑士团并无别的方法，不论上策下策，其策略只有一条：斩草除根。但是他哪里知道，“异教徒”也并非木制品，更非稻草人，哪能束手任他们去拔去斩呢？

得到教皇尤金三世的赏识，伯纳更觉脸上有光，同时更感力量无穷。

1146年春，伯纳头上顶着神圣的光环，奉教皇之命出席了在勃艮第的韦斯雷举行的宗教大会。和半个世纪以前的克勒芒宗教会议不尽相同的是，尽管参加宗教会议的也有公侯王孙，高级僧侣、大小骑士，也有下层群众，但是规模

要小，且“来客”仅限于法国。

会议在韦斯雷郊外的旷野举行，当一脚蹬上刚刚筑好的特设台时，伯纳的心情激动不已：今天我代表的是当世圣者罗马教皇尤金三世啊！

伯纳首先宣读尤金三世颁发的《十字军诏书》，然后开始大展自己的演讲才能，高声疾呼：“进行新圣战是主的驱使，是上帝的召唤！伟大的法兰克人兄弟如今正在东方与异教徒们奋力拼搏，圣地耶路撒冷正面临着被异教徒蹂躏的危险。所有的基督徒们，尤其是我们伟大的法兰克人基督徒，绝对不会坐视圣地被劫而不管，也绝不会因迷恋这里的穷乡僻壤而不愿踏上主的道路。东方的富庶，诸位已早有耳闻，甚至在坐的有些人已经享受到了东方的乐趣。……”

为了激发在场基督徒决心东征的热忱，伯纳搬出一箱早已剪好的十字章。他以布道人特有的声调鼓动道：“十字是我们基督徒的象征，让愿意为主而东去圣城的基督徒佩上上帝赋予我们的十字，勇敢地踏上征途吧！”

贵族、骑士、下层群众被伯纳的满怀豪情弄得神魂颠倒，真真假假的宗教热情哄然而起，一

箱十字章即刻被分一空，但仍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因没有得到“上帝的十字章”而懊恼不已。

对于自己的杰作，伯纳感到相当满意。为了不冷落没有拿到十字章的人群，亦是为了燃起在场群众更为炽烈的宗教火焰，伯纳毅然脱下象征自己身份的修士法衣，当场剪成许多十字章，撒向台下狂呼的民众。

在会议临近结束时，伯纳又补缀了几句：“上帝勖勉一切基督徒为圣地而战。上帝已经许诺，善良纯洁的基督徒如果参加十字军，必将得到更多的天国荣誉和尘世利益；曾经犯有罪过的人，也将得以赎免罪孽。”伯纳心中的上帝非同一般，可谓宽宏大量，不拘一格降人才。

韦斯雷大会之后，伯纳开始走访法国的许多城市，然后又向东，进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地区。一路上，伯纳唇焦舌敝，到处劝说贵族、骑士以及下层民众远征“异教徒”。

一部分贫民被动员起来；许多领主们也纷纷响应教皇的号召和伯纳的说教，准备起而反对异教徒；中小骑士更是积极，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样，他们自告奋勇地站在了十字旗之下，要与“不信者”决一死斗，实际上他们是要借此

谋利，获得在家乡根本得不到的土地和财富；一些著名的教会人物也急匆匆地加入到了十字军队伍之中。

准备参加东征的僧俗贵族主要有：土鲁斯伯爵阿尔方索、香槟伯国的继承人亨利、弗兰德尔伯爵蒂埃利、隆格尔主教哥德夫利以及特里尔、马因兹的一些教会首脑。

令这次东征气象一新的是，帝王亲自参加十字军。帝王们不辞辛劳，亲驾东征"异教徒"，这在下层民众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给即将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平添了几分神圣和庄严。然而，东征的悲惨后果，把下层民众心中的神圣感和庄严感一扫而光。这是后话，也是始料所未及的。

首先宣布参加东征的是法兰西年轻的国王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教皇尤金三世在接到十字军国家中"法兰克人"处于危难之中的消息以后，立即派使臣去法兰西，请求"法兰克人的主人"路易七世起而"保卫信仰"，同时也是救助远在海外的臣民。血气方刚的路易七世当即表示同意派军远征，而且将亲自出马。

继路易七世之后，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

康拉德三世（1138～1152年在位）也决定亲征耶路撒冷。来德国宫廷向康拉德进行游说的是前文所说的伯纳，他向德皇大肆宣扬说，为了“基督教的福祉”，非进行十字军东征不可。伯纳的巧言令色活动了康拉德三世的战争欲望。尽管当前他正与归尔夫派（国内支持教皇的派别）进行激烈的斗争，他还是舍此就他，决定参加十字军。

伯纳对于自己的成功既感意外，更觉惊奇，他踌躇满志地高呼：“我创造了奇迹中的奇迹！”

在劝说德皇东征过程中，伯纳用尽了手腕，费尽了心机，终于成功地使德皇决定上马。但是，这个“奇迹中的奇迹”是不是伯纳自己所创造的呢？实际上，在“奇迹”背后，还隐藏着德皇的现实需要：借此握紧手中的权柄。法国路易七世之所以参加十字军，也不乏这样的想法。

12世纪，西欧以及南欧各国的政治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过数个世纪的封建领主割据以后，各国的王权日益巩固起来，逐渐向中央集权的方向迈进。君王们集中精力剪除割据诸侯的羽翼，将王室行政机构推向全国各地，并组织常备军，以保证君王权力的运行。这一进程

在法国、英国表现得比较明显，另外，在德国、诺曼底——西西里王国，帝王们也在为集中权力而殚精竭虑。

王室权力的增强、大规模常备军的成立以及驻节各地的王室官僚机构的急剧扩展等等，都迫切需要王室拥有巨额的金钱和物质财富，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央集权政策的顺利推行。实际利益的需要驱使君主们踏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

但是，君主们为何不将扩张领土的目标指向北欧，而是将其扩张重点投向地中海沿岸，特别是拜占庭和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原因并不难寻。从上古时期开始，地中海就已成为重要的贸易通道，东西方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中海航路。12世纪西欧城市普遍复苏以后，东西方的地中海贸易再趋繁盛，地中海再度成为黄金白银的“生产地”。控制地中海贸易，必将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法王路易七世、德皇康拉德三世之所以响应“圣战”的号召，也正是因为保全十字军国家并加以扩张对他们都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法

王路易七世与阿奎丹公国的公主爱丽诺联姻之后，阿奎丹并入了法国王室，而此时的阿奎丹与东方的贸易正处兴旺繁荣时期。另一方面，法国与东方的贸易主要通过北意大利和位于霍亨斯陶芬王朝领地内的德国城市进行。法、德两者王室都已从与东方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地中海东岸十字军国家出现“危难”，自然就牵动了法、德两国统治者的经济神经。失去了东方贸易，也就等于断了一条谋取厚利的门路。基于这种考虑，法、德君主们便断然决定亲赴“圣地”，保卫信仰，挽救危亡之中的“法兰克人弟兄”。

伯纳的“奇迹”也就“奇”在这里了。

两队骡马赴“圣地”，德皇率军先行。上帝的勇士被踏在异教徒骑兵的脚下，德皇抱头咆哮：“朕非报此仇不可！”

十字军东征的幽灵已经在西欧上空徘徊，贵族、骑士以及下层民众的心早已飞越地中海，落在了“异教徒”的土地上。万事俱备，只等仁慈的上帝拍板成交了。

1147年2月，明朗谷修道院院长伯纳来到法国的埃塔姆彼，主持召开由法德两国贵族参加的“成交会”。这次会议最后决定，十字军将在年中正式挥戈东征。

法、德两国立即组织自己的十字军。1147年夏，两国各有7万左右骑士组成的十字大军集结完毕。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样，贫苦农民纷纷投至骑士军队的门下，甘愿为自己的主人充当马夫仆从，以求到东方分享一点“圣光”并填满自怀的饥腹。当然，农民的人数不及上一次多，前一次“农民远征军”惨败的阴影仍使一部分人望而却步。

法国十字军以路易七世为首，几名主教以教皇使臣的身份随行。德国十字军的领袖是康拉德三世。两支十字军各自为政，并未拟定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

1147年7月，德国十字军首先出发，经匈牙利、保加利亚进入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他们准备由此进入小亚细亚，打击“异教徒”，救援十字军国家。

散漫好战的骑士并不懂得“秋毫无犯”的涵意。刚出国门，德国骑士军立刻胃口大开，开始

沿途洗劫当地的居民。进入拜占庭领土色雷斯时，上帝的勇士们更是如鱼得水，当地民众不得不重又操起“坚壁清野”的老对策。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德意志皇帝正与拜占庭帝国保持着联盟关系，史称“二帝同盟”。二者的结盟，是以共同的政治利益作为基础的，这就是共同展开对南部意大利诺曼底——西西里王国罗塞尔二世的斗争。罗塞尔二世（1130～1154 年在位）在统一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之后，继续执行其先辈的政策，对拜占庭帝国采取敌对行动。同时，罗塞尔二世竭力阻止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发展自己的势力。共同的需要，使得拜占庭和德意志两皇帝联手行动。另外，在地中海贸易方面，德国与西西里王国也发生直接的冲突，这便促使德皇与拜占庭日益接近。1146 年，拜占庭皇帝曼纽伊尔·科姆尼那斯与德皇康拉德三世的外戚、萨尔兹巴赫的白泰公主结婚，二者的同盟关系更加巩固。

同盟关系并没有使德国骑士军队在拜占庭的领土上安份守己，拜占庭皇帝曼纽伊尔被迫采取武力手段来压制横行不法的“上帝的勇

士”，以此来提醒德皇，不要忘了两家是同盟。在阿德利安诺普附近，德国十字军与拜占庭军队展开血战，双方均有伤亡，但此战并未能使德国骑士军的行径有较大的改观。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军队接踵而至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给首都诸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十字军又将来临。骑士们在色雷斯的表演已使拜占庭皇帝曼纽伊尔充分认识到，如果他们到君士坦丁堡“歇脚”，不会比半个世纪以前的老骑士们出息多少。

为了使首都君士坦丁堡少受皮肉之苦，曼纽伊尔派使臣飞马奔驰，与正向首都方向进发的德皇康拉德三世商谈，要求十字军不要到君士坦丁堡休整，可以直接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立即迎击“异教徒”。

康拉德三世明白拜占庭皇帝的心思，当即拒绝了使臣所提的要求，并煞有介事地说：“哪能过家门而不入呢？朕非常思念贵国皇帝陛下，早想与之一叙，以加深两国间的友谊，巩固两国间的合作。”

君士坦丁堡的大门不得不为“同盟国”的骑

士军打开。果然不出曼纽伊尔所料，十字军见首都而眼开，君士坦丁堡的繁华和富庶再次撩起西方骑士的占有欲，位于郊区的皇帝行宫被劫一空。皇帝的家舍都不能幸免，普通人家更是不在话下。

尽管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横行无忌，狂饮大嚼，但拜占庭皇帝还是强忍住心中不满，目前拜占庭还需要有像德皇这样的同盟者，因此不能对之得罪得太过份、太露骨。

曼纽伊尔已经得到消息，路易七世率领的法国十字军已经踏上征途，正向东而来。如果法德骑士在君士坦丁堡会合，那将给拜占庭带来更多的麻烦和损失。拜占庭皇帝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将德国盟友尽早地请出君士坦丁堡，让上帝的勇士们尽快地踏上“主的征途”。

曼纽伊尔对这位亲戚兼盟友的德国皇帝用尽利诱和威胁的手段，终于说服了在君士坦丁堡尚未呆够的康拉德三世，德国十字军开始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异教徒”的领地。

德国骑士循着第一次十字军的足迹，踏上在西方骑士们看来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经过多次小规模的与“异教徒”作战后，1147 年

10月末，德国骑士军到达多利勒伊（在尼西亚东南数百里处）附近。

在多利勒伊，十字军与爱科尼阿姆苏丹的“异教徒”军队遭遇。苏丹的骑兵队十分强大，号称十万之众，他们早已等候于此，要看看上帝的勇士们都是何等面目。谁知银样蜡枪头，上帝庇护下的骑士并不中用。两军对阵不久，十字军惨败而走。

多利勒伊之战以后，十字军的粮秣丢失殆尽，同时军中又爆发流行病，为饥饿和瘟疫所袭击的下层民众和一部分穷困骑士未死于沙场之上，却葬身于荒野草丛之中。

一部分残兵败将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国，出征之初那种神圣而神秘的气氛迅即烟消云散，“圣战”的口号再也激不起他们那冰冷的心房。

继续留在小亚细亚的只有一少部分“坚定分子”，其中包括德皇康拉德三世及其侄子士瓦本公爵腓特烈（即红胡子腓特烈，后为德国皇帝，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首领之一）。

多利勒伊的惨败，使康拉德三世既羞又急；一部分“对上帝不虔诚”的败军又返回欧洲，更令德皇垂头丧气。情绪稍加镇定之后，德皇远望

着“异教徒”的城市，忿忿道：“朕非报此仇不可！”

然而，仅靠手下为数不多的德国十字军去与强大的“异教徒”军队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德皇要在此等待法国骑士的到来，然后再继续进行十字军东征。

枝蔓横生，罗塞尔大闹拜占庭；权衡利害，路易七世拒绝“不仁不义”之举，君士坦丁堡幸免于难。

正当法王路易七世准备兵马粮秣，整装待发之时，南部意大利的西西里王国的特使来到了法王的宫廷。使臣转达了西西里国王罗塞尔二世的意旨，即敦请法王的十字军从罗塞尔的领土——亚普利亚和西西里——进入叙利亚，罗塞尔二世声称：“西西里和法兰西都是基督教的保卫者，我愿为法兰西国王陛下提供一条到达东方的捷径，以尽我的一份菲薄之力。在上帝的关怀下，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达到荣耀基督世界的宏愿。”

罗塞尔二世为何如此慷慨大方，甘愿让素

有劫匪之名的骑士军由自己的国土进发东方？基督教信仰的威力果真如此灵验？实际上，罗塞尔二世的意图绝不在此，他的目标是使法王与自己接近，共同征服西西里的宿怨——拜占庭帝国。

西西里与拜占庭的敌对关系由来已久，自11世纪中叶北欧维京人（海盗）占领西西里以后，其第一代首领罗伯特·歧斯卡尔就已开始进攻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地。1080年，他又在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支持下率领“十字军”攻打拜占庭本土，觊觎君士坦丁堡，只因1084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发生冲突，歧斯卡尔被迫回师救援罗马教皇。

对于歧斯卡尔，当时的一位拜占庭公主曾有记述：他“秉性残暴，为人狡黠，行事勇敢，身材高大匀称，面色红润，发色金黄，膀大腰圆，目光如炬，嗓音洪亮，足以慑服士兵……他不会屈从于世间任何人。”

1085年，歧斯卡尔在萨莱诺去世。他的墓志铭非常简单，但又耐人寻味：

“人世的恐怖分子，歧斯卡尔长眠于此，他离开了罗马皇帝遭受猛烈冲击的罗马。”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另一位诺曼人首领普希蒙德再次与拜占庭交战。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叙述。

如今到了罗塞尔二世的时代。西西里王国成立（1130年）后不久，罗塞尔二世立即在地中海区域采取扩张政策，网罗人才，搜刮财富，同时又重新进攻拜占庭。但是，要想镇服拜占庭这样一个大国，仅靠西西里王国一家毕竟不太容易，罗塞尔二世感到势单力薄。如能将法国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力量便可大增。本着政治目的，打着宗教旗帜，罗塞尔二世的使臣来到了法兰西王宫。

路易七世婉言谢绝了罗塞尔二世的“好意”。他觉得还是由拜占庭的领土进入地中海东岸危险较小，因为法国这次是与德皇共同行动，而德皇与拜占庭又有着密切的同盟关系。而法王又从未与西西里打过交道，并不十分了解那里的情况，因而也就不太清楚罗塞尔二世的“宗教激情”从何而来。

遭到法王拒绝之后，罗塞尔二世并未放弃进攻拜占庭的计划。

1147年夏，西西里舰队载着精兵强将，渡

过地中海，在希腊登陆。短短的一个月内，西西里军队踏遍了科孚岛、科林斯、底比斯和爱奥尼亚群岛。为了保证有一个安定的后方，西西里与隔海相望的穆斯林国家——埃及结成攻守同盟，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并没能够阻止两个国家的亲近。只要政治利益需要，何需拘于宗教小节！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西里一次又一次地进攻和骚扰，拜占庭皇帝已经习以为常，当然并不是掉以轻心。曼纽伊尔·科姆尼那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诺曼海盗西西里军队，便立即与小亚细亚塞尔柱人的爱科尼阿姆苏丹媾和，东正教与伊斯兰教暂时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在西方，曼纽伊尔和威尼斯商人结盟，要求威尼斯提供舰队并给予金钱援助，拜占庭方面则给予威尼斯以新的通商特权。

从西西里和拜占庭两个方面来看，宗教旗帜不再高悬，现实面前，根本不用谈论什么“上帝”好还是“真主”善。

正当双方战事趋于升温时，1147 年 9 月末，路易七世率领的法国十字军开抵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对法王虽怀有戒心，但仍竭力保持

着亲切而友善的态度，以免再树一敌。

然而，伴随法王左右的群臣却不领拜占庭皇帝的“殷情”，他们主张，法国十字军应当与西西里国王罗塞尔二世谈判，建立同盟关系，然后等待西西里舰队的到来，一起占领君士坦丁堡。

坚决主张法王采取这一行动的是隆格尔主教哥德弗利。他曾从师于明朗谷修道院院长伯纳，能言善辩，思想灵活，尽管他是一位“正宗的”基督教徒，但并不把宗教的名节看得比天还高，比地还厚。

哥德弗利向路易七世进言道：“陛下应当清楚地看见，君士坦丁堡的富庶繁华远远超过巴黎。但陛下更应看到，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已经老朽，守城兵力极为单薄。如果陛下有意，君士坦丁堡指日可以占领。再加上西西里军队的合围，更是易如反掌。”

至于拜占庭同属于基督教国家这一问题，哥德弗利的解释更是合情合理。他对路易七世说：“占领君士坦丁堡，对于十字军事业绝无害处。从表面上看，占领它们似乎违反了基督教的准则，而实际上根本不是如此！拜占庭皇帝不是

屡次与穆斯林联手而与十字军为敌么？不久前，他不是又与异教徒的爱科尼阿姆苏丹订立和约了么？拜占庭只是表面上的基督教国家，而实际上它已经与异教徒没有太大的差异！”

哥德弗利的主张得到了一部分十字军首领的赞同，他们觉得，罗马教廷的大学问家都已认为占领君士坦丁堡无可非议，对宗教并非至敬至诚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

但是，也有一部分中小领主反对教会人士的游说，他们尚能把拜占庭与“异教徒”区别开来。这部分人坚决要求，他们的目的地是遭受“异教徒”困扰的东方十字军国家。

路易七世也有自己的考虑。最初的计划就是要到地中海东岸的“法兰克人国家”去救援，如果此时更改初衷，轻而进攻同是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恐将来会招致国人的怀疑甚至反对，多少会加重法国国内的动荡。再则，如果进攻拜占庭，与之有联盟关系的德皇很有可能成为法国的敌手，而德意志又是法国的近邻，必将严重威胁着法国的安全。

左右权衡之下，法王路易七世断然否定了进占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当然，他的决定主要不

是宗教目的，而是现实需要。

法国十字军未起“越格”的意图，使得拜占庭皇帝可以抽身专门对付扬言要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西西里王国舰队。根据目前形势，西西里国王罗塞尔预料，此次进攻拜占庭的首都不会有太好的结局。于是，西西里舰队掉转船头，班师回朝去了。

拜占庭皇帝又一次成功地躲过了一直盘旋在帝国上空的“恶运”。

法王继续东进，一旁是荷矛持剑的骑士军。另一旁是花林粉阵的艳妇队，是出师表，还是行乐图？趸奈王后在“圣地”大冒爱情之险，与安条克公爵交往越格，法王有如喝了满腹凉水……

法国十字军的队列异常豪华排场，路易七世年轻风流的王后、阿奎丹公主爱丽诺伴君左右。其他领主们也都纷纷效法国王，领妻带妾，同享东征“异教徒”的乐趣。随同王公贵族一起东向的还有女侍、乐师等各色仆从。东征队伍中有如此之多艳装的贵妇，妖冶的女仆，给精通道

术的骑士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好机会。贵妇人缠绵的柔情密意与骑士们倜傥的琴心剑胆交相呼应。

一时间，东征途中出现了一支国王游乐队，鼓乐常鸣，歌舞常伴。如果单从这一队人马来看，法国来的不是十字军，而是由路易七世和王后爱丽诺带领的狩猎队，有猎物算是意外收获，没有猎物也不必大失所望。

但是，随在贵族十字军之后的是破衣烂衫的贫苦农民，他们为求得天国与人世的好运，奔向茫茫无知的天涯海角。他们的行色与天公们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法国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对先于他们出发的德皇军队的战况并不了解，拜占庭皇帝曼纽伊尔及时利用了法国军队的“消息闭塞”，更是利用了“信仰保卫者”的熏心利欲，派人四处传递“可靠的”消息，说德国十字军在小亚大获全胜，并且已经占领了爱科尼阿姆苏丹的首都。法国军队哪里知道，此时此刻的德皇正在尼西亚附近满面愁容、眼巴巴地企盼着法国十字军的到来，同时也在享受着“孤家寡人”的美味呢。

拜占庭的目的就是要让法国十字军离开君士坦丁堡，减轻城内遭受劫掠的程度，让他们赶紧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去与德皇“共同庆祝与异教徒作战的胜利”！

路易七世并未怀疑德皇胜利的“消息”，下令渡过海峡，与得胜的上帝勇士们会合。

令法国十字军大为扫兴的是，他们在尼西亚见到的是少得可怜的残兵败将，首领士瓦本公爵腓特烈亦是颓唐不堪。随后，法王又见到了康拉德三世的“勇士们”，亦是所剩无几、劫后余生的形象。法王暗自觉得，这般猛士们落魄的样子实在好笑。

两国十字军开始共同行动。为了避开塞尔柱人的锋芒，避免不久前德国十字军的悲惨命运，他们不再沿腹地前进，而是绕道小亚细亚的西、南省份，沿着半岛的沿海地带前行，这里还有一些地方属于拜占庭管辖，如彼加姆、斯麦那、以佛所等等。但是渡急流、越高山，还是使得十字军精疲力竭。

此时的德国十字军是夹着尾巴做人，而内心并不诚服法国军队的指手划脚。双方一旦发生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不和，法国十字军便会立

即将“残兵败将”之类的词语加诸对方。

德国勇士们忍受不了嘲笑和白眼，在以佛所，两家分手，德国骑士军从海道返回君士坦丁堡，待重整旗鼓之后再向东方进发。

1148年初，法国十字军依然行军在山岩重叠的小亚细亚西部边缘。塞尔柱人不时地从东面突然袭击，法国军队损失不少，粮秣亦被“异教徒”抢走大部。

受尽苦难而执着不变的是贫苦农民，但是最受歧视的也是他们。在贵族骑士们的眼中，农民一无武器，二无马匹，更无钱财，让他们跟在身后简直是个丢人现眼的累赘。

不久，甩掉累赘的机会到来了。1148年2月，十字军到达小亚细亚半岛南部沿岸城市亚达里亚（属于拜占庭）。亚达里亚统治者答应为十字军提供船只，将他们送到叙利亚。但是，船只有限，仅勉强能将贵族骑士们运送过去。骑士们毫不踌躇地将农民遗弃在小亚细亚，他们自己则扬帆而去。落难的农民几乎无一生还，不是死于塞尔柱人的刀枪之下，就是死于饥饿和疫病。

十字军东征的最初目的地是伊德萨，准备

将之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但到了地中海东岸之后，他们却忘了自己的主攻目标。

轻装上阵的法国十字军到达了伊德萨之南的安条克公国，不久，整装完毕的德皇康拉德三世的队伍也渡海而来，到达了耶路撒冷天国的沿海城市阿克。

此时，耶路撒冷王国正与东面的大马士革"异教徒"作战。法德两国的十字军立即伸出"救援"之手，汇同"圣地"的军队，合围大马士革城。

然而，大马士革城墙坚固，守城的塞尔柱军队誓死卫城，十字军的攻城一无进展。大马士革的总督又以大量黄金收买了一部分"圣地"骑士，让他们自己打消攻城的念头。同时，已经占据伊德萨伯国的摩苏尔总督又派援军，从北面开抵被围的大马士革，其首领是总督基善之子努尔·阿德·丁。

十字军见势不妙，便及时收场，兵士们无功返回圣地，对北方的伊德萨也不敢再去问津。

康拉德三世手下兵少将寡，自知前途无望。1149 年春，他领着一小队人马由君士坦丁堡返回德国。

滞留在安条克的路易七世更未得到任何好处。轻佻放荡的王后爱丽诺不甘寂寞，与安条克公爵雷门秋波频传，发生了在基督徒看来是“大逆不道”的罪恶关系。满城风雨的“王后桃色新闻”使得路易七世恼羞成怒，而且再也无法继续呆在安条克。在德皇离开东方的几个月之后，法王也回到了本国。路易七世不能容忍王后的“不贞、不忠”，将之废掉，而爱丽诺并不介意，迅即转嫁英王亨利二世。法王则另娶阿丽斯为后。阿丽斯是康边的狄奥巴德二世之女，终死于1206年，其子为著名的腓力二世，即“奥古斯都·腓力”，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之一。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彻底破产。法王、德皇并未捞到半点好处，其中法王尤为狼狈。法兰西国内的分裂割据势力在国王出征期间再度猖獗，王权受到严重威胁。另外，法兰又背上了累累债务，圣堂骑士团和善堂骑士团向他提供了数以万计的银马克，作为东征经费，如今骑士团即将登门索债，岂不急坏囊中羞涩的堂堂法兰西国王？再则，王后爱丽诺在“圣地”的爱情冒险，也使法王处于难堪的境地，万民之主的一国之王竟然顶上了绿帽子，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东征的失败使罗马教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伯纳领导的西妥教团也名誉扫地。教皇尤金三世将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完全推到明朗谷修道院院长伯纳身上，毫不留情地封他为“笨蛋”。

伯纳立即予以反击，他声明他完全受命于教皇，失败的责任绝不在于自己。后来西方史学家力图为伯纳辩护，认为他属无辜之人，他的唯一可被指责的地方是，他允许妇女参加东征，而未能料到这一失策会造成流传千古的丑事。

面对西方世界的纷纷议论和责难，伯纳恼火而又无奈。他曾对手下的教士们说：“这次东征实在是深不可测的深渊。凡参加战争而未受指责的人，我必须说他福份不浅。”可惜伯纳自己未享受到这股“福份”。

事隔不久，伯纳想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向教皇提出再次组织十字军进行东征，尤金三世勉强同意。法国的一批僧俗贵族提议，由伯纳亲自指挥十字军的东征。

1150 年 6 月 19 日，尤金三世正式下诏，批准明朗谷修道院院长伯纳为十字军领袖，即日起伯纳便可开始组织新的十字军。

但是，伯纳的“宏伟计划”在此便停顿下来，

不知何故，再也未见下文……

多才而有骑士气概的萨拉丁千军横扫，耶路撒冷成为铁掌中的羔羊，基督教的“圣地”魂归“异教”，西方世界警钟长鸣！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天国，在步履蹒跚之中飘摇了将近一个世纪。温斯顿·丘吉尔不无见地地指出：“它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于周围的穆斯林国家彼此不和。”

自12世纪70年代开始，穆斯林世界发生了令西方基督教国家胆寒的巨大变化，近东地区有组织的力量正在急剧发展。

1171年，一个新面貌的国家——埃及出现在东部地中海区域，它统一了西亚的一大部分地区。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国家由此时急转直下。

主宰着这一方世界的是卓越的军事统帅优素福·萨拉丁（1139～1193年）。他的出现，改变了近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击碎了西方基督教

世界永占“圣地”的梦想。

萨拉丁，出身于叙利亚库尔德族，1169 年任埃及大臣。但是，蛟龙卧虎并不甘于沉默，1171 年，在近卫军的支持下，萨拉丁发动政变，推翻了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阿迪德，自立为苏丹，在埃及建立了阿尤布王朝（1171～1250 年）。短短几年之中，萨拉丁统一了埃及、汉志、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一个伊斯兰教大国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萨拉丁不能容忍西方十字军人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安家立国，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消灭基督教的“命根子”——耶路撒冷王国。

有引子，才能爆发。进攻“圣地”的理由并不难找。

法兰克领主沙提云的累诺德成了萨拉丁投射的靶子。累诺德的“骑士风范”积重难改，多次走出国门行劫过路的商人，终于被穆斯林军队捉得，在“异教徒”的牢狱中修炼了几年。许重金获释以后，累诺德又回到了耶路撒冷王国，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克拉克城堡。

然而，伤疤刚好，杂念又起，累诺德毕竟忍受不了自己从不习惯的安分守己，更是挡不住

来自穆斯林商队的金钱的诱惑。

1187 年春的一天，无聊难捱的累诺德透过城堡高塔的窗户远眺，一支从埃及去叙利亚的商队落入他的鹰眼之中，吸引他的当然不是这些“异教徒”，而是骆驼、马匹背上的那些值钱的东西。累诺德立即召呼手下扈从，披挂整齐，冲出城堡，将商队财物抢掠一空。

激动不已的累诺德忘记了自己曾在“异教徒”阶下的岁月，满屋的战利品使他再也不去回忆当初对穆斯林人所作的“永不行动”的宏誓大愿。他深知穆斯林之法，但是好冲动的大脑使他“攫金不见人”。

埃及苏丹萨拉丁立即致函耶路撒冷国王律星云的归多，要求赔偿损失，惩办抢劫犯。但是归多不敢得罪拥有很大势力的这位陪臣，苏丹的要求迟迟未见答复。

既然如此，萨拉丁决定以血刃换罪人，埃及的军队对十字军国家也发起了“圣战”。萨拉丁向好战的游牧军人许下诺言：今生在冒险事业中获得战利品，来世便可进入极乐世界。穆斯林的“圣战”军队在萨拉丁的率领下，直捣最大的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

“异教徒”来势凶猛，十字军王国人人自危，忧心忡忡。律星云的归多感到自己头上的王冠太沉，已经无力支撑下去，在恍惚之中，红地毯上的国王专用的坐椅似乎正被“异教徒”用火焚烧。归多立即派使臣西归，要将摇摇欲坠的王冠献给法王腓力二世，未获结果后，又要将之奉送于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令归多遗憾的是，英、法君主并不接受他的“礼物”。他的王冠还得由“异教徒”来帮助摘掉。

归多的十字军接连遭受挫败，归多更是寝食难安。

1187年7月初，埃及和叙利亚的穆斯林联军约6万人从摩苏尔和阿雷波前进，占领了提比里亚。此时的十字军主力正在哈丁城，穆斯林军队立即开始围困哈丁，计划在此将十字军所剩无几的锐气一次销尽。

1187年7月5日，双方在哈丁附近的高地上展开血战，十字军“大获全败”，几百名骑士和数千名步兵全部阵亡，国王归多以及许多贵族首领为萨拉丁所俘，成为“异教徒”手下的奴仆。

哈丁之役之后，萨拉丁采取进一步措施，切

断耶路撒冷与欧洲的交通路线，占领沿海城市。一个多月以后，阿克、贝鲁特、西顿、雅法、凯撒利亚、阿斯卡隆等城尽入萨拉丁之手。

穆斯林军队势如破竹，余勇尚存。萨拉丁下令：将“穷寇”追杀到底。

1187年9月下旬，埃及军队东进围攻十字军基督教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主力部队已经葬身哈丁，国王也成阶下之囚，城内势单力薄的守军根本无力也无心再继续为“上帝”牺牲自己的性命，羊已逃之夭夭，补牢何济于事？

“圣城”的基督徒们不再为信仰所缚，他们要将“主陵”所在的“圣地”献给已经掐住他们喉咙的“异教徒”。

1187年10月2日，耶路撒冷的城门大开，萨拉丁的军队顺利地进入城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一个令天主教会以及西方国家泪垂心酸的日子。也是近东世界穆斯林们呼天欢庆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圣城”耶路撒冷几乎再也没有回到西方基督徒们“圣洁”的怀抱里，盘据将近一个世纪的十字军人被迫离开这座使他们“光宗耀祖”的宝地。

进城后的萨拉丁当即宣布，允许基督教徒

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必须缴纳巨额赎身款。圣堂骑士团和善堂骑士团在下层民众的威胁之下，将“代他人保管的钱财”拿出，一部分获得自由的基督徒旋即奔往他乡。但尚有1.6万余人因无力交付巨款而沦为穆斯林的奴隶。

至此，除了的黎波里、安条克以及耶路撒冷之西的滨海小城泰尔之外，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地区全部落入穆斯林之手。

耶路撒冷飘扬起穆斯林的旗帜，耶稣墓前的土地被“异教徒”踩在了脚下。

历史并没有就此休止，“圣地”失陷的噩耗不久就传到了西方……

教皇发出号召：勒紧腰带，节衣缩食。准备“圣战”，为的是保全已经坍塌了的天主教权威；法王、英王、德皇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准备出击“异教徒”，但他们的举动决不是出于爱基督教的上帝，也决不是出于恨穆斯林的真主。

西方世界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王国轰

然而塌，“圣城”的圣光顿时遁入天外。

天主教会大为震惊，有如晴天霹雳打在了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上空，梵蒂冈的气氛陷于悲凉之中。

年老体迈的教皇乌尔班三世接受不了信使传来的信息，既惊又惧之后，便一命呜呼，去天庭与上帝共商国是去了。

接管已故教皇职位的是格里高利八世，他立即下谕天主教世界，所有基督徒为进行新的“圣战”必须“克己奉公”。圣谕规定：天主教徒每星期五完全禁食，期限为五年；同时，人人在每星期三、六两天中禁肉食，期限也是五年。教皇要全体基督教子民在这五年之中厉行节约，将所得钱财充作“圣战”之用。当然，这种让人忍饥挨饿的圣谕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有谁愿意为拿不准说不定的来世幸福而苦了自己的肠胃呢？就连颁布此谕的教皇格里高利八世也未能履行自己的诫条。

格里高利八世又是一个短命教皇，仅仅辉煌两个月之后，又被克列门三世所取代。克列门三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遵循着前任教皇的步伐，继续到处说教，希望在天主教世界掀起

参加“圣战”的狂潮。此时的天主教会威信大不如前，信仰的城墙已经不是坚不可摧，教徒们的宗教热忱已经大大降温。然而，克列门三世竭尽力量，打算通过组织一次成功的十字军东征来重新扶起天主教那份已经倒塌了的权威。

在克列门三世的鼓动之下，一批忠心耿耿的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修道院长心绪沸腾，拜在教皇的“圣脚”之下，立誓要走遍西欧各国，劝谕英、法、德等国的“信仰之民”勇敢地投入“圣战”。

然而，12 世纪末的西欧不再是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番情景。教会的苦心布道已经激发不起下层民众的“为信仰而战”的狂热之情，农民已经越来越远离“功德无量”的十字军运动了。

第一次、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下层贫民是一支巨大的力量，然而，偿试的结果已经表明，农民们到东方去追求财富和摆脱压迫的努力遭到完全失败，通过东征来寻求“宗教功德”的幻想已经大为破灭。另外，12 世纪西欧城市的复苏给农民们提供了一条更为现实、更为可靠的改善自己处境的途径，这就是逃往欣欣向荣的城市。在这里，农民有了获得自由的希望，再不像

去“圣地”求功德那样虚无缥缈，自由就在眼前，财富就在身边。

因此，从12世纪末开始的以后各次十字军东征，其主要力量是骑士和大领主，西欧各国的封建君主经常成为东征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另外，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共和国也开始谨慎小心地加入到东征队伍中来，它们基本上不直接参战，而是甘做“后勤”。

意大利城市是东方贸易的主角，它们和其他国家的沿海城市一起，在与东方的贸易中迅速发展起来。从威尼斯、热那亚、比萨，法国的马赛、蒙特彼利埃，英国海岸，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地，经常有载满多种货物的商船到达东方，货物售出后，西方商人又购进东方商品满载而归，到西欧市场上以高出原价三倍的价格抛售给贵族领主。

正是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有着令人着魔的吸引力，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才刻意培养起自己的“宗教热忱”来。俄国史家扎波罗夫对此的见解颇为中肯，他说：“意大利商业城市之为侵略者服务，如供应武器、粮食、攻城器械、人力增援、维持十字军骑士与欧

洲的交通，决不是出于爱基督教的上帝，也决不是出于恨穆斯林的真主。商人和船主有他们自己的黄金偶像。”

在商人们的眼中，金钱和财富就是实实在在的上帝，他们早已经把“敬神的事业”当作生意来做了。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意大利的商人通过其特有的“宗教功德”，在耶路撒冷、雅法、泰尔、安条克和其他东地中海沿岸城市获得了广泛的商业和政治特权，同时在叙利亚的所有大型工业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保证在东方的特权不受“异教徒”的侵犯，商业城市当然要参加冠冕堂皇的“主的事业”了。

骑士和大领主之所以成为东征军的主要力量，封建君王之所以成为东征的积极响应者，商业城市之所以竭力“支援”十字军东征，由此便可找到其根源的真正所在：地中海贸易的向心力。

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开始，西方军人的宗教外衣逐渐地滑落到地上，“务实”的作风名副其实地实行起来。如果“世俗利益”需要，上帝亦可被打翻在地。罗马教廷对此痛心疾首，不愿

将东征的世俗意图公布于光天，但是此时的十字军已非它所能左右的了。

各国十字军听从而且是虔诚地听众罗马教廷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响应教皇的征税号召。1188年，教皇下谕，在英法两国征收动产什一税，名为“萨拉丁什一税”，用以反对“异教徒”。农民首先起来反对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无法忍受的赋税负担，其中比较激烈的是法国，农民们举行暴动，杀死“萨拉丁什一税”征收员，焚烧公署，最终迫使当局不得不取消了这种苛捐杂税。

按照教皇的旨意，僧侣也是被征收“萨拉丁什一税”的对象。尽管税收用于“神圣的事业”，但他们并不愿意拿出自己的收入，反而认为这一“神圣的使命”应归于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愿把“神圣的功绩”毫无保留地奉送给已经是食不裹腹的穷人。多么“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另一方面看，基督教僧侣完全清楚宗教的真实内容，他们知道，征收“萨拉丁什一税”肥不了上帝，得利的将只能是骑士、领主和商人。正是因为知根晓底，他们才敢斗胆对上帝的“人间代办”——教皇提出挑战。他们与农民一

起甘冒“叛教”的风险。

著名的教会人物兼作家布尔瓦副主教彼得曾慷慨激昂地说：“如果公爵们以新的朝圣名义……视基督教教会为奴隶，向它征收捐税，那么教会的忠实儿子应该宁死勿屈！”

当时的法国诗人科农曾直率地道出十字军东征者的目的：“他们加入十字军是为了金钱、为了向僧侣、市民、农民征课什一税，他们的十字标记不是信仰，而是私欲。”

被利益激起的冲动最难平息。农民的暴动、舆论的谴责丝毫不能打动已经决意“为上帝而战”的勇士们。

意大利的“上帝卫士”最先起锚。西西里王国、比萨和热那亚等各有一支短小并不精悍的船队已于 1188 年驶向叙利亚，它们要先抢为快。但他们毕竟人少力薄，难成大事。十字军的主力出自英国、德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的君主成为各国十字军的统领。

首先宣布决心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是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亨利二世（1154～1189 年在位）。在位的 35 年当中，亨利二世雄心勃勃，努力加强王权，并巩固英国的海外利益。

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日趋繁盛，使得地处英吉利海峡之西的英国羡慕不已，亨利二世殚精竭虑要将英国与地中海的距离拉近，将英国的势力延伸到地中海沿岸。

亨利二世的玄想尚有一定的基础。由于历史的原因，亨利二世不但是英国国王，而且也是法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安茹和美恩伯爵。在英国，亨利二世处于独尊地位；在法国，他虽是法王的臣属，但是，法王对这种身兼二任的领主也是奈何不了，其势力尚未达到制服英王领地的程度。

不过，安茹和美恩地区与地中海贸易联系不紧，最为繁华的地方在阿奎丹。亨利二世心想，如果能将阿奎丹这块肥物弄到自己之手，英国的收益绝不会少。

机会终于来临。前文所述的法王路易七世与王后爱丽诺出征"异教徒"土地，爱丽诺在"圣地"大展风采，用自己迷人的美貌和姿韵搅动了安条克公爵雷门的心湖，演出了一场恋情短剧。路易七世怎么能容忍堂堂大国的王后偷偷倒入他人的怀抱？旋即，爱丽诺被摘掉桂冠，遣回阿奎丹。令法王于心不忍的不是轻佻浮华

的爱丽诺被休，而是阿奎丹的重归旧主。他也清楚，休掉爱丽诺，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阿奎丹。但是，极端看重“名誉”的路易仍是坚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

名节是小事，实利居第一。这是英王亨利二世信奉不移的准则。爱丽诺独居阿奎丹之后，亨利二世立即展开婚姻外交，不久，爱丽诺又成为亨利二世的王后，名花易主，阿奎丹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到英王的名下，英王一举又成为阿奎丹的领主。拥有了阿奎丹之后，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因而当十字军国家在东方“受难”之时，亨利二世就不得不挺身而出，要为夺回“圣地”而奔走效力。

与爱丽诺结婚，英王绝不是想“捡破烂”而是为了“破烂货”手中的金钱。亨利二世的确如愿以偿。

亨利二世并不满足于仅仅拥有阿奎丹，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国家也在他的扫瞄之中。在中世纪的西欧王室间的儿女联姻是重要的外交手段。亨利二世深谙此道，他将自己的儿女全与外国统治者结成了“秦晋之好”，通过这种方法来确保英国金雀花王朝在地中海沿岸国家中的势

力。

经过亨利二世的外交努力，他的一个女儿成为西班牙地区卡斯提国王阿尔方索的王后；另一个女儿嫁给了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但这对夫妇有花无子，没有留下子女，因而英国人未能继承西西里的王位；亨利二世的儿子查理娶了那瓦尔公主贝莲加（亦译作贝林格利亚）。

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利益促使英王亨利二世密切注视着十字军国家的发展势态。同时，英王关注东方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在耶路撒冷王国，也有着金雀花王朝安茹家族的亲属，耶路撒冷国王福尔克（1131～1143年）是亨利二世的外祖父。因此，英王坚信耶路撒冷有自己的一份，如果条件许可，应将之完全纳于自己的囊中。

要谋巨利，就必须付出代价；有投入才能有产出。深谋远虑的亨利二世多次捐赠巨款，作为保卫“圣地”不受“异教徒”侵犯的经费。

为了尽快尽早地在地中海沿岸占据一席之地，远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亨利二世就已萌发东征的念头。他曾与法王路易七世和女婿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协商，准备组织十字军进军“圣地”，以谋求上帝的恩典。只因后来国内政局出

现波动，亨利二世才被迫将此事暂时搁置。

当罗马教皇的使臣前来劝说亨利二世组建十字军东征之时，统治世界至少要统治地中海地区的旧时梦想再次搅动了这位已经是垂垂老矣的英国国王。未经多少犹豫，亨利二世便作出果断的决择，服从上帝的安排，听任教皇的指挥，准备组织一批“上帝的勇士”，为“宗教功德”甘愿赴汤蹈火，为“世俗利益”甘做马前之卒……

第二位被罗马教皇外交手段打动的君主是德皇红胡子腓特烈（1152～1190 年在位）。40 年前，血气方刚的腓特烈曾以士瓦本公爵的身份追随其父康拉德三世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然而，东征的德国十字军被“异教徒”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的残兵败将壮着怯胆在地中海东岸“巡游”了一番之后，两手空空地回到了阔别两年之久的德意志故地。

前车之鉴可作后车之师。但是，前一次东征的惨败并未给已经年迈的红胡子腓特烈多少教训，征服世界的宏愿驱使他不顾年老体衰的不便，踏上了“主的征途”。

红胡子腓特烈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参加由教

皇发起的“圣战”，可以从其以往的对外政策中找到历史渊源。

红胡子在位38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恢复并巩固“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权。

他首先将精力投入到北部意大利，在近20年的时间中，他多次派兵伦巴底，企图取得对伦巴底各城市的霸权。德皇的巨大攻势迫使伦巴底各城市联合起来，在教皇的直接支持下，城市联盟与红胡子腓特烈展开猛烈的军事和政治争斗。1176年，双方在林雅诺摆下阵势，血战之后，腓特烈以惨败告终。一向以意气风光、盛气凌人而著称的红胡子腓特烈不得不随境就俗，在罗马教皇面前卑躬屈膝，并于1177年与教皇和伦巴底城市联盟签订了屈辱的“威尼斯和约”，红胡子腓特烈在北部意大利的经营就此告终。

在北部意大利的失败，也未能使红胡子金盆洗手，终止其图谋霸权的一贯宗旨。他要励精图治，把深不可测的目光投向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

西西里的经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欧洲

到北非最为便利的捷径，从此到东方也相当方便。西西里岛沿岸的一些港口如墨西拿、巴勒摩、喀大尼亚等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西欧船只的集散地。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凭借着天然的地理优势而获得了巨额财富，诸多从事商业的国家都在觊觎着这一不可多得的要地。

在军事上屡战屡败的红胡子腓特烈这次放下了手中的钝刃，要用“婚姻外交”的手腕达到占有西西里岛和南部意大利的目的。

负有说媒任务的使者穿梭在西西里和德意志之间，腓特烈的计划大获成功。1186年，他的长子(后来的德皇亨利六世)与西西里王位继承人康士坦西亚公主在米兰共和国的天主教堂中举行盛大的婚礼。

成功的婚姻外交，其威力绝不亚于在战场上所取得的胜利，在满目和谐的气氛中可以让对手心甘情愿地将一切奉献出来。亨利与西西里公主的成婚，使西西里乖乖地落入了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手中。

拥有西西里并不是红胡子腓特烈的最终目标。他自认为是加洛林帝国查理大帝的继承者，其目标是要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版图。据有旧

时罗马帝国一部分的拜占庭帝国成为红胡子的目标，他希望能够通过向东武力扩张达到统治地中海世界的雄心。他曾轻蔑地说："小小的希腊算得了什么？朕要让他匍匐在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脚下！"

罗马教皇的游说正合腓特烈的心意。尽管曾经低三下四地在教皇面前承认错误，但腓特烈并没有忘记教皇是自己的死敌。但是，如今利益在即，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毅然捐弃了"前嫌"，成为教皇麾下的一员猛将。

1188 年 3 月底，年近六旬的红胡子腓特烈宣布：为主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余热，要通过十字军东征获得宗教功德、世俗利益双丰收……

还有一位积极响应教皇"圣谕"的君主，就是法王腓力二世（1180～1223 年在位），后来人称"奥古斯都·腓力"。

十字军东征给法国带来的利益，并不象英国和德国那样直接和明显。此时的法国在欧洲事务上尚数无足轻重的三等小国，法王的领地只是法兰西岛以及周围一些地区，处于其控制之下的还不到半个法国。腓力二世即位之初，势力相当单薄，英王亨利二世尽管属于自己的陪

臣，但自己实力远远赶不上这位一直心怀不轨的“家丁”。西部法国大西洋沿岸地区完全是英王的领地；南部法国的一部分也是英王的势力范围，通过婚姻外交而居于阿奎丹公爵的亨利二世有权置土鲁斯伯爵于自己的陪臣之列，而与东方贸易的中心之一的马赛，又是土鲁斯伯国的领地。南部法国的孛艮第王国则受德皇的统治。因此，当时的法国只不过还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国家，与海外的贸易联系仍然极为有限。至于腓力成为人们尊敬的“奥古斯都”，乃是数年之后的事情，到那时他才有能力大肆扫除割据势力，将领主们的土地收归到卡佩王朝的国王之手。

正是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境促使腓力二世参加了东征军的行列。他要通过对异教徒的“圣战”来增强法国王室的统治权，提高法王在国内外的声望，并积累人力、物力和财力准备与金雀花王朝的英国展开殊死搏斗。

为了出征后的国内安宁，同时也为了“合作成功”，1188 年冬，英法两国国王约言修好，暂时放弃敌对行动，准备组织十字军东征。经过协商，为了区分国别，英国人衣服上缀白十字，法

国人缀红十字，弗兰德尔人缀绿十字。

就当十字军准备集合出征之时，两国又起战事。在腓力二世的煽动下，亨利二世之子波亚图伯爵兼阿奎丹公爵的理查起兵反对父亲。在追杀父亲的军队时，理查被一位忠心耿耿于其父的军官打在马下。能屈能伸的理查王子跪在军官面前，对军官哀求道："您就饶了我这条命吧！"军官并不正眼瞧他，而是挥起手中的利剑，一下将理查的战马刺死，然后回头对理查说道："我不杀你，将来上帝会杀死你的！"

不孝之子的反叛使得亨利二世忧心如焚，1189年7月，亨利二世在悲哀中死去。临终之前，他曾说道："朕早已预言，朕的小儿子将会起来反对他的生身父亲的……"

理查继位，登上了英国的王位，因其性格怒暴刚强，而获得了"狮心王"的绰号。亨利二世在十字军当中的地位，也由新王理查担当起来。关于理查的性格，温斯顿·丘吉尔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描述：

"理查狂暴好杀，又鲁莽急躁，因而并非诡计多端，也不是残忍成性。他既好得罪他人，也同样容易原谅别人；慷慨大方，挥霍无度；在战

争中慎于计划，巧于执行；在政治方面单纯无知，既不敏感，又缺乏经验。他根据自己的好恶交结政治盟友，政治计划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通过自己的军事天才所取得的有利条件，由于外交无能而丧失殆尽。”

英国国内陡起的战事推迟了英法十字军东征的开始，本来早应联袂起程的两国骑士领主却落到了红胡子腓特烈之后……

红彤彤的太阳沉入了海底。事出不料，红胡子腓特烈溺死在“异教徒”的河里，喝基督教“圣水”长大的德皇纵饮山溪塞利夫……

初春的德意志，乍暖还寒，德皇宫廷却已热闹喧嚣起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正在布置善后事宜，向皇储亨利交待一些自己出发之后但仍放心不下的国家大计。

经过一年的准备，1189年3月，红胡子腓特烈跨上战马，率领德国十字军，从多瑙河畔的累根斯堡正式出征，沿着当年布里翁的哥德夫

利所走的战线向东进发。

十字军的人数远远比不上从前，农民们已经不再向往“神圣的东方”。虽经红胡子腓特烈的苦心征集，但所得的骑士和步兵总数也只有3万人左右。

40余年的戎马生涯磨练了德皇坚强而狡猾的意志，如今的腓特烈已经不再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的那位莽撞单纯的士瓦本年轻的公爵了。战争并不只局限于弹丸之地的沙场，决定战争得失成败的也并不只是兵力的多寡、武器的优劣。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如果能将战场以外的各种因素充分利用起来，完全转化成对自己有利的条件，那么战争的胜负就显而易见了。

腓特烈施展了沙场之外的外交功夫。

东征开始之前，为了保证十字军进军线路的畅通无阻和粮秣供应，腓特烈先后与匈牙利和拜占庭进行外交谈判，因为从德国到东方“异教徒”的领地需要经过这两个国家。

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令红胡子腓特烈相当满意。匈牙利国王培拉三世不愿得罪一手遮天的邻国皇帝，当即表示同意，德国十字军可以假道匈牙利东进，并且供给十字军以充足的粮食。后

来的结果表明，德国十字军的确安全而顺利地走出了匈牙利。

与拜占庭帝国的谈判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起码当初是如此。1188年12月，拜占庭使臣到达累根斯堡西北的纽伦堡。谈判商定，德国十字军可以自由地经过拜占庭领土，同时拜占庭还以优惠的价格向德国十字军出售粮秣。为了表示诚意，德国方面也作出一些姿态，腓特烈向拜占庭使臣保证，他的军队决不对拜占庭作出任何敌意的行动。但是话出之时，红胡子在心里暗道："小希腊何足挂齿，来日方长……"

对于腓特烈的友好誓言，拜占庭方面并不敢深信不疑，皇帝以撒二世更是心怀恐惧。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红胡子腓特烈不会成为自己的朋友。

首先，最近盛传，以"基督教保卫者"自居的腓特烈与拜占庭的敌人、邻近的爱科尼阿姆苏丹基利什·阿斯兰有着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奇特关系。两国舍弃了"上帝"与"真主"的对立，竟然走上了结盟的道路。腓特烈从基利什·阿斯兰方面获得诺言：德国十字军可以比较轻松地经过小亚细亚。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

这种传言并不完全属实。但是，尽管是谣言，也不能不使拜占庭皇帝胆颤三分。

其次，红胡子腓特烈在东欧国家的一系活动也使拜占庭皇帝惴惴不安。本次十字军开始之前，保加利亚民族起兵反抗自己的宗主国拜占庭，爆发了长达两年的起义（1185～1187年）。起义之后，拜占庭不得不忍痛割爱，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王国出现在拜占庭帝国的身旁。同时，塞尔维亚也从拜占庭帝国分离出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两个国家虽然已经独立，但它们对当初的宗主国仍抱有近乎刻骨的敌意和仇恨。

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两国与德皇在欧洲的交往，让拜占庭余悸难消。1188 年 12 月的纽伦堡会议上，德皇与塞尔维亚大公斯提凡·涅曼雅的代表商谈两国关系问题；1189 年 7 月，当德国十字军抵达塞尔维亚的尼什城时，腓特烈与当地的行政首脑进行了“气氛融洽”的会晤；同是在尼什，德皇又与来自保加利亚的贵族代表进行商谈。其中心问题当然都免不了谈到拜占庭这个“小希腊”。

但是，红胡子腓特烈尚有高明之处，他并不

与这两个国家直接结盟，而是以长者的身份为这两只失途的羔羊指点迷津，让它俩去与拜占庭直接交锋。然而，这已经不能不使拜占庭皇帝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除此而外，复国的梦想也使得拜占庭皇帝对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心怀不满。

12世纪末叶，尽管拜占庭为内忧外患所缠绕，国土日趋缩微，但它们不愿放弃重新夺回被“异教徒”占领之地的企图。1185年，西西里国的诺曼骑兵和水师两次攻入拜占庭本土，并一度占领了拜占庭的第二大城市帖撒罗尼迦。另外，北部意大利的各城市共和国也频频发动进攻，迫使拜占庭让出种种特权。

即便如此，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首都君士坦丁堡仍是与东方进行贸易的重要中心，拜占庭仍然积极地参与东方的贸易活动。

西方国家借“圣战”之名在地中海地区争夺霸权，当然触痛了拜占庭的神经：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原本是我拜占庭帝国的国土，如今十字军在那里舞刀动枪，岂不是僭越我拜占庭的“神圣权利”？失去的江山应由我拜占庭去收复，怎能让它落到西方世界之手？无奈马瘦毛长，拜占庭

身虚体弱，力不从心，只能眼看着西方军人在曾属于自己国土的地中海东岸建国立业，谋取厚利。气可忍，声可吞，但心头的怒火却越积越甚……

德国十字军进入了拜占庭的领土。

令红胡子腓特烈恼火的是，当初与拜占庭皇帝约好的条件如今成了一纸空文！山重水复，阻碍重重。十字军所走的道路显然刚被破坏，骑士们的马匹时常仆倒在地，无法继续前行。山道、关隘被希腊士兵严密把守，德国十字军很难顺利通行。当初以撒二世答应供给的廉价粮秣，现在也不见踪影。

红胡子腓特烈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有的被拜占庭皇帝扣留甚至遭到拘禁。两国关系开始紧张起来。

不过，德国十字军同样也未能履行当初的诺言，他们不习惯讲理守法。刚进入马其顿，十字军人便纵火焚烧非利波波利城郊，1189 年 8 月底，进占城区。

1189 年 10 月，红胡子腓特烈的使臣从君士坦丁堡回到了非利波波利，他满脸怒意地向红胡子说道："陛下，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了！君士

坦丁堡总主教在讲道中，竟把‘基督战士’比作猪狗。他向信徒们宣布：即使杀人以十计的惯犯，如果他能杀死百名十字军人，其以前的罪行可以一并赦免……”闻听使臣此言，腓特烈的那撇胡子顿时竖立起来……

1189年深秋，红胡子腓特烈数次写信给留守国内的儿子亨利（未来的德皇亨利六世），指示他与北部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以及阿科那等城妥协，征用它们的船只，武装以德国军队，准备从海陆两路同时围攻“背信弃义”的君士坦丁堡。腓特烈还特别指出，要亨利竭力争取罗马教皇的支持。

拜占庭皇帝以撒二世也并没有闲坐皇宫，1189年夏天，他就已经与“异教徒”的首领、十字军的“最凶狠”的敌人萨拉丁结盟，其条件是：萨拉丁支持以撒二世反对德国十字军，而以撒二世则支持萨拉丁反对基利什·阿斯兰。与德皇腓特烈一样，拜占庭皇帝也舍弃了“宗教信仰上的差异”，让“上帝”与“真主”会聚一堂，握手言欢。

德皇对拜占庭的战争似乎要拉开序幕了。但是罗马教皇并不信任红胡子腓特烈，更不愿

让这位不久以前还是自己敌人的皇帝在拜占庭捞到好处。另外，王储亨利在北部意大利的努力也未获成功，热那亚等城市不愿冒损兵折将的风险。

拜占庭再一次避免了杀身之祸，当然这只是暂时的逃避。西方国家时刻也没有忘记东方这块肥地。

拜占庭皇帝以撒二世在庆幸逃生之余，决定对德国十字军作出一定“让步”，让他们顺利通过拜占庭的土地。

1190 年 3 月底，德皇率领十字军从阿德利安诺普出发，行军数百里之后，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小亚细亚。

德国十字军在这里开始了更为艰辛的历程。“异教徒”们早已将道路破坏殆尽，十字军沿着小亚细亚西部崎岖的小路艰难地跋涉。另外，拜占庭尽管让他们“顺利”过关，但却拒绝供应他们粮食。而且，当十字军在“异教徒”占领区缓慢向前蠕动的时候，还不断受到小股穆斯林的袭击。基利什·阿斯兰的后人已经与萨拉丁化敌为友，开始结盟反对十字军。

和前两次十字军一样，德国军队尝到了“斋

戒”的甘苦。疲乏困顿的骑士在饥渴中向“圣地”进发，倒毙的死马和路旁的山果野菜成了他们的美味佳肴。

1190年5月，十字军占领了爱科尼阿姆，将城内可得的东西洗劫一空。饱餐痛饮之后，十字军携带战利品继续前进，到达了地中海岸边的西里西亚。此时十字军的情绪开始渐渐稳定下来。

但是，始料不及的事故凭空而来，死神正向红胡子腓特烈招手，而这位六旬老皇帝全然不知，仍兴致勃勃地扬鞭催马，向塞琉细亚狂奔。

1190年6月10日，红胡子腓特烈来到了离塞琉细亚不远的塞利夫山溪。望着对岸塞琉细亚的土地，德皇决定立即渡过塞利夫这条水流激湍的山涧溪水。小船在水中剧烈地颠晃，德皇正在预想着灿烂的未来美景，对眼前的险境早已超度物外。突然，一个巨浪扑来，掀翻小船，德皇连同其他几个卫士一同卷进了旋涡之中。

当十字军骑士们争忙赶来救援之时，红胡子腓特烈早已顺着汹涌的急流，飘得不知去向、无影无踪……

不知弥留之际的德皇脑海里浮现的是怎样

的一幕：是上次东征时的惨败，还是在教皇面前的卑颜？是外交婚姻的成功，还是治下诺大的德意志帝国？是自己未竟的东征事业，还是即将接任的王储亨利？或许，他什么都没有来得及细想，就被“异教徒”的污泥浊水吞噬了。

喝基督教“圣水”长大的德意志皇帝，如今勉为其难地狂饮于“异教徒”的塞利夫山溪，而且将永远在这里坐镇着“异教徒”的山山水水……

对于德皇的死因，尚有不同的说法，如“在渡口马失前蹄”，“饭后洗澡不慎所致”，等等。

德皇一死，十字军成了无头之鸟，立即解体四散。

一部分骑士立即从塞琉细亚地区到达安条克，但是，1190年夏，安条克爆发鼠疫，大部分骑士、贵族和基督教僧侣葬身于此；

剩下的一部分则于1190年秋抵达阿克，与耶路撒冷王国的残兵败将会合。

不久，另一支由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尔德率领的一支德国十字军也开到了阿克。

这就是红胡子腓特烈精心准备一年之久的德国十字军的惨象……

“他的一生恰似一场检阅，结束之后只留下一片旷野。”——温斯顿·丘吉尔对英国狮心王理查的评价。

德国十字军在东方“风光”了一年以后，英法两国才开始它们的东征，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都花在为东征所作的准备工作上，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英王理查。

亨利二世死后，理查登上了英国王位，同时也就成了即将出发的十字东征军的领袖。性格果敢的狮心王理查对这桩“上帝的事业”极为卖力，为了筹措“圣战”经费，他不惜花费翻江倒海的功夫。

根据罗马教皇的“圣谕”，全体基督徒必须节衣缩食，缴纳“萨拉丁什一税”。狮心王理查在这一点上对教皇表现得最为忠诚，成为最听教皇旨意的“基督教良民”。整个英国以及英王在法国的领地，一时间掀起了“为上帝而征税”的浪潮，下层民众有苦难言。

仅靠“萨拉丁什一税”，尚不能支付十字军东征的费用。对基督教事业“极端热忱”的理查

开始出售一切可以变成金钱的东西：政府官职、主教职位、特权、村庄、城堡，等等，在理查手中，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有利可图的"商品"。急需金钱的狮心王理查曾经宣布：只要有适当的买主，他愿意将伦敦出卖！可惜没人敢冒偌大的风险，与一国之主做这笔事关英国首都的交易……

另外，教皇克列门三世授权，理查可以豁免一些国内必要的军事人员，他们可以留守英国，不必出征东方。英王利用教皇的这一特许权，"动员"一些富户以巨额款项获得豁免权。理查则用得来的税款雇佣那批已经倾家荡产的穷苦之人，敦劝他们为"主的事业"奋勇拼搏。

当德皇红胡子腓特烈已经葬身"异教徒"土地之时，亦即 1190 年 6 月，理查率领随从和大队人马横渡英吉利海峡，踏上了欧洲大陆。出征之前，英法两国的国王已经商妥，两国十字军一同向东进发。同时约好，将来所得的一切战果均由两国平分。但后来的历史表明，国王们的"金口玉言"有时竟是一文不值！

1190 年 7 月初，英法两国"上帝的卫士"在勃艮第的魏塞尔会师，随即两军一同挥师东进。

但是，大队人马一起行动，沿途给养十分困难，时隔不久便又分道而行。英国十字军开往马赛，在这里租用了西班牙和法国的大约二百艘船只；法王腓力二世则率军至意大利北部城市热那亚，由热那亚市政部门负责提供海运工具。

为"上帝的事业"而结成的"盟友"棒打不散，英王理查，法王腓力二世选择了同一个中转地。1190 年 9 月，英法两军相继开抵意大利以南的西西里岛，在离墨西拿不远处安营扎寨。

寒冷的冬季即将来临，基于航海安全考虑，两国骑士军决定在西西里过冬，以免不测之事。

闲极则无聊之事发生，狮心王理查哪能甘心把一整个冬季白白耗费？他要充分利用这段"赋闲"西西里的大好光阴，实现其父亨利二世的未竟愿望：占取西西里，扩大英王的天下。

狮心王理查要取得西西里的统治权，从表面上看并非"无理取闹"，它有一定的历史前提。如前文所述，英王亨利二世展开婚姻外交，将自己的千金、理查之妹珍妮公主嫁与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想借此将西西里纳入英吉利的势力范围。怎奈天公不作美，这对夫妇不曾生下一儿半女，英王的苦心未得实报。然而，英王亨利二

世乃至后继的狮心王理查怎肯心平气和，岂能轻易将垂手可得的宝地西西里让渡出去？

1189年，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从人间走进阴世，这个地中海岛国立即进入政权纷争之秋。德皇红胡子腓特烈之子以西西里公主康士坦西亚之夫的名义要求享有西西里的统治权。而岛上贵族则拥立雷泽的坦克雷德为王，并获得成功。坦克雷德之所以登上西西里王位，尚有罗马教皇克列门三世的一份功劳，因为教皇竭力反对自己的政治冤家德国君主在西西里扩张势力。

本来西西里王位之争至此已基本平息，然而，狮心王理查却故意使之枝节横生，来到西西里之后，他便以已故西西里国王孀妇即他的妹妹珍妮的“合法权利”保卫者自居。

以耍弄权术为生的人不难找到为自己行动辩护的借口，狮心王理查对此并不外行。

参加“圣战”的十字军并不“神圣”，英国十字军在西西里到处横行，抢劫当地居民的财物，不久便激起西西里民众的反抗。有一天，一位英国骑士因强行“购物”与墨西拿的面包商人发生争执，旋即，争执的双方都招来了不少帮阵

助威者，英国的“基督战士”与墨西拿人大打出手，扭成一团，殴斗的结果，英国人并没有占得上风。

狮心王理查觉得，这正是“保卫妹妹合法权利”的好时机，他随即向英国十字军发出号召：教训一下西西里这一帮对英国人不敬的“不法之徒”。

宗教旗帜在这里不得不下垂至地，因为西西里岛也是基督教覆盖之地，岛上居民同英国人一样，同是基督教上帝的臣民。

英国十字军从海陆两路包围并进攻位于西西里岛东北角的墨西拿城。在与同信仰的墨西拿人作战中，英国十字军发挥出在与“异教徒”交锋时所不能发挥出来的聪明才智和不可阻挡的战斗力，墨西拿迅即成为英王理查的囊中之物。

墨西拿被克之后，英国十字军显示出自己的本色，在城内挥戈跃马，搜寻财宝以资行囊。凡是稍有姿色的女子皆未能逃脱十字军人的眼睛，多情的骑士们要将自己的“一腔殷勤”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墨西拿美人……

奸淫掳掠了墨西拿之后，狮心王理查并未

感到心足意满，他要乘胜进军，将战事扩及整个西西里岛。

与狮心王理查几乎同时开抵西西里的法王腓力二世在英国与西西里这场“官司”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俄国史学家乌斯边斯基认为，腓力二世是位“和事佬”，这位年轻的法国国王要劝说英国人和西西里的诺曼人化解如初。

的确，腓力二世在表面上保持完全的中立，他声称，他决不介入这场与法国利益无关的政治冲突中去。但是，法王的内心着实不是这般平静如水。英王的强大，绝对不是“与法国利益无关”！狮心王理查尽管名义上是法王的陪臣，但是软弱如羊的法兰西王室根本奈何不了这位忠心耿耿于英吉利事业的小霸王。因此，英王在西西里争夺权势，暗暗地触痛了腓力二世的神经。

在“中立”的面罩背后，腓力二世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与理查的直接敌人坦克雷德竟夜长谈，两者日益接近……

当英国十字军进攻墨西拿之时，腓力二世也亲自登上了法国的战船，在隐蔽之处远眺英国人的一举一动。英军攻势迅猛，进展颇快。腓力二世蹙紧眉头，取下身上佩带的弓箭，引弓猛

发，数支利箭飞向英国人的船只……尽管无济于事，亦可小解心头之恨。

德皇红胡子腓特烈溺死于山溪塞利夫的消息传到了西西里。狮心王理查对此并未大惊失色。然而，不久传来的另一消息却震动了他。继任的德皇亨利六世率领大军南进意大利，到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仪式完毕后，亨利六世将继续南行，进军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猎取西西里的王位。亨利六世南下无可厚非，他本来就是威廉二世的“合法”继承人！

理查深知德国军队的强横，英军根本不是对手。危险在即，理查已经没有更多的心思继续与坦克雷德为敌。

共同的危险使理查和坦克雷德握手言和。坦克雷德为表示和解的诚意，向理查支付巨款2万金盎斯，作为英国十字军人东征的费用。

法王腓力二世根据前时的约定，要求“利益均分”，然而，在金钱面前，理查出尔反尔，只给了法王三分之一的钱财。

对于理查的“不讲信义”，腓力二世赫斯大怒：你不仁，那我也就不义，报复你的日子尚在后面！

俄国史家扎波罗夫曾写道：理查“这个过于急躁的武人，缺乏政治感觉而有过人的天赋：在树敌结仇的艺术上他没有对手。”贪图钱财使得他与法王的关系日趋恶化。

当然，英法君王的冲突，金钱不是根本原因，其真正的根源在于英国的西西里政策与法国的政治利益发生严重的抵触，由分赃而引起的矛盾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正当狮心王理查与“异教徒”苦战之时，法王腓力二世却悄然而溜，在背后给了理查重重的一击……

实际利益的不一致使得英法十字军再次各自为阵。1191年春，在西西里吵闹了半年多的十字军才开拔前进。法王腓力二世不愿等待“残暴而贪财”的理查的军队，3月30日，扬帆驶离墨西拿，向地中海东岸靠近。

英国狮心王理查也不愿腓力二世留下来与自己同行，在理查的眼里，法王腓力二世简直是一位“不劳而获的巨型寄生虫”。法国军队出走10天以后，即4月10日，理查才率军起锚出发。

在宽阔的地中海上，理查王回想着自己在西西里岛半年多的岁月，不由得怒意顿起。

为了补偿在西西里的失败，狮心王理查要将已经脱离拜占庭帝国而独立的塞浦路斯岛拿到手中。1191年4月底，英王抵达塞浦路斯，随即与当地的首领发生激烈的争执，据说是他们“污辱”了理查王的未婚妻——那瓦尔公主贝莲加。英王极端“看重”女子的贞洁和尊严，他无法忍受希腊人的“放肆无礼”和“色鬼心肠”。

英国十字军迅疾占领了塞浦路斯岛，岛上所有的珍贵财物全都成了骑士们的猎品。

狮心王理查有着超乎人外的闲情逸致，战火刚刚熄灭的塞浦路斯成了他的结婚纪念地。在当地的一座教堂中，理查挽着妩媚娇美的贝莲加，在牧师的祈祷声中，许下了海誓山盟的诺言。

十字军东征成了狮心王理查的蜜月旅行，塞浦路斯岛成了贝莲加的游乐宫。有年轻貌美的王后相伴，狮心王已把在西西里的不快抛到了九霄云外。

贝莲加甜蜜的奉献、温柔的体贴使理查感到心满意足。这时，这位新婚燕尔的君王才突然

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1191年6月8日，狮心王理查率军抵达地中海东岸的阿克城附近。此时的阿克仍在“异教徒”的控制之下。

英法十字军在叙利亚登陆以后，立即与叙利亚、德国、丹麦、弗兰德尔、意大利等国的骑士会合，共同围攻阿克城。

然而，阿克城却久攻不下，骑士们用尽了一切攻城器械，但在坚固的要塞面前却于事无补。

十字军之所以不能取得进展，其原因之一在于内部的不协调。骑士们相互比勇，相互嫉妒，“神圣的事业”也不能阻止他们明争暗斗。

两个大封建主——律星云的归多和其竞争对手蒙斐拉的康拉德——在争夺耶路撒冷王位，尽管这个王位实际上是个空衔：“圣城”耶路撒冷早已落到了萨拉丁之手。被穆斯林俘虏的耶路撒冷王归多获得自由以后，不再苦苦设法将头上那顶摇摇欲坠的王冠拱手于他人，此时他又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要稳住王冠。因此他要求以君王的身份进入已被蒙斐拉的康拉德占领的泰尔城。但是，康拉德拒绝这位“合法的”君主进城。

两位封建主的争执，也把英法君王卷了进

来。英国狮心王理查支持自己的亲戚律星云的归多，而法王腓力二世则站在蒙斐拉的康拉德一边。明争暗斗的结果，自然而然地就削弱了十字军的战斗力。

但是，英王理查有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他在诸王当中处于领导地位。温斯顿·丘吉尔认为："在战斗中，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打死最强悍的敌人，……"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理查毕竟不完全是那种"只会争吵的无能之辈"。

狮心王理查力排众议，决定集中兵力，再次猛攻阿克。同时，理查也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取得成果，因此他与萨拉丁一直保持接触。为了保住阿克要塞，萨拉西主动提出释放基督教俘虏，交付一大笔赔款，并且交出他在耶路撒冷夺取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不过，耶稣此时已经去世达12个世纪，这个十字架是真是假无人能辨）。另外，萨拉丁还交出了两千名穆斯林作为保证和平的人质。

但是不久，萨拉丁不知何故却收回了自己许下的条件。气盛的理查一怒之下将两千名人质屠杀净尽。

1191年7月11日，十字军猛烈围攻阿克城，第二天便占领这座被围困两年之久的城池。理查王到阿克才五个星期，就完成了这一非凡的“宗教功业”，其“尚武精神”得到了十字军人的钦仰。

占领阿克城后不足一个月，法王腓力二世便称病从阿克撤到泰尔。1191年8月初，他从泰尔由意大利回到了法国，在背后给了狮心王理查以重重的一击……

正当理查在“圣地”与“异教徒”大战之时，他的法国“盟友”亨利二世却正忙于在国内巩固自己的势力。他要乘理查远离西欧之时，打击他在法国的羽翼。

在回国途中，1191年12月，腓力二世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与德皇亨利六世会谈，准备合力对付狮心王理查。这次密谈的后果极为深远，它注定了狮心王理查的悲惨岁月。英国编年史家哈夫顿·罗泽曾有记载：“法王取得罗马皇帝的诺言，答应英王自巴勒斯坦回国时如果路经帝国领土，就加以俘虏。”理查不曾料及这一“合谋”，后来果真踏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去寻找事先已为他准备好的囚笼……

腓力二世回到法国后不久，便侵入了英国金雀花王朝在法国的领地，并与在理查出征期间执掌英国政权的王弟约翰公爵（所谓的“无地王约翰”）缔结了密秘协定，共同反对狮心王理查。

法王回国时，并未把所有的队伍都带回法国，他把一部分骑士留在巴勒斯坦，归勃艮第公爵兼香槟伯爵指挥，以此来取得英王理查的“宽心”：法王仍愿意与英王合作，取得圣地事业的成功。

在政治上近乎天真单纯的狮心王理查不知前面有陷阱，后面有深渊。喜欢舞枪弄棒的他不曾细加考虑即将失去王冠的危险……

十字军在理查的指挥之下，在阿尔苏夫取得辉煌的胜利，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惨死在十字军的刀枪之下，埃及苏丹萨拉丁的元气大为受损。阿尔苏夫大捷成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西方骑士最值得自豪的一战，狮心王理查的名声也由此大振，西方骑士钦佩他，而东方的穆斯林“异教徒”则畏之如狮。如果孩童啼哭，做母亲的则会用这位英王的名子来加以恐吓：“不要哭，不要哭，理查王来了！”如果一个骑马人的

坐骑忽然受惊而奔弛，骑手也便会想到英王的名字，对马匹怒声喝问："难道你见到了理查王不成?"

狮心王理查成了"异教徒"心目中的恶魔。阿尔苏夫大捷之后，理查试图扩大自己的战果，他曾三次准备组织兵力进攻耶路撒冷，但萨拉丁迅速从上一次的创伤中振作起来，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理查王只能在山上遥望"圣城"而兴叹，然而，他又怆然掩目，不忍继续远眺那座自己无法进入的"圣城"。不能在"主陵"前显示自己的一腔"忠孝之心"，这是理查王此行的最大遗憾。

无可奈何之下，理查决定将军队撤回海边，把夺取沿海城市作为此后的主要目标。1192 年，十字军攻占了雅法和阿斯卡隆。但是，攻取这些地方，十字军们除了耗费大量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外，并无半点之得。当城池被困，处于危急之时，埃及苏丹萨拉丁便下令，将城市付之一炬，守城士兵则突围逃走。于是，十字军人所得的只是一片瓦砾废墟。

这时，英格兰传来惊人的消息：理查王之弟约翰公爵正在积聚力量，准备自立。

狮心王理查这才为自己在英、法的地位着急起来，开始感觉到非回国不可了。

1192年8月，理查与萨拉丁重开谈判。急于平息事端、准备回国处理危机的理查这次显得廉卑许多，为了取得萨拉丁的“信任”，理查甚至提出，把自己的胞妹乔安娜嫁给萨拉丁的弟弟，作为永久和平的保证。不过，这件美事未见下文，从巴勒斯坦脱身后的理查并没有心思去保证“圣地”的永久和平。

1192年9月2日，理查与萨拉丁签订《三年和平条约》（或称《三年停火条约》）。按照和约规定，原耶路撒冷王国的法兰克人保有从泰尔到雅法的狭窄地带，王国的首都迁至阿克，后来的历史文献中将之称为“第二耶路撒冷王国”。和约还规定，耶路撒冷仍归埃及统治，但萨拉丁又同意，朝圣者和商人在三年以内可以访问“圣地”。

一批十字军人到达了目的地——“圣地”耶路撒冷，不过，他们只是以游客的身份去的。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沿海地方如泰尔、西顿、雅法、托托萨等城，当然比离海很远的耶路撒冷重要得多，占领沿海地带对与东方的贸易

有着极大的好处。从这方面说，狮心王理查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仍然有些痛心，“圣城”耶路撒冷毕竟还在“异教徒”之手，它毕竟是“主的坟墓”所在地……

到1192年，两位封建主——律星云的归多和蒙斐拉的康拉德——争夺耶路撒冷的激烈斗争也自动停止，因为康拉德在其要求终于得到狮心王理查承认的时候，他却被“深山老人”领导的穆斯林教派的刺客杀死。律星云的归多对恢复自己的世袭权力失去了信心，而且日益狭小的所谓“第二耶路撒冷”也失去了往日的“神圣性”和吸引力。归多便从英王理查手中买下了塞浦路斯，定居在那里，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个王朝在骑士团的帮助下，存在了近四百年之久。

“一头狮子”价值十五万金马克，这相当于英国王室两年的收入。然而，德皇的巨额勒索居然获得了成功。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接近尾声之际，英国狮心王理查接到一批来自欧洲的消息：他的王位

和领地岌岌可危。

尽管“圣地”仍为穆斯林所把持，理查还是决定立即启程回国，英格兰以及他在法国的领地毕竟要比不着边际的“圣地”重要得多，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而牺牲自己的王冠，何其得不偿失！

1193年初，理查带领仆从，乘船向意大利方向进发，准备由此绕道返回英国。但是，当理查的船只航行至亚得里亚海时，海上常事降临到英王的头上。装载着主仆几十人的船只倾翻入海，理查等人成了“落汤鸡”。好在失事的船只离海岸不远，英王方得大难不死，满腹懊恼地爬上了凄凉的沙滩。

进入意大利以后，狮心王理查不敢直接西向进入法国，因为他对法王一直怀有戒心。实际上，法王腓力二世的确心怀不善，早已与理查之弟有着过密的交往。

理查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是比较保险的途径：乔装成商人，企图穿过德意志，从北方回到英国。

胆大的狮心王岂能料到，他正踏进一条深不可测的渊薮，可怕的灾祸就在眼前。他的敌

人、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尔德尾随其后，伺机要把这位当年羞辱自己的英国国王投进囚笼。

粗心的理查没有想到，当初的一场闹剧竟然将会成为一条绳索，把自己捆在德意志大地上。这场闹剧发生在十字军进攻阿克城之时。当阿克被克之后，奥地利公爵下令将德国旗帜悬上了城墙，与其他国家的旗帜一起飘扬在阿克城的上空。狮心王理查见此大为不快，认为小小的奥地利公爵哪有资格将旗帜插上城墙，与英王的旗帜一起招摇过市？理查随即下令，将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尔德的旗帜扯下撕碎，踏进稀泥之中。

利奥波尔德从未忘记这个耻辱。如今时机已到，当然决不放过。

当理查王以商人身份到达维也纳附近时，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尔德已跟踪至此。不久，理查王便被扒去商人服饰，成为奥地利公爵的俘虏。理查开始在公爵的一个城堡里过上了意想不到的苦行僧生活。

德皇亨利六世不允许这样一个价值连城的猎物留在公爵之手，他要求得到这个地中海世界的竞争对手。奥地利公爵奉命行事，将狮心王

理查解送到德皇宫廷。

好几个月过去了，但理查被监禁在何处仍是皇宫里的密秘。

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有这样一则奇妙的传说：对狮心王理查忠心耿耿的吟游诗人布朗德尔一心要找到国王的监禁地，他弹着国王最喜爱的和弦走遍了一座又一座城堡，结果终于如愿以偿，听到了理查回奏的琴声。吟游诗人的忠心确实可叹，不过，被监禁的理查是否还有自由弹琴回奏，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这只不过是一种浪漫的想象罢了。

一个令英格兰大部分臣民震惊的消息向西飞越过英吉利海峡：国王被囚禁在“德意志某地”。

这个消息传到理查之弟约翰之耳。不过，约翰并无半点沮丧的心情，反而大喜过望。他宣布，理查已经死去。接着，约翰全副武装，要求继承王位。

但是，封建时代的忠君观念阻止了约翰势力的发展，英格兰的许多人仍然保持着对理查的忠诚。教会支持理查，深受理查器重的来自法国鲁昂的大主教瓦尔特·德库斯坦立场则更为

坚定；年逾古稀的爱丽诺太后也坚决站在长子一边。这批人左右着最高权力机构——政务会，而政务会则控制着国家。

约翰的势力土崩瓦解。1193 年 4 月，从德意志传来确切的消息：理查仍然活着。约翰自知无理，而又无力挽回颓势，于是他尽量地掩饰自己的言行，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了法国。英国国内的形势得到了缓和。

德皇亨利六世不愿轻易地将理查放手，他要求英国拿出 15 万马克的巨额赎金，这相当于英国王室两年的收入。同时，亨利六世又提出缓冲条件：可以先在伦敦筹集好 10 万马克，赎理查释放，赎金的余额可以日后再付。情急之中的理查并未表示异议，忠于理查王的英国政务会也立即表示同意。

在英国全力赎救狮心王理查的时候，法王腓力二世和溜到法国的约翰等人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出价 8 万马克，要求德皇将理查关至 1194 年的迷迦勒节（9 月 29 日）；或者每关一个月，他们就付给德皇 1500 马克；或者以 15 万马克的代价把理查买到他们的手中。

但德皇亨利六世不愿改变自己的原定方

案，他觉得还是略讲信用为上策。

当法王腓力二世得知德皇不愿与理查毁约之后，便给约翰写了一封署名的短信："小心点——魔鬼快放出来了。"约翰怀着复杂的心情又回到了英格兰。

国务大臣、各位大主教和爱丽诺太后都在为筹措赎金而竭尽全力。全国各地开始征收兵役豁免税，所有俗人必须交出四分之一的动产。教会也同样要照章纳税，教士们献出了自己的金银餐具和其他财宝，还有三个修道院将全年所生产的羊毛全部捐献出来。普通百姓更是遭到了严重的压榨。但是，油水已干的英格兰和诺曼底仍未凑齐15万马克。于是，德皇亨利六世也就心足意满，决定放回理查。

1193年底，规定的第一批赎金交付德皇。1194年2月初，狮心王理查走出了囚禁他一年多的德意志城堡。在忠心不贰的吟游诗人布朗德尔以及英国派来的官员陪同下，小心翼翼地穿过欧洲大陆，避开他在法国的领地，渡过了英吉利海峡。

1194年3月16日，阔别故土数年的狮心王理查重新回到了伦敦。约翰再次公开叛乱，在法

国的援助下，占领城堡，招募军队。不过，约翰还是未能取得成功，只得再次又败逃法国。但后来，理查王还是原谅了这位长期背叛于他的王弟。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便是：理查“以兄长之爱拥抱他，并且恢复了他的部分领地”。

不久，理查王在伦敦再度登基，其加冕仪式比从前更加隆重。经过十字军东征的考验和一年多铁窗生涯的磨练，狮心王理查似乎变得更为果敢，更为独断。他要回到他在法国的那片领地上，去打击一直在谋算自己的法王腓力二世。

理查在法国取得了成功，很快就恢复了昔日的边界，腓力二世及其军队处于可怜的防御地位。但是，当后来的约翰继承王位时，理查的果实全都吞进了腓力二世的口中……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以后，德皇亨利六世继承其父的意愿，企图建立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他要把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北非、拜占庭等地完全囊括到自己的版图之中，其中拜占庭是他的第一目标。

亨利六世向拜占庭皇帝以撒二世提出条件，要求拜占庭将其领土的一半割让与德国，同时还要赔偿其父红胡子腓特烈的德国十字军所

受的损失。

这是明明白白的挑衅！

1195年，以撒二世在宫廷政变中被废，其弟阿历克塞三世统治了拜占庭帝国。亨利六世又展开婚姻外交，希望能够名正言顺地取得拜占庭的统治权。于是，亨利六世之弟士瓦本公爵腓力娶了以撒二世的女儿伊丽娜公主（她在西西里的巴勒摩被亨利六世所俘，被迫应婚）。

德国组成了新的十字军。正当十字军准备东进拜占庭之时，1197年9月末，亨利六世却在墨西拿告别了人世，走进了天庭……

但是，十字军东征并未就此罢休，不久，一次更大规模的东征又在欧洲组织起来。

第五章　没有月亮的拜占庭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来还没有从任何城市里获得这么多战利品。

——（法）哲夫利·得·维拉杜安《君士坦丁堡征服记》

大事记：

▲1202～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204～1261 年，拜占庭的“拉丁帝国”。

天空的云雾尚未散尽，一股更强的风暴又在滋生孕育，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大地未曾有几朝风和日丽。一次又一次的“圣战”牵动着“基督教子民”的心弦，打破了往日安守家园的生活规律。在海外的冒险，在东方的成功，在“圣地”的失利，这一切都给西欧人的历史增添

了既令人兴奋又凄凄惨惨的画面。

在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 年在位）的鼓动下，从 1202～1204 年，西方又组织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形式上，这次东征与前两次不同，各国君主退居幕后，不再亲自督阵，而是由各国大封建主领兵挂帅。

以往的十字军东征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旗帜，即打击“异教徒”，为保卫“圣地”而战。尽管这一宗教大旗时常落地失色，但是，参加“圣战”的十字军人毕竟见到了那些令他们“咬牙切齿”的“破坏主陵者——异教徒。”

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则路转峰回，参加东征的骑士们省却了几千里的长途跋涉，仅在欧洲本土就完成了东征的“使命”。

美国史家霍莱斯特曾有言：“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十字军，它始终没有到达圣地，但就其本身行动而言，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202 年，十字军出征时的“目标”是：解放“圣地”耶路撒冷，反对穆斯林埃及。但是，在随后的两年中，十字军人并未去“圣地”浴血奋战，而是转而攻取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尽管罗马教廷仍在用“圣战”作旗帜，号召基督徒服从上帝的安排，但是，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对弯月”的战争号角再也无法堂而皇之地吹奏。十字军的最终进攻目标是拜占庭，而拜占庭完全是一个“基督十字国家”，只不过不在罗马教皇的控制之下。穆斯林的“弯月”旗帜从来未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飘扬，拜占庭从未接受过“异教徒”的“月亮”。然而，没有“月亮”的拜占庭终究成为十字军刀俎下的鱼肉。

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封建主打着宗教旗帜前往海外，去“拯救基督教”，以使之免受“穆斯林的侮辱”。但是，他们最终侵略和掠夺的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圣战”的旗帜被他们自己撕得粉碎，抛进了污泥浊水之中。

十字军为何改弦更张？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这个问题一直成为历史学家们的热门话题，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试图给予圆满的解释。我们不妨简单地列举一些主要的观点：

“不由自主”说：十字军之所以将进攻的目标由埃及转向拜占庭，是迫于形势，不由自主。这是东征当事人的观点，其目的在于让后人感

觉到，十字军及其首领是无辜的。

“偶然凑合”说：十字军东征的结局是由于时势的偶然凑合，而十字军首领意大利的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是十字军人改变原来目标的“罪人”，因为他特别热衷于出征君士坦丁堡。

“腓力阴谋”说：一些编年史家把“十字军逸出正途”的责任归于德皇士瓦本的腓力。德皇早就图谋拜占庭的领土，把十字军引向君士坦丁堡是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宿愿。

“威尼斯人出卖”说：导致十字军转攻君士坦丁堡的，完全是阴险、奸诈的威尼斯人。据说在1202年，威尼斯人与“异教徒”埃及缔结协定：埃及苏丹给予威尼斯人金钱和贸易特权，而威尼斯人则迫使十字军转向君士坦丁堡。实际上，这种说法并无多少事实根据。

“挽救圣物”说：一些史家将十字军转向与西方十字军人尊敬“圣物”（神圣的宗教纪念物）联系起来。骑士们之所以浴血进攻拜占庭，是为了拯救在君士坦丁堡的那些“神圣遗物”，是为了完成久慕的“宗教功德”。

各种“理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这些观点中，或各执一端，或牵强附会，或妄测臆

想，或故意粉饰，它们都未能从总体和实质上把握住历史发展的真实渊源。

历史不是儿戏，亦不是少女，它容不得胡乱涂抹和任意妆扮……

教皇英诺森三世吹响的鼓动“圣战”的军号，比他的任何一位前辈都更为响亮有力，更为坚持不懈。

罗马教廷对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结果并不满意，于是在12世纪末，新的一次十字军东征又在酝酿之中。

1198年，时年仅37岁的罗塔略当选为罗马教皇，称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英诺森三世的出现，标志着教廷历史进入其极盛时期。正是在这位教皇的积极活动之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才带上了自己特有的色彩。

俄罗斯史家扎波罗夫对教皇英诺森三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位当时最年轻的红衣主教“是坐镇罗马的许多‘上帝代办’中极卓越的人物。这是一个全才的不屈不挠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特出的天赋的外交家。”

英诺森三世出身于罗马的名门世家康蒂家族，曾受过充分的高等教育，先后攻读于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对当时的宗教法有精湛的研究，谙熟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神权政体理论。

在当政末年，即1215年，英诺森三世召集了中世纪规模最大而且最有成果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其目的在于提高教会管理的效率。

为了实现天主教会的统一，他根据圣伯拿所广泛宣传过的“双剑”理论，充分施展了外交技巧和政治阴谋。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利用封建分裂时期各个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矛盾，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英诺森三世施展高超的外交手段，使不少君主一时成为教廷的封臣，必要时还使用开除教籍、停止神权等武器。例如，他反对英国“无地王”约翰征用英国教会的财产，巧妙地利用英国各阶层对英王的不满，宣布把他开除教籍；他还利用英法两国王室间的领土争夺而使法王腓力二世进攻约翰，从而迫使约翰屈服于教皇，对他称臣纳贡。他利用德国的王位之争，支持萨克森的奥托，在奥托即位后夺占教皇的领地时，他将奥托开除教籍。然后唆使法王腓力二世打败

奥托，于是教皇支持腓特烈二世成为德国的统治者（1211 年），使之甘做教皇的封臣。

诸如此类的“业绩”，在英诺森三世的身上还可挖掘不少。这位有着教皇身份的封建政治家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的全部活动都在于实现百余年来其前任教皇们一直孜孜以求的“世界国家”的计划。

罗马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中坚力量，而如今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最高首脑就是“势不可挡的”英诺森三世。这位精力充沛的教皇目光远大，他要让罗马教廷取得对整个东西方的统治权，将整个封建世界全部纳入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之中。当然，这里的“整个封建世界”只是中世纪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地中海四周以及时人所能了解的一些地区。

要实现这一“世界性”计划，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动十字军东征，英诺森三世早已就在盘算这一壮举。

出任教皇后没有几天，英诺森三世就立即发出号召：进行新的“圣战”，反对穆斯林“异教徒”，解放“圣地”耶路撒冷。

1198 年 9 月，教皇致谕英、法、德、意、匈

以及其他天主教国家，敦促“所有基督教的信徒”立即行动起来，把“圣地”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教皇向一切“上帝的臣民”发出命令，让他们在1199年3月之前准备好东征队伍。按照英诺森三世的打算，半年的准备时间已经足够，然后就是大军东进，扬威耀武……

英诺森三世发出十字军东征的号召以后，虽然心情异常激动，但他仍然保持着极为沉稳的神态，他知道，凡事都需要个“忍”字，忍然后发，方能更为有力。教皇此时的心境正如俄国史家库格勒所说：“由英诺森三世吹起的鼓吹圣战的军号，比他的任何一个前辈都更为有力，更为坚持不懈。”

要进行“圣战”，就必须有巨额的经费。英诺森三世下令：不论僧俗，都有义务为“圣战”而捐献出自己的财物。

为了给世人作出榜样，消除人们对教廷的疑虑，教皇本人“毅然”慷慨解囊，捐出自己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以充“圣战”费用，而且还私人出资、建造帆船一只，以帮助在东方受难的“基督教兄弟”，带头捐献，这正是英诺森三世的高明之处。

教皇首先从教会本身入手，让教会和修道院交出其财产和收入的四分之一，作为“圣战”经费。这一举措也显示了作为政治活动家的英诺森三世颇具心计。

教皇了解僧侣和修士们的心理，他们吝于钱财。于是，英诺森三世对他们严加斥责：“作为上帝的仆役，你们只会向俗人说教，让他们为圣战而牺牲钱财和生命。而对于你们自己对神圣事业所作的牺牲，却是空口白话，虚有其表！你们将基督教的财物浪费在游戏场中，将许多金钱挥霍在豢养猎犬猎鹰方面，俗人对此已经十分不满。作为上帝的代表，朕对于你们的行径也深感不安和耻辱。如今尚有一线赎罪的机会，尔等必须如数交纳捐税，为神圣的事业尽心效力，否则，末日审判之时的一切惩罚都将落到尔等的头上。对此，朕以上帝的名义作誓！”

对于向俗人征税募捐，英诺森三世用词则颇为谨慎：一切善良的天主教徒也应该量力而行，为“圣战”奉献出自己的热忱。为了收取“善良的天主教徒”的捐款，教会在各地设置了诸如“乐助箱”一类的收款器具。通过这种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捐款，天主教会获得了巨额财源。

但是，募捐来的钱财并未都用来充当组织十字军东征的费用。德国诗人华泰尔·洪·特·福特尔威特对英诺森三世借组织十字军而横征暴敛表示不满，他曾讽刺道：如果德国的银子落入意大利的钱箱，那么对“圣地”就没有多少好处，因为僧侣的手舍不得拿出大钱来。

除了发布诏谕和募捐钱款以外，英诺森三世还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以保证东征的计划能够早日并且是顺利地实施。

法国的局势比较动荡，法王腓力二世为领土问题正与英国狮心王理查进行肉搏。两国间的战事阻碍了英、法骑士参加到教皇所策划的东征事业中来。为了“神圣的事业”，英诺森三世派遣使节、红衣主教加普亚的彼得前往法国，试图调停两国的争端。

威尼斯的海上力量不可忽视。一旦十字军正式开始东征，威尼斯则是最为强大的“海上运输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为了保证未来十字军的顺利启航，英诺森三世派遣红衣主教斯蒂凡作为自己的全权使臣，常驻威尼斯，负责实施教皇的计划。

在英诺森三世的外交活动中，最为重要的

是与拜占庭皇帝交涉。很久以来，罗马教廷一直处心积虑想使拜占庭成为天主教世界的一个部分。英诺森三世也不例外，但他目前尚不能过于明目张胆，他有自己的谋算。

英诺森三世致谕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三世，提出二点要求：首先，拜占庭也要征集士兵，参加十字军东征，去解放"异教徒"手中的"圣地"。其次，向拜占庭皇帝提出教会复合问题，两者合而为一之后，希腊东正教会理所当然地要听从罗马天主教会。另外，教皇的谕旨中还隐含着威胁：如果君士坦丁堡方面拒绝教皇的要求，那么西方将有可能以一定的力量和适当的方式来对付拜占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组织十字军东征之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已经隐隐约约地显示出自己的意图：借西方的十字军东征来实现教廷的反拜占庭的计划。当然，这时候的计划可能还是一张草图。而且，即使目标已经非常明确，教皇也不必合盘托出，公之于众，理解其意图的人根本不用搬着其谕告行事。

可以说，罗马教廷与拜占庭的敌对关系，是导致第四次十字军改变进攻方向的最初原因，

如果没有天主教会实际上的默许，君士坦丁堡或许还可再逃一次劫难。

贵族们悲叹英国狮心王理查之死，畏惧法王腓力二世的暗算，遂加入十字军，借以逃出法王的统治，避免与他作战……

在法兰西的田地上，一位虔诚的“上帝子民”正从南到北，由东至西，施展自己的布施才能，劝说鼓动人们走上“主的征途”。这位就是法国纳宜教区的牧师福尔克。

罗马天主教会的号召总会引来众多忠心的走卒。英诺森三世发出十字军东征的诏谕以后，各地教会人士纷纷拥护，一则是屈服于教皇的炽势强权，再则是东征对自己不无益处，另外也是出于对上帝以及“上帝代办”——教皇的盲目崇拜。在普通教士心目中，威力无比的英诺森三世与万能的上帝没有什么差别，信仰教皇就是信仰上帝，爱教皇就是爱上帝。

在短短的时期内，由教皇口里吐出来的“圣战”空气立刻向欧洲大陆的上空弥漫开去，以“神圣事业”为己任的教士们到外说教，竭力以

天上幸福和人间希望的"美景"来引诱人们参加教皇所策划的事业。

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的隐修士彼得一样，法国纳宜教区的牧师福尔克也在运用上帝赋予的智慧，为"神圣的事业"奔走呼号。

如果将狡猾、智慧和虔诚掺合在一起，其发出的综合力量将是惊人的。牧师福尔克正具备这种特殊的才干，他通过募捐，手中积聚了一定的钱财，同时，他还略为懂得一些医学知识。

在布施说道之余，福尔克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含蓼问疾，对穷苦无靠的基督徒慨然相助。把手中的钱财"慈爱"地奉送给"上帝的臣民"。遇有患病的信徒，福尔克则从容地取出早已备好的药箱为病人诊断治疗。

当时有位颇具洞察力的编年史家说："这位圣徒知道谁最需要钱财，也知道什么时候慷慨施舍效果最好；这位圣徒更知道谁的病可治，而且知道在什么时候去治可以治好。"

福尔克的乐善好施和激越的言词感动了一批下层民众，一些人甚至立即宣誓，参加十字军，解放"圣地"。但是，下层民众的热情持续时间不长，回家静思以后觉得"圣地"不是他们

这等人去的。他们有着前车之鉴，积极参加最初两次十字军东征的农民几乎全部惨死在海外，根本没有得到什么“上帝的荣耀”。到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夕，拯救“圣地”的号召显然已经打动不了多少农民的心。当然，也还有一些农民真的踏上了“主的征途”，但为数毕竟很少。

福尔克等人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劝说封建主方面。同十年前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一样，响应天主教“圣战”号召的主要是封建主，尤其是法国封建主。

经过福尔克的精心组织和筹划，1199 年 11 月末，法国的骑士、领主们在香槟的埃里克城堡进行比武大赛。在为时几天的赛程中，福尔克不失时机地数次发表动人心扉的说教，号召封建主们听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谕诏，义无反顾地为“神圣的事业”奉献出自己的诚意诚心。

在埃里克城堡举行的骑士比武，成了法国十字军集合的开始。比武结束后，许多领主和骑士都在牧师面前庄严立誓：参加十字军，拯救“圣地”。

法国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也宣誓走上“主的征途”，其中主要人物有：腓力二世之侄、香槟

伯爵西奥包尔德（提善）；香槟伯爵的女婿、弗兰德尔和黑诺伯爵鲍尔温；布尔瓦的路易；休格·得·圣波尔；西蒙·得·蒙福尔；等等。

这些大封建主之所以宣誓参加十字军东征，完全是出于对“上帝事业”的热爱吗？不是！他们之所以信誓旦旦地准备踏上征途，尚有其他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不久前的英法战争中，上述的大封建主大都反对自己的国王，而站在英国狮心王理查一方，与英国军队联手对付腓力二世。

1199 年 1 月，教皇英诺森三世派到法国的使节、红衣主教加普亚的彼得经过斡旋，调停取得成功，英法之间暂时取得和解，1199 年 5 月，英王理查在进攻一个背叛于己的陪臣时阵亡。

英法之间的和平使得原先站在英王一边的法国封建主深感不安，深有谋略的法王腓力二世哪能善罢甘休？狮心王理查的死亡更加剧了他们的惊恐，可以依赖的“靠山”崩塌了！

法王的报复似乎就在眼前，他们在法国的领地难以保全……

教皇发出十字军东征的号召以后，法国的这些大封建主立即作出决断：为了保全自己的

领地不至被腓力二世没收，听从教皇的号召，参加十字军。因为他们知道，在出征期间，十字军人的财产受天主教会的保护，而法王腓力二世的力量至少在目前还不能与教皇相抗衡，他还不敢轻易得罪“伟大的”英诺森三世。

黑诺的编年史作者也清楚地看出，是宗教以外的原因驱使着法国大封建主走上“主的征途”的：“弗兰德尔和黑诺伯爵鲍尔温，悲叹英王理查之死，畏惧法王腓力二世的暗算，遂与许多贵族一起加入十字军，借以逃出法王的统治，避免与他作战。”

接着，法国十字军首领开始解决海运问题。刚刚被推选为十字军领袖的香槟伯爵提苔在康边与领主们商讨出征事宜，磋商的结论是，“在威尼斯比在其他任何港口可望找到更多的船只。”

六名使者随即上马启程，1201 年 2 月，他们到达了威尼斯。威尼斯总督恩利克·丹多洛(1192～1205 年在位）礼貌地接待了他们。

使者们走进富丽堂皇的宫殿，在一个大厅里见到了总督和他的议事会成员，他们对总督说：“元首，我们是法国高贵的男爵们派来拜见

您的，他们接受了十字标志，以报侮辱耶稣基督之仇，如果上帝允许，就夺回耶路撒冷。我们请求您，为了上帝，对海外地方和耶稣基督遭受侮辱予以同情，并请赐予援助，使他们能够获得用来运输和作战的船只。”

总督问：“如何援助？”

使者回答：“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切唯命是听。”

总督说：“当然，你们所提的事情的确很重要，看来你们所计划的是件崇高的事业，过八天之后我将答复你们……”

威尼斯的商人寡头发觉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借此打击它的商业劲敌。

总督要价甚高：8. 5万银马克，平分掠得的土地和战利品。

十字军使者们彻夜商谈，最终决定接受所提的条件。

谈判近两个月之后，即1201年4月初，十字十军使者与威尼斯总督签订了协定，协定中写明了威尼斯对供应十字军船只所要求的各项条件。

不久以后，法国十字军就要踏上威尼斯人

的“贼船”……

又一群蛇蝎在抖身摇尾，毒腺四处喷射。贪财的威尼斯人抛出第二条绳索，将十字军的脚步拉向君士坦丁堡。

法国十字军的请求，威尼斯人满口应承。双方协定签署后，十字军使者满意而去，威尼斯总督更是满心欢喜。协定里的条件后来成为十字军受制于威尼斯的一个绳套，威尼斯人用这个绳套牵着十字军人，将之拴到了君士坦丁堡的脖子上。而且十字军与之也是一种愿打愿挨的关系，对威尼斯的威逼只是半推半就，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船头转向同是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了。

可以说，罗马教廷的旧日意图是使十字军改变方向的最初的、潜在的原因，而威尼斯人的参与则是第二个原因。

威尼斯之所以担有这一“千古罪名”，其根源在于威尼斯与北部意大利城市比萨、热那亚以及与拜占庭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对立，而经济对立的根源则在于它们在东部地中海地区

的贸易发生利益冲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威尼斯在东方贸易上处于执牛耳之势，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力量，威尼斯商人在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取得了广泛的商业特权。进入12世纪以后，威尼斯人在拜占庭的港口城市广泛设立营业所，享有免税特权，可以自由买卖、进出货物，不受海关检查，并可以永久定居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帝国力量衰微，被迫对威尼斯作出种种让步。帝国得罪不起威尼斯人，因为自己有求于人。在拜占庭的请求下，威尼斯舰队几次出击，将君士坦丁堡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但是，威尼斯人自恃劳苦功高，在拜占庭领土上，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堡等地骄横放肆，目无拜占庭之法纪，扰乱了帝国的正常生活秩序。拜占庭虽是弱者，但是它也忍受不了威尼斯人的作威放纵，在适当的时候，帝国也要振作一番，以示自己尚有还手之力。

威尼斯人的商业极为繁盛，阻碍了拜占庭商业的发展。应帝国商界的要求，1171年3月，皇帝曼纽伊尔·科姆尼那斯下令，逮捕了帝国境内的威尼斯商人和侨民，将其财产悉数没收。

两国间的贸易就此中断。直到80年代初，威尼斯人才再度与拜占庭恢复“商业”关系。迫于自身力量的不足，拜占庭皇帝一再表示愿意赔偿当年威尼斯人的损失，但威尼斯方面一直没有收到赔款。

拜占庭有时还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限制威尼斯人势力的膨胀，这就是向威尼斯的商业竞争者比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开放拜占庭市场，以挑起它们之间的冲突。拜占庭的这一手段颇为厉害，意大利城市之间对商路和拜占庭市场的斗争日趋激烈。当时有这样的记载：“在君士坦丁堡，或在海洋上，时时可以看到两个共和国（威尼斯和比萨）的公民拼命死战，双方时有胜败，结果是抢劫敌手，或遭敌手抢劫。”

拜占庭对比萨、热那亚的“偏爱”自然激起威尼斯的仇恨。在十字军东征前夕，威尼斯与拜占庭的关系又趋紧张，皇帝阿历克塞三世破坏了自己在1198年与威尼斯方面签订的“友好协定”。拜占庭开始向威尼斯商人征收关税，停付“1171年事件”的赔款，并先后再次给予比萨和热那亚以贸易特权。

威尼斯对拜占庭的敌意已经日甚一日。教

皇十字军东征的号召和法国十字军的请求，给威尼斯提供了一个抒发心中愤懑的大好时机。它可以利用十字军，狠狠地教训一下自己的商业竞争对手，从而保证自己在东部地中海上的贸易霸主地位；如果条件成熟的话，还可借十字军的力量严厉打击不服自己支配的拜占庭帝国，将拜占庭的市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此时十字军的进攻方向尚未正式转就，威尼斯的计划可能还在酝酿形成之中。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原定目标是“异教徒”的埃及。但是，征服埃及却不符合威尼斯的商业利益。

“1171 年事件”以后，威尼斯失去了拜占庭的市场，但它与穆斯林埃及的贸易关系却日益发展。即使在 80 年代初威尼斯恢复了与拜占庭的商贸往来后，它与埃及的经济关系也未中止，而且还在继继发展。威尼斯人并不把“宗教利益”看得很重，它的第一目的是盈利赚钱，因此这个以商业为本的共和国精神百倍地从十字军和穆斯林两个方面捞取厚利。一方面，它给十字军提供高价服务：运送朝圣者到叙利亚、载送西方援兵和粮食到东方十字军国家。另一方面，威

尼斯将武器售与“异教徒”的埃及苏丹。这是颇为有趣的一幕，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人着实就是一群“纵火犯”，然而，攫金不见人的威尼斯人并不以此为耻。

1198年底，教皇英诺森三世下令，禁止威尼斯人出售武器给穆斯林“异教徒”。但令行而禁不止，教皇的“圣谕”在威尼斯人的眼中也只不过是一张可供赏玩的图片。

前文已经述过威尼斯总督与法国十字军使者所定的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威尼斯提供船只，运载4500匹马、9000名骑士侍从、4500名骑士和2万名步兵；供应一切人马9个月的粮食；按每匹马4马克、每个人2马克计算，十字军共需支付8.5万银马克，分四次付清，最后一次付款期在1202年4月底。

威尼斯方面提出的条件似乎不为过分。但协定中模糊不清的措词却给后来威尼斯人提供了新的要挟条件。

协定中并未明确规定将十字军运送至何处，只是笼统地说是“前往海外”；十字军出征的对象，也只是含糊其词地称“敌人”，根本未提“异教徒”之事，“敌人”到底指的是谁，威

尼斯的想法或许与十字军不一样。

协定上留出的这些“空子”，是否是聪明的威尼斯总督故意使然，我们不得而知。但威尼斯人后来明明白白地钻了这些空子，这却是事实。

教皇英诺森三世不是愚笨之人，他完全可以看透威尼斯总督丹多洛的计划，总督是要利用十字军“为威尼斯的利益而侵略”。但教皇仍然是“非常乐意地”在1201年5月8日批准了十字军与威尼斯的协定。

当然，在致十字军的书信中，英诺森三世提出了“勿以武力侵犯基督教徒”的要求。不过，这种“要求”是教皇的惯用言词，不可过分当真，而且教皇也可借此表示，即使日后出现什么“乱子”，他当初批准这个协定也属无辜。

拜占庭发生宫廷政变，血溅龙袍。德意志皇帝“义肝侠胆”，拔刀相助，要为岳父大人“报仇雪耻”……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所以转向，也是当时多种复杂的政治关系相结合的结果，这是一种综合力量的迸发。如果仅靠教皇，或仅靠威尼

斯，那么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也不见得会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12世纪末13世纪初，地中海世界的矛盾与冲突相当严峻，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之间的对立。两者对立的缘由在于德国封建主力图在地中海地区扩充自己的实力。

1186年，德国皇储亨利与西西里公主康斯坦西亚结婚，获得西西里王位继承权。红胡子腓特烈淹死以后，皇储加冕称亨利六世。1194年，亨利六世进占西西里，取得西西里王位。随后严厉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西西里终于成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宿愿得以了结。

作为西西里国王的亨利六世，继承了西西里诺曼统治者的衣钵，开始把目光投向拜占庭帝国的巴尔干地区。德意志军队即将远征拜占庭，但亨利六世的突然亡故（1197年9月）使德国暂时放弃了进攻计划。

亨利六世之弟，士瓦本的腓力登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称腓力二世（1197～1208年在位）。新任德皇念念不忘拜占庭的土地，坚定

不移地继承其兄长的反拜占庭政策。不过，德皇腓力二世对拜占庭的领土要求比较“名正言顺”，他的妻子伊丽娜原本是拜占庭皇帝以撒二世的女儿。

12世纪末，拜占庭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给德皇腓力实现其理想创造了极好的借口。

1195年，君士坦丁堡发生宫廷政变，血溅龙袍。阿历克塞推翻了兄长以撒二世，自立为帝，称阿历克塞三世（1195～1203年）。阿历克塞三世残忍地剜去以撒二世的双目，然后将之投诸牢狱，永受苦难。

宫廷斗争的残酷，让人触目惊心。阿历克塞三世的毒心辣手成为“一次空前最大的奇闻和最惊人的异事”。

岳父大人在狱中受苦，妻子伊丽娜整日哭诉，这给德皇腓力既增加了烦恼，也带来了希望，“世界帝国”的蓝图又在他的脑际展现开来……

德皇开始与在狱中煎熬的岳父密秘联系，商量如何报仇雪耻，如何推翻阿历克塞三世，拥有“义肝侠胆”的德皇腓力二世果真要拔刀相助了，他要帮助已经双目失明的以撒二世恢复“合

法”政府。

德皇正在考虑采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援救”岳父大人的目的，目前他还没有想到可以利用即将东征的十字军。偶然的事情却提醒了他。

正当十字东征军紧张准备之时，1201 年 5 月 24 日，最初被推选为法国十字军领袖的香槟伯爵提善突然去世。十字军将由谁来统领?

老谋深算的德皇立即感觉出，解决拜占庭问题的办法就在于利用十字军东征。原来对“圣战”冷眼旁观的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如今迫不及待地挤了进来。

德皇要通过密秘外交途径，使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北部意大利的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当选为新的十字军首领。

之所以推蓬尼腓斯为候选人，德皇不只是看他的军事和外交才能，而是更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蒙斐拉侯爵家族与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蓬尼腓斯之父威廉三世，在生前是红胡子腓特烈在北部意大利的同盟者，对腓特烈可以算是鼎力相助，德皇为表示感谢，便酬以大片封地。

蓬尼腓斯的兄长们与十字军以及拜占庭帝国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长剑威廉娶耶路撒冷国王鲍尔温四世之妹为妻，是雅法和阿斯卡隆伯爵；蒙斐拉的康拉德在以撒二世的宫廷中显赫一时，娶拜占庭皇帝之妹菲奥陶拉为妻；雷尼埃在1179年与拜占庭皇帝曼纽伊尔的女儿玛丽·科姆尼娜结婚，帖撒罗尼迦是她的嫁妆。

蓬尼腓斯最感兴趣的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帖撒罗尼迦，它是拜占庭的重要贸易中心之一，城市规模仅次于首都君士坦丁堡。不知出于何种逻辑，蓬尼腓斯自以为是嫂子玛丽·科姆尼娜的"合法"继承人，一心想到帖撒罗尼迦。

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德皇腓力二世的用心所在了。

德皇有信心把蓬尼腓斯推上十字军首领的职位，因为当时他与法王腓力二世之间有着同盟关系。两位腓力二世之间的同盟建立于1198年，其共同的目标有二：一是反对英国的金雀花王朝；二是反对德国大封建主威尔夫家族，因为亨利六世死后，威尔夫家族不愿保举腓力二世为德皇，而企图拥狮子亨利之侄鄂图为新的皇帝。法国反对金雀花王朝，希望得到德国方面的

支持；而德国反对威尔夫家族，则希望得到法国方面的援助。而且，金雀花王朝与威尔夫家族的结盟，也迫使德皇与法王联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既然德皇提出人选，法王也就无意去与他作对。

香槟伯爵提菩死后，十字军中的大封建主们在夏逊集会，准备选举新的首领。

因为有德皇的旨意，本来对十字军事务并不十分关心的法王腓力二世忽然热心起来，多次派遣使者参与其事。为了迎合德皇，法王开始对十字军首领们施加压力，劝告他们推选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为十字军的新领袖。

法王的“劝告”使十字军首领们陷入了维谷之境。蓬尼腓斯是法王腓力二世的亲戚和心腹；而十字军首领们则大多是法王的政敌，不久以前曾与英国狮心王理查结盟，反对法王，而且在霍亨斯陶芬与威尔夫两个家族的冲突中，他们又是竭力支持金雀花——威尔夫同盟。因此，要他们接受蓬尼腓斯为十字军领袖，实在是不合口味。但是，如果拒绝法王的“劝告”，恐怕更不会有好的结果。英王理查一死，他们便失去了

靠山，于是对法王也只能捏着鼻子款款相待了。

法王腓力的“劝告”终于获得成功，十字军首领们“一致”选举蓬尼腓斯为十字军最高指挥。德皇腓力二世闻讯，喜不自胜，竟在众多廷臣面前手舞足蹈起来。

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也是欣喜若狂，没想到竟能跨出国界，去法国统领十字军。他更没有想到，几年来一直在渴望中的“拜占庭之行”不久就要转化为现实。他很想去“欣赏”一下他嫂子的嫁妆——帖撒罗尼迦……

1201 年 9 月，蓬尼腓斯率领扈从到达法国，不久便走马上任，成为十字军的最高统领。

法王之所以全力推举蓬尼腓斯为十字军统领，除了出于维护法德同盟之外，也含有其他的政治动机，即打算借十字军东征为法国王室捞取直接利益。

数十年来，法国王室尽管力单势薄，但仍一厢情愿地作一些漫无边际的辉煌的想象。卡佩王朝的诸王们实力不济，雄心却不小。路易七世当年就曾苦想：要是能在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称帝，那肯定是件美事。但他自知无力，未敢轻易下手。1180 年，腓力二世的姐姐嫁与拜占庭皇

帝阿历克塞之子，其目的也是想从拜占庭得到一些好处，当然，最好能够得到拜占庭帝位的继承权。

关于法王腓力二世本人对拜占庭的态度，有这么一则轶事：英国狮心王理查命丧沙场后，有一位名叫马加利东的西西里诺曼海盗首领来到巴黎，晋见法王腓力二世，表示愿为法王成为“君士坦丁堡皇帝”而效力。法王接受了马加利东的善意，并答应为他筹办武器、粮食和马匹，以供出征君士坦丁堡之用。但后来马加利东突然被人暗杀，东征计划化成了泡影。

既然是“轶事”，就不一定完全确凿可信。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时人关于法王对拜占庭关系的评价：法王并非木人，君士坦丁堡的富庶也使他春心萌动……

德皇颁布诏书：“只要万能的上帝将希腊帝国赐予朕或朕的妻舅，朕将信守诺言，使希腊正教会从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德皇自己道明了支持十字军东征的目的。

拜占庭皇帝以撒二世被其弟送进监狱以

后，他的一家全都成为国家的要犯，皇太子阿历克塞也成了新任皇帝的阶下囚。

宫廷的斗争最为残酷无情，没有父子之义，更无手足之情，同出一源的皇族内部时常摆开你死我活的阵势，胜者为皇，败者为敌，哪论你是父母、兄弟还是姐妹？

在宫廷长大的皇太子阿历克塞虽无多少政治斗争的经验，但他已经耳濡目染了一次又一次的宫廷争斗，是那样的惊心动魄，不择手段！如今他的叔父竟然也走上了这条不义之路，将父皇拉下了帝位。不但如此，还残忍地剜去了父亲的双眼。

久而久之，阿历克塞也就看惯了宫廷中的险象。随父亲一同入狱的皇太子决心逃出叔父的魔掌，到西方求援。

在一位比萨船主的帮助下，阿历克塞终于逃出了君士坦丁堡的监狱，上了船主的船只，准备前往德意志，因为德皇腓力二世是他的姐夫。

皇太子阿历克塞刚刚越狱，风声就已走漏。皇帝立即派出人马，要将阿历克塞捉拿归案。搜查人员来到了比萨船主的那只船上，情形显然十分危急，但阿历克塞却神奇地躲过去了。据史

书记载“奉命搜查的人认不出阿历克塞：他已经剪短头发，改穿拉丁服装，夹杂在人群中躲过搜查者的眼睛。”

历经种种风险之后，阿历克塞见到了德皇腓力二世——他的姐夫。德皇老于心计，对阿历克塞说：“要解决这件事，就必须把教皇请出来……”

1202年春，受了德皇机宜的阿历克塞出现于罗马教廷，教皇英诺森三世密秘接待了他。

在教皇面前，阿历克塞显得卑躬屈膝。只要能达到目的，舍点面子也无伤大雅。这是德皇腓力二世的主意。

阿历克塞对教皇说：“仁慈的陛下，请您相信我的一切话语。父皇正在狱中受尽劫难，篡位者阿历克塞三世正在破坏国家的纲纪。僭越皇位的是我的叔父，尽管他曾经是我的亲人，但如今他已成了杀人的魔王，成了万恶不赦的凶手。仁慈的陛下，请施舍出您的聪明才智，哪怕是一点点！陛下威力无穷，神法无边，对付一个篡位者阿历克塞三世，当是易如反手之事！……”

听惯了奉承之言的英诺森三世并未被皇太子的言词所“感动”，他故意保持沉默。

阿历克塞明白教皇的心思：他是在索取条件。于是阿历克塞提出，如果教皇愿意给予援助，拜占庭方面决心以涌泉相报：东西方教会实现“复合”，东方正教从属于罗马天主教会；拜占庭组建队伍，参加教皇发起的十字军东征。

英诺森三世这才点头应允，表示愿意为拜占庭恢复秩序。

闻听“喜讯”的德皇腓力二世异常兴奋，眼前再次浮现出“世界帝国”的构想。他立即颁发了一份特别诏书，诏书指出：“只要万能的上帝将希腊帝国赐予朕或朕的妻舅，朕将信守诺言，使希腊正教会从属于罗马天主教会。”

如何才能使“万能的上帝将希腊帝国”赐予德皇？看来只有依靠十字军的力量了。

教皇、德皇和威尼斯人各有鬼胎，但却有着共同的目的地，难怪即将启程的十字军要“逸出正途”了。

“上帝的勇士们”被抛在了荒岛之上，年已90的威尼斯总督声称：“如不付清欠款，就休想离开此岛，休想得到饮食……”

1202年，一阵热风吹拂了亚得里亚海西北岸的威尼斯时令已经指向了夏季。

按照协议，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十字军即将抵达威尼斯，由此乘船出征数千里之遥的穆斯林埃及。

威尼斯总督丹多洛是位“明智而且勇敢的”九旬老人，他要让即将到来的十字军人明白，他们依靠的是“威尼斯人民”，那么就要俯首驯服地听任“威尼斯人民”调遣。

1202年夏，德、法、意的十字军在威尼斯集合。威尼斯总督立即下令，将十字军送到威尼斯附近人烟稀少的利多岛上。威尼斯人将十字军关了禁闭。

将十字军关在荒无人烟的利多岛上，对威尼斯来说的确“利益颇多”，它可迫使十字军人俯首听命。而对十字军来说，利多岛完全成了人

间地狱，一座死亡之岛。

十字军立即陷入了困难的境地。威尼斯并未按当初许诺的条件按时供应十字军的粮秣，而十字军人随身携带的食物又极为有限，于是“上帝的勇士们”开始在利多岛上过起了艰苦的“斋戒”生活。忍饥挨饿的结果便是疫病的流行，一些体弱穷困的基督战士过早地被死神夺去了性命。有人曾经形容道：“死亡之人之多以至于连埋葬死人的活人都不够了。”当然这是夸张之语，不过，十字军人此时的处境的确相当窘迫，一些“想不开的”十字军人干脆偷偷地逃出利多岛，返回家园。

按照一年前的协定，至1202年4月底，十字军人必须交齐8.5万银马克的款项。然而期限已到，十字军却只凑齐了5.1万，尚有3.4万银马克无处着落。也有学者认为，十字军人所欠更多，“只凑上不到规定款项的五分之二”。

十字军人无力交付这笔巨款。原因何在？因为到达威尼斯的人数只有一年前法国十字军使者所估计的一半左右。根据罗伯·得·克拉利的记载，骑士只有1000人，而不是当初设想的4500人；步兵原定10万，而到者仅有5万（数

字显然是夸大的）。很多不太宽裕的小领主和骑士认为威尼斯人索价太高，因而改走别的道路。他们准备从布鲁日、马赛和伦巴底出发，向埃及进军。

威尼斯并不按照十字军的实到人数收取运费，而是坚持1201年4月的“协定”，要求十字军交纳8．5万马克。十字军当然掏不出这笔钱了。

既然十字军“拒不付款”，那就休怪贪财的威尼斯人无情了。

威尼斯人决定停止运送粮食到利多岛上，要让十字军人体验一下苦行的滋味；同时威胁十字军骑士，如果不按约付清款项，威尼斯将不提供船只。

年已九旬的威尼斯总督丹多洛亲自来到利多岛，对十字军人恐言相加：“如果不付清欠款，就休想离开此岛，休想得到饮食……”

十字军人只能翻着困乏的双眼，无言以对，他们对丹多洛的勒索实在是无可奈何，谁让使者们当初糊里糊涂地签署了那个让他们自投罗网的协定呢？

1202年秋，十字军的最高指挥蒙斐拉侯爵

蓬尼腓斯闻讯来到了威尼斯，并与丹多洛进行了密秘会谈。

“绝不是出于理想的动机”而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蓬尼腓斯当然要迎合威尼斯总督的心思，他向总督委婉地透露：如果条件许可，是不是可以让十字军顺便“拜访”一下君士坦丁堡？

蓬尼腓斯的想法正合丹多洛的心意。但是要让十字军立刻改变自己的进攻方向，恐怕还有困难，下层十字军人可能会起而反对，另外，教皇英诺森三世也会出于“面子”上的考虑而龙颜大怒。因此，丹多洛决定，可以利用负债的十字军骑士来满足威尼斯人的眼前利益。

在征得威尼斯共和国最高机关的同意后，丹多洛向蓬尼腓斯提出如下建议：十字军人如果想了结或延期偿付债务，那么就应该帮助威尼斯征服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扎拉城。

扎拉当时属于匈牙利王国，其居民也信奉天主教。扎拉的商业贸易发展迅速，日益成为威尼斯的竞争对手，大大妨碍了威尼斯人在亚得里亚海的商业利益。因此，踏平扎拉是威尼斯商业寡头的最大心愿。

蓬尼腓斯接受了丹多洛的建议。用英国史

家S·任锡曼的话来说，蓬尼腓斯“并不是一位太有良心的基督徒”。在这位侯爵看来，把十字军暂时借给威尼斯使用一下亦无大妨，与什么“解放圣陵”之事并无抵触，因为十字军最终是否真的开向“圣地”，侯爵心中已经有谱。

蓬尼腓斯向十字军骑士和步兵们宣布了帮助威尼斯人夺取扎拉的计划后，起初是一阵哗然，他们不相信领袖的话是真的。十字军竟然要去攻打一个天主教城市！有些士兵，特别是下层士兵，便离开了十字军，返回了各自的家乡。

但就大部分而言，十字军人是一群亡命之徒，掠夺抢劫是他们的职业，至于抢的是什么地方，抢的是什么人，他们可以全然不顾。“圣战”、“解放主陵”、打击“异教徒”，这只是挂在嘴上用以掩人耳目的幌子，只要有利可图，哪管它是真主还是上帝，一并接受骑士刀剑的宰割。况且，现在的十字军又负债于威尼斯，不出点血看样是无法脱身了。

1202年10月，由220余艘船只组成的十字军舰队从威尼斯出发，向东南方的扎拉驶去。

在这220余艘船中，70余艘用来载人，其余的150多艘则用来装载粮食、攻城器械和其

他武器。

精力旺盛的九旬老人、威尼斯总督丹多洛也“加入”了十字军，暂时成了这支“雇佣军”的最高首领。

11 月 11 日，十字军攻进了扎拉港。

十字军又开始猛烈地攻城，经过五天激战，驻扎在扎拉城里的匈牙利军队完成溃败。11 月 24 日，十字军占领了扎拉城。骑士和威尼斯人在城内大肆屠杀，焚毁建筑、抢掠财物，就连城里的天主教会也未能幸免于难。

借着十字“雇佣军”的力量，扎拉终于成了威尼斯的海外领地。

十字军进攻并破坏基督教城市扎拉的消息传到了罗马教廷。教皇英诺森三世闻讯大怒，写信把十字军痛骂了一顿。教皇在信中指出，对于十字军任意挥洒“兄弟之血”并违背他的“勿侵犯基督教土地”的禁令，他表示“无限哀痛”。

以夏逊主教尼维隆为首的十字军代表团来到了罗马，向英诺森三世解释缘由，并保证：此后十字军人将坚决进军“圣地”，决不“逸出正途”。本想将十字军逐出教会的英诺森三世相信了尼维隆的保证，因而也就宽恕了十字军人的

“罪愆”。

威尼斯人的“罪愆”却不可饶恕。教皇断然决定：将威尼斯人革出教会。

威尼斯人成了没有教徒身份的“黑户”，十字军人不敢再乘坐他们的船了。

为了避免误会，教皇英诺森三世立即通谕声明：威尼斯人固然已被革出教会，但这并不妨碍十字军利用他们的船只，也并不妨碍与他们继续往来。

在致十字军的信中，教皇诚恳地说：“为了达到最高目的，还得请上帝的勇士们多多忍受！”

教皇心里明白，该忍的就得忍，小不忍则乱大谋……

“圣地”终于被抛到九霄云外，十字军开始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同是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在劫难逃。

当十字军舰队猛攻基督教城市扎拉之时，最高统率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正留守威尼斯，在后方“观敌料阵”。

十字军大获全胜。两周以后，即1202年12月初，蓬尼腓斯"庄严"地从威尼斯来到了扎拉，以与民同乐的姿态准备与十字军将士在此度过漫长的冬季。

1203年初，德皇腓力二世的使臣和拜占庭皇太子阿历克塞的全权代表也由德国来到了扎拉，他们要请求十字军和威尼斯人给予"正义"的援助。

使者们来到了威尼斯公爵丹多洛的一座临时宫殿中，蓬尼腓斯等十字军首领应公爵之邀也来此与使者们会面。

使者们说："诸位阁下，我们是受国王腓力和他的妻弟之托来拜见你们的，国王特地让我们带来一封他的亲笔书信，要我们面呈十字军的最高统领。"

蓬尼腓斯接过书信，自己先匆匆浏览一遍之后，向在场的贵族们公布了信的内容。

德皇的亲笔信是这样写的：

"诸位阁下：

朕将派朕的妻舅到贵处，如今使者先行。朕要把妻舅交给上帝（愿上帝保佑他不死）和你们。因为你们是为了上帝、真理、正义而从事远

征的，所以你们应尽力替那些遭受非法抢夺的人恢复他们的所有。朕的妻舅要和你们达成从未给过任何人的最优惠条件，要给你们最有力的帮助以夺回海外的土地。首先，如果上帝愿意你们恢复他的所有，他将使全部拜占庭帝国服从久已脱离的罗马。其次，他知道你们已耗费了自己的财产，你们正在缺钱；他愿供给二十万银马克和全体军人（贵族和平民）的粮食。他要亲身和你们前往埃及；如果你们认为派兵更好，他就自己负担军费，派一万人到那里去。他要为你们执行这个任务一年；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将永远自己负担费用，供养五百名骑士在海外保卫土地。

愿在上帝的勖勉下，诸位阁下能够取得从未有过的辉煌成就。不幸的皇太子（朕的妻舅）和他的父亲需要你们的同情，更需要你们的支持。为了尊重并维护拜占庭久已形成的法统，诚望你们作出最为可贵的努力！

腓力

公元1202年12月”

使者们继续说道：“诸位阁下，如果你们愿意订立协定，我们有全权签署。诸位要知道，除

了皇太子阿历克塞以外，从来还未有任何人提出过如此有利的协定，拒绝他的人将永远不可能指望得到光荣和胜利。”

蓬尼腓斯等人没有当场作出答复，他们决定在第二天召开军人大会，以“征求”骑士们的意见。不过，此时的蓬尼腓斯等首领们已经自有主张了。

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十字军首领向骑士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会场立即议论纷纷。

有些骑士表示反对进攻君士坦丁堡：“我们不是为反对基督徒而前来参战的，我们的目的地是叙利亚，是被异教徒凌辱的圣地。”这是一少部分下层骑士的心态，其宗教热忱尚未泯灭。

但是，大部分骑士已经被阿历克塞所许下的20万银马克所打动，他们早已将可有可无的“圣地”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讥讽地对那些愿意前往“圣地”的骑士说：“亲爱的诸位阁下，你们去叙利亚干什么？到那儿去必将一事无成。那些从其他港口去叙利亚的人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你们要知道，如果将来收复海外失地，也只有通过埃及和希腊才能获得成功，没有它们的参与，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如果我们现在拒绝

签订这一协定，我们将永远蒙受耻辱。”

正当双方争执不下之时，十字军最高领袖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出面一锤定音：“的确，如果拒绝它，我们将蒙受耻辱。”

没有人敢向蓬尼腓斯提出疑问：如果拒绝进攻一个同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他们将到底蒙受什么样的耻辱？

十字军首领们和数位使者再次来到威尼斯总督丹多洛的临时宫殿，在总督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信守不渝”的协议。

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第一个在远征君士坦丁堡的协定上签字。随后，弗兰德尔伯爵鲍尔温、布尔瓦伯爵路易、圣波尔伯爵休格等人也龙飞凤舞地将自己的大名画在了蒙斐拉侯爵名字的后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远征基督教国家拜占庭的协定上签字的不只是马上的武夫，还有数位主教大人也在协定上画了押，他们是特尔瓦主教、夏逊主教、哈伯司达主教等。

主教们的行为不是一时的激动所致，他们自有一套仿佛很有说明力的理论：前几次十字军受挫与拜占庭人的背信弃义密切相关，正是

拜占庭人与“异教徒”狼狈为奸，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设下种种陷阱，坑害十字军人和十字军国家。背离罗马天主教的“宗教分离主义者”——拜占庭——拒不服从“上帝代办”的统治，并阻挠英勇无私的十字军去解放“圣地”，因而，它比穆斯林异教徒更为可恶。

所以，天主教会应该双管齐下：坚决反击“异教徒”，同时，对于“更为可恶”的“宗教分离主义者”也绝不能姑息养奸！

教皇英诺森三世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但在言辞上仍然保持得很有分寸：不能让人抓住把柄！

当远征君士坦丁堡的协定签署以后，一直注视着十字军动向的英诺森三世再次“大发雷霆”，多次写信并派“圣使”到达十字军军营，警告他们如果胆敢侵犯拜占庭，他们将被革出教会。

实际上，教皇并非真心要去惩罚即将远征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队伍。皇太子阿历克塞当初在罗马许下的条件以及最近所签订的内容，完全符合罗马教廷的利益：凯旋君士坦丁堡后装备一万人协助十字军夺回“圣地”，希腊教会

从属于罗马天主教会。有这等美事，教皇何乐而不为？最让教皇心花怒放的是后一方面，因为教会“复合”是历代教皇一直耿于心怀的大愿。

从以后的事情发展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英诺森三世的“威胁”和“恐吓”的确是言不由衷，这或许就是这位政治活动家欲擒故纵的手腕吧。在攻占扎拉之后不久，威尼斯人被革出教门，但教皇英诺森三世出于“最高目的”的考虑，旋即又将威尼斯人收进了教会。对十字军的态度亦是如此。当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英诺森三世“义愤填膺”地将十字军开除教籍，但当认识到夺得这座久已脱离罗马的城市，是对基督教世界的降福时，这位教皇又愉快地接纳他们，与自己共享同一份圣餐……

抛弃了“圣地”以后，十字军拟定了新的进军路线：沿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绕过巴尔干半岛，进入爱琴海，然而直捣君士坦丁堡。

1203 年 4 月，十字军向科孚岛进发。

按照前时约定的日期，拜占庭皇太子阿历克塞几乎同时与十字军在科孚岛登陆。在会见十字军首领以后，皇太子在那份由使臣们代为订立的协定上亲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203年5月底，十字军绕过巴尔干半岛南端的伯罗奔尼撒，从安德罗斯岛向君士坦丁堡进发。

威尼斯总督向阿历克塞四世扬言："十字军人可以像当初把你拖出泥坑那样，再一脚重新把你踢到泥坑里去！"不过，这位昔日的皇太子进的不是泥坑，而是上了牢狱里的绞刑架……

十字军舰队占领扎拉的消息传到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宫廷上下一片惊慌。

"篡位者"阿历克塞三世深知自己的实力，但面对即将来临的基督教大军，也不得不作出"应急"准备。

皇帝立即发布命令："把停泊在金角湾的那20艘被蛀虫咬坏的破烂船只修理好，准备抗击十字军！"金角湾是深入君士坦丁堡城内的海湾，几乎将都城分为两半，它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水道，一旦失守，君士坦丁堡将无法自保。

20艘破船和年久失修的城防，这就是君士坦丁堡用来抗击侵略者的"法宝"。

拜占庭的国力已经大大不比以前。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再加上连年战争，下层民众已是一贫如洗，无力再为“万民之主”的皇帝作出更大的贡献。由于拥有种种特权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在此称霸商界，原为拜占庭国库收入重要源泉的本国商业也日益衰败。高级官吏的贪财腐化，更是雪上加霜，使本来已经亏空的帝国财政更为寒酸。国家无力组建大规模的军队，除了人数极为有限的帝国军队和来自英国、丹麦等国的雇佣军外，全国上下再也找不出更多的略懂攻守之术的人才来。

拜占庭的政治形势也是不忍入目。从12世纪末叶起，拜占庭政局的动荡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宫廷斗争接连不断，党派之争从未止息。从中央到地方，整个拜占庭已经变成了一锅糊涂粥。来自东西两面的侵略使得拜占庭金瓯残缺，国土日益缩小，实力雄厚的地方贵族乘机拥兵割据，名义上统一的帝国实际已成一盘凑不到一起的散沙。

十字军虽然人数不算太多，只有3万左右，但它却无意中选择了一个好时机：拜占庭已是病入膏肓！

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三世不愿坐以待毙，即使有一分生还希望，也要全力争取，如果实在无药可求，那再另谋他途。

阿历克塞下发动员令，让城内身强体壮的市民和可数的拜占庭士兵通力合作，在金角湾的入口处架设多重铁索，以图阻止十字军船只的进入。不过，皇帝心中也清楚，这是十足被动的防御之策，主动出击根本无从谈起，就连能否招架得住也是难以卜料。如果抵挡不住，自己尚有双腿，那就是：逃。

看来，拜占庭皇帝只好有劳自己的大驾，将要“悲惨”离开这座已经坐镇 8 年的帝国都城了。

1203 年 6 月底，十字军——威尼斯舰队驶达君士坦丁堡城下，在金角湾的入口处停了下来。望着拜占庭守军的几道铁索和湾内由 20 来艘破船组成的拜占庭舰队，十字军首领们仰天大笑：“以如此低劣的阵势来与基督战士抗衡，何异于以卵击石！”

首领们并非是口出狂言。在攻打与自己是同一信仰的基督教国家中，十字军人的军事“天才”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费太大的周折，十字军就突破了金角湾口的铁索，并将由破铜烂铁组成的所谓“拜占庭舰队”打得溃不成军，20余艘破船一无所剩。

1203年7月3日，十字军进入了君士坦丁堡城防最为重要的战略中心——金角湾。一部分骑士留守在湾内的船上，负责巡防任务。另一部分则在加拉塔登陆，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城堡。

铁索被破，船队被歼，两道防线接连失守，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形势更加紧张。皇帝阿历克塞三世匆匆征集兵士，作最后的抵抗。

攻克拜占庭首都花了十字军人两周时间。他们运来射箭投石器械以及其他各种攻城武器，摆开了颇为壮观的阵势。

守卫君士坦丁堡的人除了拜占庭本国士兵和英国、丹麦等国的雇佣兵以外，与威尼斯人势不两立的比萨人、热那亚人也都“积极”地加入进来，他们要保证自己在拜占庭的商业特权不受侵犯。

拜占庭方面损失惨重，十字军和威尼斯人也有一定的损失。局势已经非常明朗：阿历克塞三世的君士坦丁堡将不久于人世，守城的军队根本抵挡不住十字军咄咄逼人的攻势。

大势已去，哪还能在此久留？“篡位者”阿历克塞三世不无怜惜地环顾着皇宫中的一切：“太熟悉了！朕之所以遭受今日之惨祸，难道就是因为8年前推翻了兄长以撒二世吗？十字军放着受难的圣地不管，却要来干预拜占庭帝国的内部事务。对以圣战为己任的基督十字军来说，究竟何者更显重要？事已至此，回天乏术。不用去多想了，如今只好以‘走’为上策了。”

1203年7月17日，阿历克塞三世携带家仆，狼狈地离开了君士坦丁堡，此后再也未能回到拜占庭的都城。

皇帝出逃之后，守城的拜占庭军队自动地放弃了抵抗，战斗暂告结束。大部分十字军人并未开进城里，而是在城外就地驻扎开来，但也有一少部分骑士急于捞财进宝和寻花问柳，已经闯进了君士坦丁堡城内。

1203年7月18日，失去双目的废帝以撒二世被手下的亲信贵族从狱中救出，重新登上了皇位。

十字军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目的”至此已经完全实现：“合法的”统治者已经恢复了帝位。十字军已经完成了为“真理”和“正义”而发起的

"义举"。

但是，皇太子阿历克塞当初所许诺的20万银马克现在还未见分文。拜占庭的国库本来就已十分空虚，阿历克塞三世逃走之时又将之席卷了一次。而且，以撒二世刚从狱中出来，更是无从立即弄来这笔巨款。垂垂老矣的以撒二世对十字军人的"高价效劳"十分不满，便让使臣对十字军首领直言相告："目前拜占庭国库极为拮据，实在无力支付这笔巨额酬劳，还望诸位阁下高抬贵手。"

十字军首领们的手真的高高抬起来了，但并不是要放过以撒二世，而是准备粗暴地给他一巴掌！不讲信义的基督战士决不能容忍别人对他们不讲信义！

十字军与拜占庭政府的关系又趋于紧张起来。令十字军稍微放心的是，他们手中还有一名可以利用的"人质"，这就是皇太子阿历克塞。如果他还有心要得到皇位的话，那么他就不得不按照当初所许下的诺言行事。

以撒二世重新即位几天后，皇太子阿历克塞在几位十字军首领的"陪同"下进入君士坦丁堡。此时的他，既激动，又恐惧。激动的是：今

日终于可以抬起头来，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篡夺皇位的“败家叔父”落荒而逃，双目失明的父皇虽不能重见天日，但终于告别了铁窗生涯，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更多的是恐惧：当初答应十字军和罗马教皇的两大优惠条件如何能够兑现？久不在位的父皇和流浪在外两载的自己已与乞丐无异，到哪去弄到20万银马克的现款？想起来，真为当初的“慷慨大方”后悔不迭！如果钱款不能兑现，十字军首领们岂能善罢甘休？自己的命运将重新悲惨下去。再者，教会“复合”问题更是令人心焦。自己现在有何种权力将希腊正教会送到英诺森三世的门下？

皇太子以难言的虎尾春冰的心境坐在十字军首领“好意”为他制造的“独木舟”上……

1203年8月1日，在十字军首领们的“举荐”下，皇太子被推举为父皇的共同执政者，称阿历克塞四世。

在阿历克塞四世的“晓谕”下，以撒二世被迫承认儿子对十字军所许的诺言，事后他悲愤地训斥了儿子的愚蠢行为：“你有什么把握，竟然能给他们许下20万银马克的酬劳？你以为你能蒙混过关吗？这帮骑士哪一个不会精打细算，

哪一个不会拦路劫道?”

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走。父子两位皇帝靠着高压政策,用没收、强征、举借新债和其他非常手段筹措金钱,凑足了10万银马克。这只是规定数目的一半,另外一半看样实难从国人手中榨出。

然而,十字军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另外的一半,他们要学着当初威尼斯人要挟自己那样,永不停息地去追求既定的目标。

早已进入城里的那批十字军士兵在得到首领们的默许之后,开始抢劫民户和教堂。8月底,骑士们纵火焚烧了一所清真寺,使穆斯林“异教徒”的礼拜场地化为灰烬,而且大火继续蔓延,殃及大片城镇居户。

市民们时常与十字军发生严重的对立,同时,市民们与拜占庭政府之间的关系亦十分紧张。据希腊史家形容,希腊人的怒潮“如狂风怒吼时浪涛汹涌的茫茫大海,暴动一触即发”。

刚刚复位的以撒二世和新君阿历克塞四世明显地感觉到,君士坦丁堡的大地在震颤,拜占庭的人民已经无法容忍政府对十字军人的政策。

专制帝王无法行使专制的权力，正摇摇向下坠落。阿历克塞四世被迫向自己的“恩人”十字军正式声明：拜占庭方面拒绝继续履行扎拉协定中的各项条款，而且不再为十字军提供粮食。

驻扎在城外的十字军首领们个个暴跳如雷，威尼斯总督丹多洛尽管也是怒火中烧，但显得稍微平静一些，他派使者向阿历克塞四世传言：“十字军何以像当初把你拖出泥坑那样，再一脚重新把你踢到泥坑里去！”

十字军首领们向拜占庭皇帝宣布：“基督战士目前已无别的办法，只好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已向昨日的“同盟者”宣战，要让“不讲信义”的拜占庭皇帝认识一下什么是铁蹄！

当十字军正要行动之时，1204年1月下旬，君士坦丁堡爆发规模宏大的人民起义，反对“包庇纵火焚烧城市、掠夺寺院”的阿历克塞四世。他们拥立普通军人尼古拉·卡纳瓦为帝，让他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危在旦夕。

在官命不保的关键时刻，两位皇帝又想起

了刚刚被自己推出去的十字军，他们要依赖十字军“朋友”，借他们之力保全帝位。

市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反对阿历克塞四世的怒潮更加汹涌澎湃。

不久之前还是两位皇帝心腹的贵族们，也害怕十字军和威尼斯人进入城内，因此合谋废黜了执政仅仅几个月的以撒二世和阿历克塞四世，并将他俩再次送进了那座非常熟悉的牢狱。不久，以撒二世在悲愤和绝望中死去。

君士坦丁堡的政权落入大贵族阿历克塞·杜卡斯之手，此人绰号“哭丧脸”，因为据说他终日皱眉蹙额。贵族们拥他为帝，称阿历克塞五世。人们指望这个颇具魄力的新皇能够励精图治，组织武装反对十字军和威尼斯人的进攻。

阿历克塞五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看来这一政策并非中国的专利，700余年前的希腊皇帝也懂得这一招术）。他首先要把人民起义镇压下去。他向起义军提出建议，要与尼古拉·卡纳瓦共掌政权。起义军没有答应阿历克塞五世的要求。就在这时，在起义军中担任领导的一些富裕市民转向了阿历克塞五世的一边，将起义军出卖给新皇。趁起义者混乱失措之机，阿历克

塞五世逮捕了尼古拉·卡纳瓦。

新皇帝下令，将尼古拉连同废帝阿历克塞四世一起绞死在监狱之中。阿历克塞四世，这位昔日的皇太子，未能陷进威尼斯公爵为他准备的“泥坑”，却因同室操戈而上了拜占庭自家的绞刑架……

阿历克塞五世果真雄心不小，他发布诏令：“限拉丁人在七日之内退出希腊土地。”

但是，拜占庭政府毕竟疲弱无力，新皇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深知拜占庭军事实力“不过如此”的十字军人并不理会阿历克塞五世的“逐客令”。他们不但不准备退席，而且还想要在餐桌上狂饮大嚼一番……

攻城掠地尚未开始，分赃会议却已结束。十字军和威尼斯各得其所。但是，威尼斯又要了十字军“蠢物”。

毫无战斗力的拜占庭军队在十字军眼里算不了什么，即使有几个不要性命的勇夫，那也不在基督战士的话下。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进攻

尚未展开，十字军首领们和威尼斯总督丹多洛已经志在必得，他们觉得，君士坦丁堡已经牢牢在握，它似乎已经成了十字军鹰爪中的鸡雏。

不用再无谓地浪费时间了，现在就要分赃。面对着眼前这座疲弱不堪又异常富庶的城市。西方骑士们已经迫不及待。

1203 年 3 月，威尼斯总督丹多洛、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和其他十字军首领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城下订立协定，瓜分了自认为已经到手的拜占庭“遗产”。这一协定的签署距最后攻克君士坦丁堡尚有几个星期，十字军首领们真可谓目光深远、略大才雄！

西方骑士们要在基督教拜占庭再建一个“十字军国家”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国家遥相呼应。

在“三月协定”中，十字军首领和威尼斯总督丹多洛对拜占庭动产、土地和政权的“分配”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

(1) 保有并扩大威尼斯的贸易特权，全部战利品（动产）的四分之三归威尼斯所有，其余的四分之一由十字军人分享。

(2) 在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后，成立新政府，

并选出新的皇帝。选举权属于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威尼斯人和十字军人各占6名。未当选皇帝的一方，应任罗马天主教下属的君士坦丁堡总主教。所有领主应向新皇效忠，但威尼斯总督例外。

(3) 皇帝得帝国领土的1/4，其余的3/4由威尼斯人和十字军人平分。

可以看出，精明的威尼斯人毫无顾忌地耍弄了十字军人一番。诚如马克思所说：威尼斯人以皇帝空号给予十字军蠢物，让他们拥有无法实现的统治权，自己则获得“远征事业的实利。”

天主教会也不再害羞。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十字军“圣战”督阵的主教们这时豁然开朗，他们要把全部的宗教热情投入到攻克君士坦丁堡这桩“准神圣事业”中去。

尽管十字军进攻的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多才的天主教会仍能找出极为合适的理由为其辩护。

在最后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前夕，十字军中的主教们和其他天主教会的代表人物来到骑士军营，满怀激情地为即将出征的“基督战士”免“罪”。

一位主教十分激动地说出了骑士、贵族们极想听到的话语："亲爱的诸位阁下，可敬的基督卫士们，辉煌的胜利就在明天。诸位不必为拜占庭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有半分犹豫。主教们，所有僧侣，一切受教皇管辖的人们，已经取得一致的同意：阿历克塞五世绞死了拜占庭昔日的皇太子，后来的共同执政者，他已犯下了不可宽宥的谋杀罪，这样的人根本不应拥有治国之权。"

倾听主教训勉的骑士们从心底向外喷出了一阵震耳的欢呼声。

顺着骑士们的情绪，那些主教更加慷慨激越："所以，我们正告诸位阁下，对君士坦丁堡的战争是正义的，无罪的！诸位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冲锋陷阵，仁慈的上帝照例会记下诸位的盖世功勋。而且，如果诸位更有善心，愿意将所得的土地归于罗马教廷的门下，伟大的教皇必将龙颜大悦，赦免诸位以往的一切罪孽！教皇陛下在静候诸位成功的佳音！"

这位主教的言词未免有些夸张，他并未得到"教皇支持骑士军进攻拜占庭"的准信。实际上，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面子也罢，真情也罢，

教皇英诺森三世倒是几次谕告十字军，严厉反对他们对“基督教土地”舞刀弄枪。不过，这位主教不愧为行家里手，他用由己及人的方法，已经窥透了教皇陛下的心思。因而，说些大话不要紧，教皇陛下从来不去责备那些成功的人！

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基督战士们扫却了后顾之忧，来世不仅不会落入地狱，反而还会大享天堂之福。

万事俱备，东风已来。攻克君士坦丁堡的时机已经成熟。

1204 年 4 月 9 日，十字军开始进攻在他们看来已是老态龙钟的拜占庭首都。骑士军满不在乎地轻轻松松上了阵。但出乎“基督战士”意料的是，城墙里的箭镞、石块如雨而飞，射向城下的十字军人。措手不及的十字军献出数百名骑士的性命之后，不得不暂停攻城。第一次进攻遭到失败。

虽然击溃了十字军的进攻，“哭丧脸”阿历克塞五世并不感到轻松，因为守城的士兵也损失不少，本来就已薄弱的城防如今更加危险不堪。既然如此，何苦恋战？于是，这位逞雄心于一瞬的阿历克塞五世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带

着几名亲信仆人，装上几袋黄金白银，溜之大吉了。守城的士兵就不用管了，让他们再抵挡一阵子吧。

三天之后，即1204年4月12日，十字军二次攻城。多加了几分小心的十字军人借着吊桥之助登上了城堡，同时，城门也被另外一批十字军人攻破。骑士们疯狂地冲入城内，拜占庭守军被迫飞速后退。

1204年4月13日，君士坦丁堡完全落入十字军手中。这次进攻，总共花了不到2天的时间。

“东方之珠”君士坦丁堡不再拥有往日的庄严，日夜通明的拜占庭皇宫现在也已灯油耗尽，不见光辉。

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以后，立即侵入了宫殿、寺院、商库、民宅。“基督战士”横行全城，抢劫杀人，破坏古物，纵火滥烧，强奸妇女，酗酒狂宴，诸如此类的“功勋”数日不绝。

目睹十字军抢劫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元老院议员奈西塔斯·阿克米内塔斯痛心地写道：“要记下这批背信之徒的一切行为，我真不知道从何写起，也不知道写到哪里为止。……他们并

不怜惜任何人，他们可以洗劫任何人的财产。可以说，就是萨拉森人（穆斯林）也要比他们善良得多。……”

对于骑士们来说，教堂并不是一块禁地，他们可以目无旁人地鱼贯而入、鱼贯而出。只要教堂尚有一分值钱的东西，“主陵”解放者的贪婪之手绝对不会放过。君士坦丁堡的索菲亚大教堂所受的“礼遇”最高。据奈西塔斯·阿克米内塔斯的记载，十字军人搬走了这座教堂的“圣器、非凡的艺术珍品、稀有的宝物、黄金和白银。”在这场抢劫狂潮中，佩戴十字章的“基督战士”竟然将骡子、马匹大大方方地牵进索菲亚教堂，让它们也来倾听一下希腊正教僧侣的祈祷和呻吟，然后驮起战利品，扬长而去。

君士坦丁堡历经几百年积贮起来的文化珍宝也被十字军破坏殆尽。什么古代艺术，什么雕刻珍品，在以武为生的西方骑士眼中，全是废品一堆。当然，如果是金属制的艺术品，他们也会加以“推崇”，受到特殊的“珍重”。为了在分配战利品时便于计算价值，骑士们把抢来的大量金属艺术品熔铸成块件。至于像用石头、木料、骨头等材料做成的各种精美的艺术品，则几乎

遭到完全的“灭迹”。收藏丰富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也化为灰烬。

威尼斯人对艺术的鉴赏力要略高于十字军人。几件幸免于难的艺术品主要是威尼斯人保护下来的，不过，他们并未将其留给君士坦丁堡，而是运到了西欧和南欧，用以装饰宫殿和寺院等。例如，威尼斯总督丹多洛曾经命令，保护好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时代著名艺术家莱息帕斯的雕刻珍品——君士坦丁堡赛马场中的“青铜饰金四马像”，并将之运送到威尼斯。直至今日，莱息帕斯的“四马像”仍然是威尼斯圣马克教堂的一件完美的饰品。

但是，威尼斯人的“善心”并没有能够挽救拜占庭艺术的悲惨命运。著名的英国拜占庭史家任锡曼曾愤然控诉十字军的罪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人类所犯的罪恶之大，空前未有！”

天主教僧侣在这桩“神圣事业”中也不甘落后于披盔戴甲的骑士。他们为了便于行动，干脆将僧衣脱下，甩到一边，然后于一片混乱之中在君士坦丁堡奔来跑去，寻找由黄金和白银制成的“神圣遗物”。据史书记载，当德意志的哈伯司达主教康拉德于1205年回到图林根时，他的

前面是满载着君士坦丁堡“神圣遗物”的大车。

十字军人对君士坦丁堡出其不意的富有大喜若狂。哲夫利·得·维拉杜安写道：“得自君士坦丁堡的战利品无法计数，基督战士们得到了令自己也无法相信的大量黄金、白银、宝石、金银器皿、绸缎衣服、皮货和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

在十字军中混饭吃的罗伯·得·克拉利也大声惊呼：“这里聚集了全世界财宝的三分之二！”

看到十字军骑士们手中的战利品，善于盘算的威尼斯人的眼睛本能地发热了，他们向十字军人提出，以40万马克的价值购买骑士们份内的战利品。有时也能算出一笔好帐的十字军人认为，这笔买卖于己不太合算，威尼斯人是想借此再赚一笔。于是，十字军人拒绝了这一建议。

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没有闭目塞听，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罗马。

正如前文所料，英诺森三世最初对十字军的掠夺行为表示极端愤慨，并狠狠地责骂了基督骑士们一顿。在给十字军的信中，英诺森三世

痛心疾首地说："你们违背了'勿侵犯基督教土地'的禁令。你们不去占领耶路撒冷，而且去攻打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抢劫大户小户。这为上帝所不容，就连希腊人也完全有理由视你们如猪如狗！"

英诺森三世痛下狠心地继续写道："既然你们看重地上利益而轻视天堂幸福，本教廷已经作出断然决定：将你们革出教会！"

十字军人成了没有教籍的"游民"。

不过，基督战士们不用担心。不久，向来意志坚定的英诺森三世却被一种"合理情理"的说法所感动，轻松地改变了当初对十字军人的"偏见"。这种说法是：由于上帝的公平裁判，希腊帝国才转归拉丁人所有；君士坦丁堡之被攻取，是拜占庭人对天主教背教的天谴！

英诺森三世"开始"觉得，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简直是"上帝的奇迹"。君士坦丁堡没有落入"异教徒"之手，而终究为基督徒所有，此乃大幸，看来上帝还是以慈悲为怀的。

于是，英诺森三世又名正言顺地为十字军人恢复了教籍，欣然接纳他们共享圣餐。他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对十字军由打骂转变为亲吻，其

目的在于实现企盼已久的教廷目标。

教皇再次致信十字军首领说："我们希望能赖诸位的努力，使君士坦丁堡教会恢复对教廷忠实的尊敬。"教皇是在催促他们早日使希腊教会服从于罗马教会，完成基督教会的"复合"！

对于英诺森三世一前一后的表现，马克思有精辟之论："虽然为了体面而表示愤怒，可是终于还是宽宥了'朝圣者'的兽行和丑事。"

拉丁帝国奠基立业，新皇鲍尔温孤芳自赏，自比大帝君士坦丁，并恭请教皇"在方便的时候"驾临"新罗马"……

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开始实施"三月协定"。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直接的产儿——拉丁帝国出现在拜占庭的废墟上。

皇帝的选立费了一翻周折。威尼斯方面没有问题，它不愿担负这项吃力不讨好、有名无实的光荣；竞争来自十字军内部，东征军的主帅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和弗兰德尔伯爵鲍尔温都想成为这一新兴十字军国家的皇帝，他们要满足

一下渴望已久的“皇帝瘾”，根本不用考虑它是否有名无实，是否吃力不讨好。

威尼斯人虽无意当选皇帝，但手中拥有一半（6票）的选举权。他们不愿意蓬尼腓斯成为新帝国的领袖，因为他来自北部意大利，其领地与邻近的威尼斯共和国关系并不融洽。而弗兰德尔伯爵鲍尔温则是远离威尼斯的西欧领主，对于威尼斯的威胁相对较小。

拉丁帝国的皇冠落到了弗兰德尔伯爵鲍尔温的头上。1204年5月9日，鲍尔温登基称帝，拉丁帝国正式成立。

“三月协定”规定：未获当选皇帝的一方出任君士坦丁堡总主教。鲍尔温称帝后，威尼斯人便把本国的副助祭托马斯·摩洛西尼推上了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的位置。当时，摩洛西尼本人尚留在威尼斯，他是缺席当选。

刚刚当选为皇帝。鲍尔温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成功后的满足感已经使他不辨南北东西。神情恍惚之中，他发觉自己摇身一变，成了8个多世纪以前的君士坦丁大帝，威严地屹立在拜占庭大地上……

以“新君士坦丁”自赏的鲍尔温没有忘记曾

经给予十字军许多“恩惠”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他要将十字军的光辉业绩向教皇作毫无保留的汇报。

鲍尔温在给英诺森三世的信中写道：“基督战士已经在此奠基立业，拉丁帝国已经稳扎于君士坦丁堡。背教的拜占庭人正在脱胎换骨，企盼罗马教廷圣光的照临。拉丁帝国属于尊敬的教皇陛下，您的臣民热切希望您能在方便的时候驾临已经成为‘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如果陛下有意，可以在此召开全世界基督徒大会，陛下可以将上帝的恩泽普施于每一位渴望雨露滋润的上帝子民，东方教会必将完全心甘情愿地接受陛下的领导。驻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将士不愿坐享其成，尚要奋勇前行，请教皇陛下为基督战士此后的一切行动深深地祝福吧！”

英诺森三世支持鲍尔温继续扩展力量，他号召全体基督徒保卫拉丁帝国，全力协助鲍尔温。

不过，教皇并未愉快地接受鲍尔温的邀请。他告诉拉丁帝国的皇帝：“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并不等于整个拜占庭都已在手，拉丁帝国的版图目前还仅限于一个首都。神圣事业尚未成功，

阁下还需多多努力！”教皇是要鲍尔温再展宏图，然后“再与诸君痛饮黄龙府”！

鲍尔温当然清楚，战胜君士坦丁堡中的希腊人，只是漫长征途的第一步，征服拜占庭全土还需艰难的跋涉。

1204 年夏，鲍尔温出征马其顿，占领帖撒罗尼迦，而这块地方一直是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想象中的领地。为了报复鲍尔温夺土之仇，蓬尼腓斯出征阿德利安诺普，而该城周围本已驻有皇帝的骑士队伍。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威尼斯总督居中调停，1204 年 8 月，丹多洛迫使鲍尔温同意，将帖撒罗尼迦转归蓬尼腓斯所有。

为了避免再起冲突，1204 年 9 月，威尼斯总督和十字军首领决定修改 1204 年的“三月协定”，具体规定将来被征服者占领后的土地归属问题。精明的威尼斯人再次“昧着良心欺骗”了十字军愚夫，“他们和他们粗鲁的公侯，都不过是这些市侩掌中的工具”罢了。

从 1204 年秋开始，十字军展开了征服拜占庭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拉丁帝国的皇帝鲍尔温夺得了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

蓬尼腓斯得地甚广。北部希腊的帖撒利、中部希腊的阿提卡和布俄西阿、南部半岛的伯罗奔尼撒、马其顿的大城市帖撒罗马迦及其毗连地区都成了他的领地，由此形成了幅员较广的帖撒罗马迦王国，蓬尼腓斯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国的国王。

其他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也在设法建立自己的领地，但仍有不少骑士只拥有空头官衔，因为皇帝“赐给”他们的领地，从来未被他们占领，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况多出现于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

在拜占庭“遗产”中，威尼斯人所得最多。在1204年9月，分配疆土时，威尼斯人利用十字军人对地理的无知，取得了拜占庭黄金地段的“拥有权”。当然，威尼斯人并没有夺得所想要的全部土地，但是，就他们到手的土地而论，其重要性也是非十字军的大部分领土所能比拟。

在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掌握着博斯普鲁斯沿岸和金角湾的最重要港口和码头。在色雷斯，它完全占有阿德利安诺普；在马尔马拉海岸，占有大量沿海据点如罗多斯托、赫拉克利亚

和加里波利等，从而控制了黑海门户，并保证在马尔马拉海的统治权。在伯罗奔尼撒，它夺取了科隆和摩同这两个港口城市，使之成为威尼斯进行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哨卡”。在爱琴海上，威尼斯人拥有众多岛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克里特岛，因为在此可以非常容易地控制从西方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的海道。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拉丁帝国事实上已经成了威尼斯的“殖民地”；还有些史家则更为激进，认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结果是出现了拉丁帝国和威尼斯帝国这两个一明一暗的角色。

从丹多洛起的威尼斯总督们也不讳言自己的实力，他们一直自称为“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君主”。

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已经安顿完毕，罗马教廷也不甘落后。

从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克以后，教皇英诺森三世尽管仍敦促拉丁帝国的首领们勿忘“圣地”，让他们记住他们的“本职工作”是从“异教徒”手中救出“主陵”，十字军东征不能停止，但是他的主要目标已经发生变化，他要在如今的拉丁帝国各地扩充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不

过，教皇仍愿掩人耳目，以减轻自己的“罪愆”。1210年底，英诺森三世曾写道：欧洲人民“怨声载道，好像拉丁军人的目标转向君士坦丁堡并占领该城，是出于教廷的策略”。教皇似乎受了满腹冤屈，有口难言。实际上，这正是精明阴险政治家所常用的精明阴险的手腕。

英诺森三世批准了威尼斯人的提名，托马斯·摩洛西尼成为君士坦丁堡总主教。但教皇明白，不能依靠他去完成东西方教会的“复合”，他出任总主教，不是为了向罗马教廷效忠，而是要为威尼斯人服役。因此，教皇要派自己的心腹去希腊，让他们去使希腊人相信天主教优越无比，信仰天主教完全必要。

1205年，教皇的使臣红衣主教本笃来到拉丁帝国，组织多次宗教辩论会，与希腊僧侣展开抽象的论战。论战的结果，具有丰富深奥文化传统的希腊方面总是居于上风。

本笃的积极活动收效不大，让教皇英诺森三世大失所望。天主教僧侣只是在很少的地方使希腊人改宗天主教，而且在这些地方，完全是由拉丁骑士用刀剑帮助牧师进行“训诫”的。因此说，希腊教会屈从于罗马和希腊人改宗天主

教，并非得力于和风细雨的劝诫，而是收效于“豪放的”武力强制。

1213年，英诺森三世派全权使臣、西班牙人红衣主教比拉吉到希腊去表达天主教会的“爱心”。在教皇的授意之下，比拉吉采用大规模的强制手段，使希腊人相信天主教会的优越。对于俗人，不服从“训导”的便被投入狱中，严重的则处以极刑。对于僧侣，比拉吉也不手软，“顽固不化”的修士被逐出修道院，“煽动闹事的”教堂被帖上了封条。

然而，英诺森三世的目标仍是不能完全达到。在1215年召开的拉特兰宗教会议上，由于教皇的坚持，会议通过特别“教规”，向“宗教分离主义者”作出让步，在礼拜仪式上对希腊教会实行宽容的政策。但就是在如此“宽容”的环境下，希腊人也不曾领受罗马教廷的“融融爱意”。“复合”后的基督教会就是在这种若即若离的气氛中“和平共处”着。等到1216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去世以后，天主教会在希腊的阵脚就更为松动了。

同耶路撒冷王国一样，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拉丁帝国外强而中虚，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

拉丁帝国成立后不久，皇帝鲍尔温和国王蓬尼腓斯率领的十字军主力前往小亚细亚，在巴尔干半岛的城市中只留下少数驻军。这时，全希腊便展开了反抗拉丁侵略者的游击战争。1205年3月，希腊人将拉丁人逐出阿德利安诺普以及其他色雷斯城市。与此同时，深受十字军侮辱的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军队开进了色雷斯，支持希腊人的抗敌斗争。

十字军不得不回师已经易手的色雷斯。1205年4月15日，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一起与十字军大战于阿德利安诺普。重盔重甲的十字军骑士遭到完全的失败，拉丁皇帝鲍尔温本人也成了保加利亚军队的俘虏。

拉丁帝国的皇位由鲍尔温之弟亨利继承(1206～1216年在位)，此后，帝国仍不得不与保加利亚军队多次作战，在1207年的一次战役中，蒙斐拉侯爵蓬尼腓斯阵亡。至此，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两位主将二不存一。

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在幸免于十字军征服的拜占庭帝国的边疆省份，出现了几个新的希腊国家：在西部有伊庇鲁斯公国，在小亚细亚有尼西亚和特拉布松两个帝国。它们

在反抗拉丁人的斗争中逐步壮大起来，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尼西亚帝国。

十字军的拉丁帝国与周围国家的战事从未间歇，保加利亚、伊庇鲁斯、尼西亚、特拉布松等都成了它的战争常客。同时。帝国内部的希腊人坚持不懈的反抗斗争，也使拉丁帝国的十字军疲于奔命，不得喘息。

1261 年，拉丁帝国的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黑海援助威尼斯人对海上商业竞争者的斗争，君士坦丁堡城防极为空虚。

城内居民乘机迎尼西亚皇帝米凯尔·巴列奥略（1259～1282 年在位）进入君士坦丁堡。此前，米凯尔早已经与热那亚人结盟。共同抗击威尼斯人。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米凯尔的军队顺利地占领了被拉丁十字军盘踞 57 年之久的君士坦丁堡。从 1261 年起，拜占庭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开始了拜占庭最后一个王朝——巴列奥略王朝（1261～1453 年）的统治。

“见义勇为”的十字军再也未能回到“拉丁帝国”的首都，帝国的皇帝也被迫逃往意大利避难去了。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给拜占庭的历史烙上了

无法挽救的伤痕。1261年以后，拜占庭尽管重又独立，但再也无法恢复从前的国力，国土更加缩小，在国际政治中处于软弱的地位。

昔日强国的影子龟缩在亚欧大陆之交的一片土壤之上，它也曾试图从地上支撑着站起来，但地球的引力始终将它吸附在悲凉的地面上，随着阳光由强变弱、由弱变无，这个无足轻重的影子边渐渐消失在世人的视野之外……

第六章　魂丧前的躁动

十字军东征堕落成徒劳的、甚至是虚妄的远伐，而这些远伐都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只有狂热的死顽固和虚幻的热心家才继续对它们感兴趣。

——(美)J·W·汤普逊《历史著作史》第十八章“记述十字军的拉丁历史学家”

大事记：

▲1212年，儿童十字军东征；

▲1217～1221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28～1229年，第六次十字军东征；

▲1248～1254年，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1270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基督战士们在君士坦丁堡的“意外”举措尽

管圆了罗马的教会“复合”梦，但讲求千秋英名的教皇们终究觉得，这种圆梦法对罗马教廷来说毕竟不太体面。

为了矫正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所扭曲的形象，罗马教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美容。因此，在君士坦丁堡被骑士军攻陷后，罗马教皇继续号召天主教徒起而征服耶路撒冷，让他们为“圣地”重归主的怀抱而奉献出纯洁无瑕的热情。

人们的东征狂热逐渐在消退。当然，在民不聊生的年头，教皇的号召也还能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人民大众的共鸣。在人民的生活极度困苦之时，由教会灌输的宗教感情，就会成为使民众接受“圣战”号召的温床。

就实际后果而论，后来的几次十字军东征没有什么惊人的表演，未能从实质上改变十字军国家在东方的尴尬地位。

数万名童男童女蜂涌来到南欧港口。出于畸形的宗教热忱，乳臭未干的童子军竟然相信：地中海的海水会在他们面前干涸，为他们铺设一条通往圣地的神秘道路……

在为时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史中，最为阴暗悲惨的一页发生在13世纪初期。一批天真无邪的儿童被天主教会的"圣人"扶上战马，送上牛车，他们要学着大人们的模样，准备踏上"主的道路"，与"异教徒"争个上下高低。

儿童远征军的酝酿从一个年仅12岁的法国牧童埃提扬开始。

13世纪初叶，法德两国的封建内讧和战争接连不断，农民的生活日趋困苦。在贫穷无奈的生活环境中，下层民众的宗教情绪又闪出一束阴暗的火苗，他们幻想通过求得"宗教功德"来赎罪，获得现世和来生的自由。

父辈们时常谈起的十字军远征引起了牧童埃提扬的兴趣……

一群牛羊在刚刚吐芽冒绿的荒地上寻觅着

嫩草，看着这群被自己操纵的无忧无虑的生灵，喜欢漫无边际想象的埃提扬觉得，眼前的牛羊就是一群听任自己指挥的童子军。

为了验证自己的感觉，埃提扬挥起鞭子，在“牛羊童子军”后面又舞又喊。被鞭子驱使的战士们纷纷向前方奔去……

着魔似的埃提扬追赶着牛羊，俨然成了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

埃提扬的怪诞心理日甚一日，家人们诚惶诚恐，但又无可奈何。

当地的一位牧师发现了这个连文法尚不懂的牧童天才，他要在这个年仅 12 岁的疯疯癫癫的孩子身上创造出令世界震惊的奇迹。牧师把埃提扬“虔诚”地请进教堂，对他进行细心的训导。

1212 年 3 月，埃提扬来到巴黎的圣日内修道院，向修士们郑重其事地说：“我是上帝的使者，上帝任命我为儿童军的指挥，去进行解放圣地的战争！”

教会人士对这位“上帝使者”的大言先是惊愕，后是喜悦。征服“圣地”的战争后继有人！

于是，在法国和德国城乡，先后流传起一种

荒诞不经的观念：无罪的儿童所能得到的神佑，决非罪孽深重的成人能够得到；纯洁的儿童能够凭借“奇迹”从穆斯林“异教徒”手中解放耶路撒冷。

在天主教会的安排下，埃提扬开始云游法国四方，以梦中“上帝显圣”的故事吸引大批迷信的穷人：“耶稣基督亲自指示于我解放主陵的真正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委托，我号召与我同龄的童人们行动起来，响应十字军功德。诸位不必为东征的困难担心。奉上帝的命令，地中海的海水会在我们面前干涸，为我们铺设一条通往圣地的神秘道路……”

埃提扬在各地的演说台词几乎一字不易。这并不奇怪，除了牧师们为他拟定好了的“圣战”道白，年仅12岁的毫无经验的孩子当然编不出更多的谎言来。

不久，法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与埃提扬年龄相仿的儿童作同样的布道演说。他们在埃提扬的“统一指挥”下，把法国穷人求自由的苦行情绪染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

小领袖们坚贞的演讲像瘟疫一样，迅即把大量的农家之子卷进了由“圣水”做成的宗教激

流之中。对现世生活无望的父母们怀着对来世生活的一线希望，凄惨而虔诚地将孩子们送上了天主教“圣战”的祭坛。

受了感染的年龄多在12岁以下的少男少女们，成群结队地捧着“圣战”的旗帜和十字架，唱着庄严凝重的祈祷诗，前往“小预言家”埃提扬的住处——凡同城。

曾经是牧童的埃提扬现在已经成了众星捧月的小圣人。在骑马卫兵的簇拥下，这位“纯洁无瑕”的军队指挥坐在缀有毡毯的马车上，向痴心的听众们继续不停地倾诉着“上帝的显圣”、“海水的干涸”。

《圣经》有记载：摩西来到海边，面前的海水便自然分开，出现一条神秘的通道，摩西如履平地在海上行走。

埃提扬的“海水干涸”理论便来自《圣经》上这段“千真万确”的记载。不过，奶气未消的埃提扬本来根本不知摩西竟然还遇有这等“奇迹”，好在诸位精神导师见多识广，博览多闻，他们可以给埃提扬面授机宜。

1212年6月，凡同城中已经聚集了3万男女儿童，他们睁着一双双好奇而陌生的眼睛，谛

听着天主教牧师们的壮行曲。

在埃提扬的率领之下，这支由3万人组成的儿童纯洁队悲壮而信心十足地启程了。同行的还有一些农民、城市贫民、狂信的修士和盗贼等，这些成年人也要沾一点孩子们的光。

孩子们坚信：不必为危险担心，不用为饥饿发愁，到达海边，“奇迹”自然出现，有上帝的爱心，有耶稣基督的护佑，纯洁的儿童十字军有何可惧?!

儿童十字军从凡同城出发，经图尔和里昂，不久便抵达地中海边的城市马赛。

心情急切的孩子们欢呼着奔向海边，盼望着“奇迹”的降临。然而，他们惊呆了：茫茫一片的地中海依然波涛相连，海水并没有分开，更没有干涸，到哪儿去寻找那条伸往“圣地”的神秘通道?难道“小预言家”埃提扬的预言失灵了?难道耶稣基督的显圣是个骗局?

纯洁的孩子们解释不了眼前这种“预言”的偏差。几个月来一直热情洋溢的儿童军指挥埃提扬变得哑口无言，他尊崇自己的导师们，但是，这些年龄高于自己数倍的热心肠的老先生难道是在愚弄自己?按照他们的指示而作出的

“预言”都已到哪里去了?

埃提扬变得惊恐起来，他怕招致手下“神兵”的询问和围攻。如果那样，他何言以对?

幸好，这群无知的童子军没有想到要把罪责推到他们指挥的身上，更没有去围攻和责问这位“小预言家”。出于本能，他们只知道围着海边哭喊流泪；他们想念家中的父母了。

马赛的船主们觉得，这可是一笔利益丰厚的好生意!哄一帮无依无靠的孩子，简直太容易了。

船主们找到了童子军的小首领们，表示愿意为儿童十字军远征“圣地”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慈善事业”：送他们渡海。

既然海水不为他们而分开，也不为他们而干涸，童子军人为了完成这桩“神圣的事业”，也就只好接受了马赛船主的“慈善之助”。

少年“基督战士”被送上了前往“圣地”的船只。没过几天，有两只满载童子军人的船在撒丁岛附近遇到风暴，数千名小战士和马赛“慈善家”一起随着沉船沦陷于地中海的海底，成为游鱼的美餐……

另外五艘船只继续向前航行，但童子军人

到的不是“圣地”耶路撒冷，而是穆斯林埃及。船主毫不犹豫地将两万余名“纯洁”的基督战士卖给埃及人作了奴隶。

罗马教廷一直在等待着儿童十字军的“奇迹”，但传来的却是让人九转回肠的不幸消息。罗马教廷岂能容忍不法之徒这等利欲熏心？

船主们回到马赛后不久，便在罗马教廷的直接干预下，全都伏法，上了冷冰冰的绞刑架。

但是，死去的童子军再也不能复生，被卖为奴隶的“基督战士”再也无法回到肝肠寸断的父母们的怀抱。

在法国牧童埃提扬奉耶稣的“旨意”号召儿童军远征后不久，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闹剧。

年仅 10 岁的尼古拉在父亲的陪同下在下莱茵河一带宣扬儿童十字军的“神奇功效”。在父亲的训导之下，像埃提扬一样，尼古拉用奶声奶气的腔调向人们宣布：“据上帝示兆，我将脚不沾水地走过地中海，在耶路撒冷建立神国。而且，要达到这一目的，根本不需用武力征服，仅凭少年基督战士就可以使穆斯林异教徒改宗基督教。”

尼古拉的布道获得了同样的成功。神差鬼

使的父母们亦信亦疑地将自己的子女送进了十字军远征队。

大约2万名男女儿童来到了莱茵河西岸的城市科隆。在天主教牧师们的关怀下，童子军整装待发。他们的行装极为简单，未带任何兵器，因为尼古拉的预言已经指明：童子军将和平解放“圣地”耶路撒冷。

1212年6月底，德国儿童十字军从科隆出发，沿着莱茵河前进，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他们历尽了艰难险阻，有一半以上的儿童死于劳累和饥饿。

1212年8月，“神兵”童子军到达热那亚，然后继续向罗马进发。到达罗马以后，一部分儿童忍受不了上帝的磨炼，疲乏不堪地逃回去了。

为数不多的小战士来到了布林的西。与马赛的情形类似，当地的商人船主也大发善心，愿将他们运送出海。幸有当地政府的干涉船主们的“善心”才未得如愿施展。

教皇英诺森三世已经觉得，儿童十字军东征的确荒诞如也，但又不好断然否定。于是，英诺森三世下令：容许儿童十字军人待到成年以后再履行自己的誓约。

在布林的西的德国童子军未能到“圣地”建立“神国”便踏上了归途。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再加上饥饿、寒冷和各种疾病，又有一大部分儿童惨死在回家的路上。

穆斯林求和，愿将“圣地”拱手让与十字军，基督战士傲骨铮峋：“不要！”自以为得势的十字军得寸进尺，无奈暴涨的尼罗河水冲跑了骑士们的一切美梦……

儿童十字军的悲惨结局并未使罗马心灰意冷，它反而要借此激发起成年人的东征热情。

1217～1221年，西方国家向东方发起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但东征前的准备工作却经历了虎头蛇尾的变化。

得到希腊教会以后，教皇英诺森三世丝毫未减其执着的溶政治于宗教的热情。这位背离历史发展趋势的杰出的教会政治活动家有着全盘的考虑，单取一城一地不能构成“基督教世界”！“圣地”仍要夺取，“主陵”仍要保护。

1213年，英诺森三世向一切天主教国家派出了人数众多的教廷使节和修士，为“圣战”而

狂热地说教布道。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匈牙利、荷兰甚至偏远的挪威和爱尔兰等地都成了狂信者的演讲厅。

英诺森三世明谕教廷使节和修士："犯有各种世俗罪孽的基督徒亦可加入神圣的十字军，只要他们诚心悔过，就可在圣战中得到完全的清洗，将能够以全新的面貌接受上帝的恩典和荣耀。"

1215 年，在英诺森三世的主持下，天主教会在罗马大教堂拉特兰召开宗教大会。除了讨论教义、教规等常规问题以外，拉特兰宗教会议作出决定：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

与从前一样，进行东征就必然涉及到钱财。天主教会的僧侣们奉命捐输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作为"圣战"的经费。

为了达到天主教会的"最高目的"，英诺森三世再次慷慨解囊，为十字军捐助了 3000 银马克。

在罗马教廷走卒的鼓动下，又有三个国家的君主宣誓加入"圣战"的队伍。他们是：匈牙利国王安得烈二世（1205～1235 年在位）、英国国王约翰（1199～1216 年在位）和德意志的腓

特烈二世（亦译作腓力二世，1197年始为西西里王，1212年始加任德王，1220年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死于1250年）。

死神嘲笑了十字军领袖们，上帝并不认为他们都具备进行“圣战”的资格。1216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和英王约翰先后结束了俗世生活，开始在“天国”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

英诺森三世的去世，使罗马教会失去了众目所归的公认权威，后任的教皇们望尘莫及。英王约翰的死亡，使得正在组建的英国十字军变成了无头鸟，出征的事宜被暂时搁置起来。

英诺森三世魂归天国，德王腓特烈二世额手称庆，他终于摆脱了令自己最为头疼的对手。尽管已经宣誓加入十字军，但腓特烈二世并不准备立即践约。目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领地需要巩固，在德意志的领地也不平稳，于是他便以种种托词规避十字军东征这件“圣事”。但他声明，他并不反对其他德意志基督徒立即参加“圣战”，只是自己不能如愿，因为国内事务实在太多、太杂，无法抽身。

当初宣誓的三位君主中，如今只有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还抱着那团炽热的宗教烈火。

英、德两国君主的销声匿迹，并未使安得烈二世感到孤单，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圣战所带来的一切荣誉都将归于我——匈牙利国王！"

1217年夏，安得烈二世率领大队人马，从达尔马提亚的港口城市斯巴拉托出发，远征东方。与此同时，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尔德六世、荷兰的威廉伯爵以及南部德意志的一些公爵也带领陪臣，投入到"神圣事业"之中。教皇也派出了自己的使臣比拉吉（即前不久出使拉丁帝国，以武力恢复基督教信仰的那位红衣主教），作为十字军人的精神统领。

"第二耶路撒冷王国"并不欢迎基督十字军的到来。迁都于滨海小城阿克的第二王国与穆斯林埃及之间的和平交往已将近20年，宗教上的对立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对穆斯林发动战争只能损害基督徒的商业利益。不过，"第二耶路撒冷王国"难于启齿反对十字军去攻打"异教徒"，因而只能在态度上对他们表示极端的冷淡。

在地中海上漂行了一个月之后，匈牙利和德国的十字军人来到了"第二耶路撒冷王国"的

首都阿克，他们准备以此为据点，向东突击，进入叙利亚内部，如大马士革等地。

一年时间匆匆逝去，但十字军在东方的“神圣事业”未能取得丝毫进展。到这个时候，匈牙利国王安得烈二世才叹服德王腓特烈二世的先见之明，早知今日碌碌无为，还不如当初安心地守在家中。

安德烈二世舍弃了一年以前设计的辉煌蓝图，决计返回匈牙利。耶路撒冷总主教先是竭力挽留，劝他继续完成尚无眉目的“圣战”。在看到安得烈二世对自己的良言竟无动于衷，仍执意要走之时，总主教动了肝火，安德烈二世受到严厉的惩罚——被逐出基督教的教门。

安得烈二世不顾教会的破门惩戒，还是回到了匈牙利的王宫。1222年，匈牙利贵族利用国王十字军东征失利的机会，逼迫他颁布了所谓的“黄金诏书”。安德烈二世成了无权无势的国王，匈牙利也陷入了无政府的困境。

威廉伯爵率领的荷兰十字军很晚才到达阿克，他们把将近两年的时间都送给了葡萄牙城市里斯本，在那里与南部西班牙的穆斯林总督大打出手，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1218年4月，

荷兰十字军在阿克与德匈两国骑士军汇合。不过，匈牙利国王安得烈二世已经“看破红尘”，旋即返回家园。

剩留在阿克的十字军人放弃进攻叙利亚腹地的初衷，经过长时间争论，决定倾全力进攻穆斯林世界的“首犯”——埃及，直接的进攻目标是埃及的商业要塞达米埃塔。

达迷埃塔地处尼罗河三角洲的一条支流上，是深入埃及的咽喉之地，城市周围有三道城墙，在城墙外面的尼罗河小岛上设有坚固的碉堡，碉堡与城市有桥梁相联，并架设有粗大的铁索，以阻止敌人从水路进攻达米埃塔。

十字军人表现出为“上帝”而攻城不怕坚的气概，他们在达米埃塔城下蹲了将近一年半。

骑士们不光会骑马射箭和向贵妇人献殷勤，不知从何处也学到了几手水上作战法。他们将船舶改装为水面攻城机，上面装有巨大的攻城梯。初时战果颇丰，穆斯林的碉堡一个一个地被十字军人攻克。

接下来的战事变得不太顺利。城内的穆斯林军队顽强抵抗，尼罗河水开始上涨，十字军中疫病流行，多种因素相加，使得十字军人裹足不

前，近在眼前的达米埃塔依然掌握在“异教徒”之手。

几个月的苦熬使得骑士对胜利感到绝望．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尔德六世更是沉不住气。1219年春夏，为数不少的骑士、贵族相继返回欧洲，他们已经顾不上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宗教功德”了。

奥地利公爵显得非常宽怀大度，临走之前留下了一句令十字军人感激涕零的话：“把一切荣耀都留给坚守阵地的基督战士吧!”分文未取，寸地未得，奥地利公爵空手回到了在欧洲的领地。

留下继续作战的十字军人仍然不停地围攻达米埃塔。成功在即，因为城内发生粮荒，守军无力再战。

如果达米埃塔失守，埃及就等于失去了门户。为了保住这座要塞，埃及苏丹马利克·阿里·卡米尔向十字军提出和议，愿意将耶路撒冷城以及周围属于耶路撒冷王国的土地（根据1187年以前的国界）让与十字军，并且可以交付巨款，作为和议条件。

十字军的精神领袖比拉吉对即将到手的胜

利充满信心，坚决反对基督战士与“异教徒”握手言和。他的意见是：“占领圣地尚不够，十字军必须夺取达米埃塔，然后占有整个埃及！”

埃及苏丹吃了“基督战士”的闭门羹。

1219年11月初，被围困一年半之久的达米埃塔终于落入了十字军的手中。作为一座商业城市，达米埃塔当然相当富有，骑士军所得的战利品价值数十万克。

关于达米埃塔的归属问题，十字军内部发生了争执。在军中的耶路撒冷王布利翁的约翰要求将其并入自己的领地；而精神领袖比拉吉则认为，靠征服得来的这座城市应当归“神圣”的罗马教会管辖。比拉吉的热力占了上风。

在比拉吉的坚持下，十字军准备继续南进，深入尼罗河流域腹地。但十字军的兵力已经不足以干这番大“事业”，他们要等待援军到来之后再展宏图。

一年多以后，新的十字军于1221年春陆续从南部德国来到了达米埃塔。

埃及苏丹不愿与十字军构兵，但也不得不作两手准备。一方面，他在达米埃塔南面的曼苏拉附近筑起坚固的阵地，以防不时之需。另一方

面，他仍坚持以和为贵，向十字军重申和平的前议。

十字军中有人觉得，这一机会不可再次失去，他们劝说首领接受苏丹的议和条件。但傲骨嶙峋的教皇使节比拉吉再度表示："决不言和！"

代表罗马教会利益的比拉吉不再把"圣地"耶路撒冷作为十字军进攻的直接目标。没有耶路撒冷，西方骑士照样可以活得潇洒自在！

1221年6月中旬，十字军进攻曼苏拉。这时正是尼罗河的汛期，河水开始暴涨。在十字军人尚未留意之时，决堤的尼罗河水奔涌出来，淹没了十字军的营帐，冲跑了骑士们的一切美梦。

骑士们慌不择路，想逃回达米埃塔。但是，穆斯林军队切断了十字军的退路，并从四面八方将其包围。在穆斯林的追击之下，许多骑士中箭身亡，倒在泥泞的小道上……

十字军被迫向穆斯林求和，比拉吉再也没有从前那股傲气，不要"圣地"，但埃及他也没有得到，偷鸡不成蚀把米。后来，当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知道此事时，毫不客气地把以比拉吉为首的十字军唤作"呆子和蠢货"："以一城换一国的良机竟然坐失！"

1221年8月30日，双方达成和平协议，条件是十字军迅速退出达米埃塔。9月初，骑士军遵守和约，再一次“灰溜溜地滚回欧洲”。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收场之后，天主教会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敬酒不吃，罚酒更难下咽。

德意志远征军的道路一波四折。正当德皇腓特烈二世雄心勃勃地准备东征之时，罗马教皇却将之赶出了教门，宣称他不是十字军人，而是海盗，是穆罕默德的奴仆。

1220年，德意志的统治者腓特烈二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罗马教廷与帝国皇帝之间的斗争再度激烈起来。

腓特烈二世虽是德意志的国王，但在国内却毫无实权，各路诸侯全然不顾国王的存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德意志境内出现了众多的“国中之国”。

在国内不能得势，腓特烈二世便将主要精力放到西西里以及南部意大利等帝国领地上。德皇在意大利的凌厉攻势与罗马教廷在此地的

利益发生了抵触。

对付天主教会内部的不肖臣民，罗马教廷自有办法。英诺森三世去世后，霍诺留三世继位。年事已高的霍诺留三世开始在天主教世界宣扬："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为何失败？德皇腓特烈二世罪不容推。"1215年，他假仁假义地宣誓加入十字军，数年过去了，仍未见他履行自己对上帝许下的诺言。

罗马教皇要以合适的理由把腓特烈二世引出西西里和意大利，引出德意志，引出"神圣罗马帝国"！让他组建十字军进行东征，这最为名正言顺。

1221年，霍诺留三世致函腓特烈二世，其言辞非常尖刻、毫不留情。教皇在信中说："皇帝阁下，您似乎没有闲暇去考虑全体基督徒的利益，在您的眼里，神圣事业如同儿戏，对本人的前任英诺森三世所作的誓言也如一纸空文。但是，您的所作所为瞒不过上帝的锐眼。上帝一直在耐心静观，看您何时能够践约，把基督十字军领入正途。现在，我以圣彼得继承人的身份向阁下提出忠告：尽早实现您的诺言，否则，基督教世界里将不再有您的位置。您知道，上帝赋予

本人对三心二意者的终审权，那就是实施破门律……”

阅罢教皇的最后通牒，德皇腓特烈二世陷入了沉思。教皇权倾欧洲，实在得罪不起，何奴自己有把柄被教皇所握。德皇哭笑不得，后悔当初轻率地响应英诺森三世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号召。但事已至此，只好照章办理了。

腓特烈二世复信教皇，对自己的“渎职罪”深表歉意，并决定在1225年率领十字军东征“圣地”。

德皇果真开始了积极准备，他下令在西西里和意大利港湾建造大船50艘，专供运输骑兵之用。

但是，西方骑士对“圣战”的兴趣日趋淡泊，到1225年的预定期限，腓特烈二世征集到的“基督战士”相当有限。再则，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的局势动荡不安，牵扯了腓特烈二世的很多精力。

德皇向霍诺留三世提出申请，将东征日期延至1227年。

老态龙钟的教皇暗骂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与上帝耍把戏的奸人！”

教皇同意德皇的申请，但向他提出一个条件，作为不能守约的补偿："虽然阁下要将东征推至两年以后，但在这期间也不能坐视圣地的事业不管。请您在1227年以前为耶路撒冷总主教提供10万金盎司钱款，以充圣地经费。"

腓特烈二世料及教皇必有新招。他一面接受教皇的条件，一面又致信教皇，提出自己的要求："尊敬的教皇陛下，因为我已于1225年与耶路撒冷公主丘兰蒂成婚，所以我将有权继任耶路撒冷的王位。想必教皇陛下不会认为这是过分的要求吧?"

罗马只能表示默许，对这种理所当然的继承权无法表示异议。

在两年准备期内，腓特烈二世与穆斯林埃及进行频繁接触。埃及苏丹马利克·阿里·卡米尔与占有大马士革的兄弟(后来是侄子)发生严重的内讧，因而他向德皇提议联合对付大马士革。腓特烈二世欣然答应与埃及苏丹谈判，只要苏丹能够接受自己的条件，与他联合一下也无碍大局。

信函交驰一载有余，腓特烈二世获得成功，他将兵不血刃地获得在耶路撒冷王国的"合法"

权益。

1227年，东征期限已到，十字军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夏季到来之际，来自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的数万名骑士聚集在亚平宁半岛东南端的布林的西，他们将要在德皇的率领之下，向“圣地”进军。

正在布林的西养兵待发之时，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和天气炎热，疫病开始在十字军中流行，德皇腓特烈二世也未能逃脱。

身体虚弱的德皇只得再次将东征日期向后拖延。

罗马教廷的首脑已经易人，年届八旬的格里高利九世成为新教皇。虽然他是英诺森三世的至亲，而且坚定不移地信奉他的神权政体思想，但他的能力和经验根本无法与英诺森三世相比。

腓特烈二世将东征日期一延再延，为格里高利九世打击这位敌手找到了借口。教皇下谕：“鉴于腓特烈二世违约不遵，多次愚弄罗马教廷，现在根据上帝的旨意，将腓特烈二世这位狡猾的敌人逐出教门，实施破门律。”

一年之后，德皇腓特烈二世身体完全恢复。

1228年夏，他不顾教皇格里高利九世的破门，率领十字军从布林的西渡海赴叙利亚。

既然德皇已受破门惩罚，他就不再有资格率领十字军进行“圣战”。格里高利九世发出谕旨，禁止这次十字军东征。他说：“腓特烈二世不是基督徒，更不是十字军人，他是不择手段的海盗，是异教徒穆罕默德的奴仆。他渡海到东方，根本不是为了与异教徒作战，而是为了窃取在圣地的王国。罗马教廷向全体基督徒宣布：腓特烈二世的一切行为都是非法的，任何一位基督徒都有责任也有权力拒绝他的所有要求！”

教皇的鼓噪并未使腓特烈二世惊慌失措。只要能建立起“世界帝国”，教籍又算得了什么？

到达阿克之后，腓特烈二世立即重新与埃及苏丹马利克·阿里·卡米尔进行谈判，他巧妙地利用穆斯林封建主之间的内讧和争执，达到了东征的目的。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1229年2月，德皇与埃及苏丹在雅法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条约。按照条约，耶路撒冷（奥玛清真寺所在的一区除外）及巴勒斯坦的许多其他城市让与德皇；德皇则保证支持苏丹反对大马士革，并答应苏丹反

对他的一切敌人，其中包括安条克、的黎波里等十字军国家和骑士团。

1229 年 3 月，腓特烈二世来到耶路撒冷，自己亲自动手，将耶路撒冷的王冠戴到了头上。这倒不是德皇要别出新裁，只是因为耶路撒冷总主教拒绝为这位受到教会破门惩罚的国王举行加冕礼。

腓特烈二世从“异教徒”手中和平地夺回了“圣地”，这更加激怒了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教皇认为，腓特烈是在拿基督教十字军国家做交易，与“异教徒”埃及联合行动更是大逆不道。教皇惊呼：“腓特烈二世已经彻底背叛了基督教!”

乘德皇在耶路撒冷之机，教皇把自己的队伍开进德皇在南部意大利的领地，打算捞取一点好处。

腓特烈二世接到消息后立即离开“圣地”，回师意大利，与教皇部队展开激战。教皇的队伍被打得溃不成军。

在腓特烈二世的强大攻势下，教皇格里高利九世被迫言和。1230 年，双方签订《圣日曼和约》，教皇恢复腓特烈二世的教籍，再也不敢大骂他是“穆罕默德的奴仆”。

1231年，心有余悸的教皇奉腓特烈之命批准了他与埃及苏丹所定的条约。同时，他又晓谕在“圣地”的一切教廷使节和骑士团成员，必须遵守德皇与苏丹的和约。

从30年代后半期开始，腓特烈二世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北部意大利的伦巴底城市，与罗马教廷再次发生严重的冲突。格里高利九世又将德皇开除了教籍。不过，迫于德皇的威力，教皇不久又与他共享圣餐。

教皇重新宣传“圣战”的必要。但他指出，耶路撒冷不再是“圣战”的目标，十字军人应该去援助拉丁帝国。这完全是一种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宗教宣传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1239年，为数不多的十字军在里昂集合，由那瓦尔国王提普和勃艮第公爵休格率领。他们不理会教皇的意图，将军队开往叙利亚。

十字军首领听从骑士团的建议，与甚为强大的穆斯林王公、大马士革的伊斯马伊里联盟，共同对抗埃及的新苏丹阿萨里·阿尤布。但是，在阿斯卡隆一役中，十字军与大马士革的联军被埃及人打得大败。

十字军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利益，那瓦尔的

提普和勃艮第的休格等人率领残兵剩卒，两手空空地回到了欧洲。

远在腓特烈二世回师欧洲之时，“圣地”上的封建主之间就战事不息，他们不愿德皇在耶路撒冷取得权势，因而对德皇的留守人员采取极为敌视的态度。十字军惨败之后，耶路撒冷王国的内部冲突更是接连不断。

埃及苏丹利用耶路撒冷人心涣散、党争不息的有利时机，于1244年9月派一万骑兵直驱“圣地”耶路撒冷，占领之后，将城内的基督徒砍杀殆尽。

“圣地”耶路撒冷从此永远落入“异教徒”穆斯林之手，腓特烈二世的“世界帝国”的梦想成为泡影……

英王亨利三世对教皇使节明白表示：十字军说教者三番五次欺骗他的子民，他们现在再也不肯上当了。但是，法王路易九世却自愿投进罗马教廷的罗网……

耶路撒冷再次落入穆斯林手中之后，罗马教会又向全体基督徒敲响警钟。

1245年，在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指示下，天主教会在法国的里昂召开宗教会议。

德皇腓特烈二世仍然是罗马教廷的危险敌人，他在西西里、南部意大利、特别是北部伦巴底的政策使罗马颇为压抑。里昂宗教会议开始后，英诺森四世宣布，开除德皇腓特烈二世的教籍。

腓特烈二世对教皇的粗暴决定不再感到惊恐和愤怒，他已经习惯了。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罗马教皇给了他无数次难堪，但他也未坐等屈辱的来临，而是狠狠地回敬了教皇。如今他已垂垂老矣，精力已经大不如前……

德皇被破门之后，教皇英诺森四世宣布，将组织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

又有一批骑士、贵族精神振奋地响应了教皇的号召，宣誓远征叙利亚，夺回耶路撒冷。

面对这批虔诚的天主教徒，英诺森四世道出了本次十字军东征的真正动机：反对德皇腓特烈二世。

教皇说："腓特烈二世的一切言行都已违背了主的训诫，他已堕落到了与异教徒无异的深渊。正直的基督徒把他叫作'西西里的苏丹'，这

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主陵不再是我们唯一的进取目标，基督徒们更为严峻的任务是反对最为狡猾阴险的敌人——德皇腓特烈二世，不，就是腓特烈，他已经没有任何资格出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罗马教廷是在做政治投机，打算利用十字军东征来达到制服德皇这一近期目标。在这里，宗教旗帜完全褪去了原有的神圣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不折不扣的世俗光环。

宣誓加入十字军的骑士贵族们被教皇的演说弄昏了头脑。不过，他们尚有一些感觉：十字军的目标仍在“圣地”。教皇的说教遭到了“基督战士”的冷落，他的敌手腓特烈二世依然逍遥法外。

里昂宗教会议以后，一批狂热的宗教演说家奔赴欧洲各地，激发基督徒们的宗教热情。

但是，人们的宗教神经已经废弛。农民们不再为“约许之地”的梦幻而心醉神往，他们明白，参加美名为“圣战”的远征，对他们而言，不是遭受新的奴役，就是命送黄泉。农业技术的改进，城市的广泛兴起，自然灾害的减少，王权的加强，这都多多少少地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他们

不再觉得有逃生海外的必要。有时他们也要起而反抗封建压迫，争取自由和土地，但在本乡本土就已足够了。

随着王权的巩固，大部分骑士也不再认为艰苦的东征有利可图，他们往往投身到国王军队中服务，这是名利双收的买卖。当然，也还有一些想入非非的骑士甘愿做冒险家和替死鬼。

教皇的使节来到了英国。英王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明白地向他们表示：十字军说教者三番五次地欺骗他的子民，他们现在再也不肯上当了。

英王为了不伤罗马教廷的神圣面纱，又对教皇使节说："尽管我已无意远赴圣地，但我不阻止我的臣民投身到教皇陛下的神圣事业中去。我将对积极愿意远征的基督战士表示深深的祝福！"

教皇使节带着半分遗憾、半分成功，回到了"永恒之城"——罗马。

天主教会在法国的活动获得不小成绩。法王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不象英王那么清高，他心甘情愿地投进罗马教廷的罗网。

但是，法王之所以宣誓远征，并不象天主教

会后来所言，说他“笃信上帝，信奉宗教理想”。他的目的旨在进一步巩固封建君主的政体，加强王权的集中和统一。

1229年，路易九世把朗格多克以及一些与东方有贸易关系的城市并入了卡佩王朝的版图，这就促使法王积极调整法国的地中海政策，因为他深知贸易和金钱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

朗格多克等地的合并，使路易九世觉得，“非来一次十字军东征不可”。

1248年，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正式开始，最高领袖是法王路易九世，“基督战士”主要是法国的骑士和贵族，另外，从英国也来了一批甘洒热血的勇士。

大队人马轰轰烈烈地踏上了征途。十字军的进攻目标在哪儿？只顾脚步向前的十字军战士无知晓，就连最高领袖法王路易九世也是茫然无知。

路易九世稀里糊涂地作出决定：进入地中海以后再作他论吧。

令路易九世既恼火又伤心的是，当队伍经过朗格多克的时候，有一些骑士拒绝继续前行，

调转马头回返家园。在里昂，逃兵们向教皇英诺四世贡奉相当数量的钱财后，教皇慨然豁免了他们的“圣战”义务。

1248年9月，十字军来到热那亚。在金钱的诱惑下，热那亚人把十字军人运到了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岛。

在塞浦路斯，路易九世与群臣经过长期讨论，决定将十字军的矛头直指埃及的穆斯林“异教徒”。

十字军迟迟没有离开塞浦路斯，法王另有所谋。长期以来，他已零星获得有关东方蒙古鞑靼人的消息，如能把蒙古人变成自己的盟友，那么法国在西亚的势力将得到空前的扩展。

1248年12月，路易九世与叶尔特格汗的使者会面；1249年1月，他又派多米尼克教团的僧侣安德莱前往蒙古。

法王认为，与蒙古人谈判，必须打着天主教会的旗号，否则，万事皆管的罗马教皇是要龙颜暴怒的。于是，路易九世以使蒙古人改信基督教为名，与蒙古人展开外交谈判，试图使蒙古铁骑转而对付穆斯林，同时也与小亚的尼西亚帝国为敌。

然而，“不开化的”蒙古人根本不理会什么尽善尽美的基督教，法王与蒙古人的谈判没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既然野蛮人不听良言，法王路易九世便率孤师远征埃及。

1249 年 6 月初，几千名骑士在埃及的商业要塞、尼罗河口的达米埃塔登陆。当地居民一片恐慌，守城士兵甚寡，十字军几乎未动刀枪便取得了达米埃塔。不用首领吩咐，“基督战士”照例将城市洗劫一空，然后再进袭四郊。

在达米埃塔的顺利告捷，使路易九世轻易作出决断，继续南进，深入埃及腹地。法王未曾料到，他正在重蹈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比拉吉的覆辙。

1249 年深秋，骑士军围攻达米埃塔南面的曼苏拉城。进攻不很顺利，“异教徒”们负隅顽抗。十字军费尽力气建起的三座攻城塔被敌军偷偷地烧为灰烬。

三个月时间过后，曼苏拉仍在穆斯林之手。有些十字军骑士感到前途渺茫，竟然开始认为，敌人之所以屡次战胜基督上帝的战士，是因为“穆罕默德的信条强于基督的教义”。

路易九世买通了城内的部分守军。1250年2月初，在内应者的帮助下，骑士军冲进了曼苏拉城。

未等骑士们全部进城，穆斯林军队却迅速地将城门关上，出其不意地切断了十字军的后路。来不及冲入城内的一部分骑士全部成为穆斯林的刀下之鬼，路易九世的弟弟阿多亚伯爵罗伯特战死。

十字军占领了曼苏拉，同时也成为瓮中之鳖。穆斯林军队已在城外驻扎，要将上帝的战士困住，直至把他们送上天国……

2月底，埃及人击沉十字军停泊在曼苏拉的船只，掐断了他们与供应基地达米埃塔的联系。

在死亡的威胁下，骑士军纷纷逃出曼苏拉，但未能逃脱穆斯林的追击和歼灭。大部分骑士及其随从投降，法王路易九世和他的另外两个兄弟也成了穆斯林的俘虏。

法王不吃眼前亏，他向穆斯林首领提出，他将交付巨款以赎性命，并答应十字军退出达米埃塔。在留下人质以后，法王获释，来到阿克向骑士团借债。在遭到拒绝后，路易九世便用武力达到了目的。

小贵族们觉得东征已经无利可图，劝说路易九世回国，但他不听劝告，决心继续东征。大部分小贵族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路易九世派遣使臣到法国，号召他的臣民在次年春天来援助国王，齐心协力对付“异教徒”，以雪兵败被俘之耻。

但是，法国大大小小的贵族竟无一人响应，他们已经不再向往“圣地”。下层民众更是利用国家无主的机会，掀起声势浩大的“牧童起义”，参加人数达到10万。

春天已经到来，援兵未见踪迹，却传来国内政局动荡的消息。路易九世无可奈何地留下一支不大的队伍，自己于1254年春离开阿克返回法国。

由于尖锐的社会政治斗争，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国家四分五裂，从13世纪50年代起迅速趋于灭亡。

远在东方的十字军国家得不到外援，从西方所来的历次十字军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十字军国家内部的王公贵族们也是相互敌视，骑士团之间更是相互残杀。这一切都使得十字军国家面对敌人的威胁而束手无策。

从13世纪40年代起，蒙古人也成了十字军国家的克星。在路易九世领导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前夕，蒙古军队已经蹂躏了安条克公国，在50年代末，曾一度占领叙利亚腹地省份。

十字军国家最危险的敌人是埃及。1250年起，埃及建立起“马木路克王朝”（即“奴隶王朝”），到苏丹佩巴尔斯在位时，埃及再次强盛起来。苏丹决心效仿萨拉丁，消灭西方骑士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的十字军殖民国家。

1265年，埃及苏丹攻占凯撒利亚和阿苏；1268年3月，雅法被克；1268年5月，十字军中最富庶的城市安条克也被埃及攻取。

十字军国家已经基本解体，西方骑士在东方的生涯已至穷途末路……

法王病老突尼斯，十字军东征的“圣火”渐渐熄灭。从罗马冒出的几缕余烟，升入天际，不见踪迹……

大多数欧洲人对十字军东征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愿再作徒劳无功的尝试。但是，对于年老体迈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来说，组织新的十字

军东征尚有一丝现实意义。上一次东征所受的屈辱萦绕在法王的胸怀，虽然已经过去将近20年，曾作他人之囚的压抑感一直难以排遣。法王觉得，自己尚有几年活命，何不趁此挽回自己的老面子？再则，远征如能成功，对法国的实力增强也是大有裨益。何乐而不为？

尽管欧洲人对十字军东征的观念已经淡漠，但作为天主教世界的中流砥柱，罗马教廷却仍在声嘶力竭地寻求赞助，号召基督徒起而保卫信仰的尊严和纯洁，鼓动他们为夺回“圣地”而献出不懈的热情。

路易九世爽快地响应了罗马教皇的号召，开始在自己的王国中招兵买马，筹措粮秣，并与热那亚人联系，让他们负责提供船只，运送“基督战士”出海。

1270年5月，在路易九世的率领下，法国十字军在法国南部港湾埃格摩特登上了热那亚人的船只。

路易九世犯了与上次东征一样的毛病。部队已经启程，却不知开往何处。

十字军来到了撒丁岛，暂时驻扎在该岛最南端的卡利阿里。法王要在这里与诸位将领商

议东征的目的地。

在路易九世主持的军事会议上，十字军作出在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决择：既不进军叙利亚的“圣地”，也不进攻“异教徒”的埃及，而是一直南下，前往离撒丁岛最近的突尼斯！

十字军为何选择了突尼斯作为进攻目标？路易九世没能留下口供，只能由后世史家去作合乎情理的解释。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未有统一的定论。

第一第解释是：十字军之所以选择突尼斯，是因为突尼斯总督阿里·莫斯坦西尔曾向法王表示有意信奉基督教，路易九世想借十字军开入突尼斯以“坚定”这位总督的意愿，使他与十字军结盟，共同对付路易九世的仇敌——埃及。

第二种解释是：路易九世本来对“圣地”的命运极为关注，但他却成了自己的兄弟安茹伯爵查理的阴谋诡计之牺牲品。十字军东征前不久，查理征服了西西里王国。在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西西里时代，突尼斯总督就象西西里王国纳贡。查理征服之后，阿里·莫斯坦西尔却拒绝向新的法国人国王纳贡，而且开始包庇纵容查理的政敌、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追随者

——齐伯林派。因此，查理便鼓动怂恿自己的王兄路易九世直驱突尼斯，去惩罚阿里·莫斯坦西尔，使突尼斯重新纳贡，并将齐伯林派从突尼斯驱逐出去。

第三种解释是：以路易九世为首的十字军人吸取了前次东征失败的教训，他们知道渡海直攻埃及毫无成功的希望，于是便想以迂回的方法达到东征的目的，这一“迂回”从突尼斯开始。同时，占领突尼斯，也可扩大法国在地中海区域的势力范围。因而，出征突尼斯，是法国地中海区域扩张政策的一种表现。

究竟哪种解释更令人信服，聪明的读者自有鉴别。或许，尚有一种更圆满的解释有待挖掘。

目标已经确定，十字军的船只在海风的吹拂下，向南驶去。

1270年7月17日，十字军在突尼斯海岸登陆。占领迦太基边防要塞以后，骑士军停止了军事行动，他们要等待援军——安茹伯爵查理军队的到来。

十字军的贸然来犯，使突尼斯人大为震惊，总督阿里·莫斯坦西尔自知力量不足，派使节

出走埃及，寻求苏丹的支持。埃及苏丹佩巴尔斯派出了援兵。

7月的非洲，酷热难忍。初来乍到的十字军骑士适应不了这里恶劣的环境，疫病开始在军中蔓延，不少士兵在这里魂归天国，给“人世的苦难”划上了句号。

年事已高的路易九世更难抵挡疫病的侵袭，1270年8月底，他也告别了人世，与众多的骑士一道，了结了尚未实现的心愿。

继承法国王位的是腓力三世（1270～1285年在位）。1270年9月，腓力三世，安茹伯爵查理和那瓦尔伯爵提普的队伍来到突尼斯，与阿里以及埃及的军队数次交战，大获全胜。突尼斯总督阿里被迫求和，安茹伯爵查理也是见好就收。

1270年10月底，查理与阿里缔结和约。和约规定：突尼斯总督向西西里王国重新纳贡，数额是过去的两倍；把隐藏在突尼斯的齐伯林派驱逐出去；赔偿法国十字军的军事费用7万金盎司，其中三分之一归安茹伯爵查理。

和约对双方的商业贸易也作了明确规定。在突尼斯总督辖境内的西西里商人，“其生命财

产在入境或进行业务时均在上帝的保护之下。”西西里方面也承担同样的义务。

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此结束。这次东征的特点是：规模最小，仅有法国骑士参加；征伐的目标最近，名为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并未向东征伐，只是向南走动一下罢了。

罗马教廷再已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但是不识时务的教皇却继续在天主教世界里发出软绵绵的呐喊，号召“圣彼得信徒”进行“圣战”。

1274 年，在里昂宗教会议上，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提出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问题。会后，教廷使节再次奔赴欧洲各地。

教皇的希望落空了，没有人愿意再为“主陵”而耗费自己的钱财甚至性命。

在东方的几个十字军国家完全失去了西方基督徒的支持，相继被埃及人消灭。

1289 年，埃及苏丹卡拉温的军队攻占的黎波里，由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首领之一土鲁斯伯爵雷门四世开创的的黎波里伯国寿终正寝。

1291 年 5 月，埃及人攻陷“第二耶路撒冷王国”的首都阿克，并被化为废墟。至此。长期

以来一直有名无实的耶路撒冷王国正式覆灭。

西方十字军的力量在东方大陆上已完全化作乌有，但在地中海的一些岛屿上，西方骑士又坚持了一段时间。

一个是小亚细亚西南方的罗德兹岛，从14世纪初开始，该岛即为善堂骑士团（医院骑士团）盘踞，两个世纪以后，即1523年，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

另一个是塞浦路斯岛，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该岛即成为一部分西方骑士、僧侣、商人的定居地。原耶路撒冷王国国王律星云的归多从英国狮心王理查之手买下了塞浦路斯，建立自己的王朝，其名号仍僭用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存在到15世纪末，1489年，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属地；1570年，塞浦路斯又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

由罗马教皇和西方封建主发动的近两个世纪、多达8次的十字军东征，给东西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把十字军的活动称作“东征”，实质是美化了它的内涵。确切地说，它是地地道道的“东侵”。不过，“十字军东征”的称谓由来已久，本

书也就无意去改换名称了。

十字军的侵略战争，使近东各国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拜占庭等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众多的无辜之人惨遭十字军的屠杀，大量的社会财富被抢劫运走，或者化为瓦砾灰烬。

十字军的直接目的未能达到，所占领土最终全部丧失，而且使几十万所谓的“基督战士”死于非命，数不清的社会财富白白耗费在虚无缥缈的“圣战”事业中。

但是，十字军东征以后，东西方的往来更加频繁，商品交换更加活跃，加速了西欧手工业、商业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东征结束时，由东方运往西欧的商品比以前约增加了10倍。马克思指出：“使东方产品更出名的十字军东征，大大增加了西欧对东方的需求。凡是这些商品汇集以便进行交换的地方，都变成了世界市场的城市。”

随着贸易的发展，东方的许多产品和技术也更多地传到西方，从而改进了西方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式。俄国史家扎波罗夫曾有细致的描述：“从东方回来的十字军骑士，不愿

再过原来的生活。他们的掠夺物只够一时之用，但现在他们乐于脱下粗劣的土布服，换上轻软美好的东方装；本来简素的菜蔬，现在换上精美的肴馔，还加上香料；自饮之外，有时候也给客人尝一尝芳香的东方美酒；比武用的剑，装饰上优美的青铜镶嵌柄和黄金或象牙剑鞘，光华夺目；拿一篮篮来自海外的杏子赠送一同愉快地打猎消遣的邻人。”

十字军东征的结果对西欧社会政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一部分封建主在东征中消耗了力量，而城市却在贸易增长的刺激下得到较快的发展，提高了市民的地位，从而导致等级议会君主制的产生。在市民的支持下，王权日益加强起来。

封建主因东征而急需金钱，曾让部分农民用金钱赎买自由，减轻一部分封建义务，还有一部分贵族世家在十字军东征中消亡了。13世纪中叶，封建农奴制渐趋解体。这样，十字军东征部分地影响了农民的处境。

另外，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为反天主教的新世界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尽管十字军东征带来了一些为东征者所始料不及的客观后果，但是，十字军对于加强12至13世纪东西方之间政治、文化和贸易关系的意义，不应估价过高，因为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在建立这种关系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即使在战争时期，民间的和平交往也没有完全中断。